

#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990.3



胡平：

中共死了

宦國蒼：

海外民運之我見

老木：

改良還是革命

特別報導

海外民運圓桌會議

82

1990·1· 華盛頓

# 海外民運圓桌會議



(1) 聯席會議 (2) 緊急磋商 (3) 餐間談笑  
(4) 爭論不休 (5) 徹夜討論

## 民聯聯委會會議

1990·1· 華盛頓

(6) 爭相發言 (7) 聯委兩名大將：吳方城與伍凡



# 賀 祝

## 海外民運團體聯席會議的成功

路邊

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了中國大陸海外民運團體第一次聯席會議。這次會議標誌着海外民運團體向着協同運作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在這次會議上，還發表了民聯和民陣的聯合公告，它表明了海外這兩支民運中堅力量進一步合作的明確意向。海外輿論對此次大會均一致給予好評，相信它對大陸內部的民主力量也是一個有力的鼓舞。

海外民運力量的大聯合是形勢所需。搞聯合的道理也就是搞組織的道理。搞組織，是為了讓有相同政治取向的人們能夠以一個統一的整體來行動。組織的意義在於它的整體統一行動能力。同樣地，搞聯合，也就是為了讓有相同政治取向的組織能夠以一個統一的整體來行動。其實，有相同政治綱領和運作原則的不同組織，從理論上講應該合併成一個。這並不違背多元的原則。因為真正的政治多元，乃是指不同政治立場的各組織的並存。正如真正的學術上的多元是指不同學術觀點的各學派的並存一樣。具有相同政治取向的人們，僅僅由於遠近親疏、人情好惡而不能統一，那不是民主政治成熟的表現，而毋寧說是民主政治不夠成熟的表現。一個健全的多元社會有兩個標誌：其一是不同立場、不同利益的組織的分化程度；其二是相同立場、相同利益的組織的整合程度。我們許多朋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是需要改進的。

由於政治取向的相同常常並不是絕對的一致，因此政治組織的合與分也常常是「此一時期，彼一時」，依不同的政治階段而定。在反對

一黨專制的任務基本上大功告成的今天，波蘭團結工會面臨着分裂的前景，因為其不同成員對待當前波蘭社會的各種政治問題有不同的觀點。但由於他們一致反對一黨專制，故而在過去反對一黨專制的階段是統一的。中國的民運團體在目前階段反對一黨專制的歷史任務面前是一致的，我們之間的其他分歧，在下一階段才有突現的必要和意義。因此我們現在應該整合，以後再分化是以後的事。



在肯定了聯合或統一的意向之後，我們還要細致地處理一些技術性的問題。遠近親疏、人情好惡固然不應當成為妨礙統一的理由，但它們確實構成妨礙統一的具体困難（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困難）。平心而論，我們大陸民運人士的民主素養確實還不十分成熟。所以我們還不可能一兩天內即刻聯合。我們應該切切實實地解決妨礙聯合的各種主觀的和客觀的困難。大體上講，有兩件事需要認真去做。

第一，在組織尚未合併之前，大家在各種便於合作的具體活動上先配合協作，這次聯席會議對具體的合作項目作了初步的規劃，若能落實下去，不但能更好地完成這些項目，而且還會拉近彼此間的距離，增強合併的願望，減少人事上的摩擦。

第二，提高自身的民主素養。過去有的民運組織鬧分裂，主要原因是一些人欠缺組織概念。遇上自己不贊成的決定或決議，既不肯服從，又不耐煩遵循正常的程序去解決。這就很難辦。

今年四月，民聯聯委、民陣理事要召開聯席會議，研究合併的具體問題。當然，研究合併還不等於合併本身，正如研究執政並不等於實際執政。在會上，我們要提出關於合併的具體方案、步驟，包括逐步解決礙於聯合的各種困難。然後再交由兩組織認真討論。我們理想中的大聯合，並不是民聯民陣先合成一個大組織，然後招手叫別人來加入。我們希望一切願意大聯合的團體或個人都以平等的身份共同參與新的組織整合。這個平等的原則也很重要。

此次聯席會議的召開，也表明了，民聯作為海外民運的一支中堅力量已經得到世人的普遍肯定。這是全盟上下任勞任怨、不懈努力的結果。民聯是老民運了，但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却受到一些朋友的排斥和歧視，包括某些後起的新民運也排斥我們。這是很不正常的。這種不正常局面的結束意味着整個海外民運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今後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不辜負人們的期望與要求並且更上層樓。任重而道遠，我們須盡力而為。

\*



中國大陸危機應變方案研究計劃  
「T計劃」  
6  
15

海外民運圓桌會議

滬後記

陳軍

這期的雜誌，以相當的篇幅報導了海外民運團體聯席會議的情況。另外，我們還就大陸民運如何廓清自己路向的熱點議題安排了一組文章。除了胡平、宦國蒼、丁楚這幾支筆外，華一夫從再評新權威主義的角度，亞衣先生從觀察民運與中共路線鬭爭的關係這一視點，詩人老木以一己觀感出發，都提出不少有見地，有深度的意見。

另外，「論土地制度」、「哲學十年風雲」也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章。

六四以後，許多作家詩人流亡海外。對這些敏感的心靈來說，在新的存在裡，如何彌合自己的記憶，調整自己的心境，是個頗為難對的「因結」。貝嶺在這裡的反思，讓人掩卷感嘆。

在爭鳴一欄裡，大家可以見到觀點迥異的文章，讀起來相信大家會有自己的取捨。

讀者也許還會發現，本期在文章的編排方面，作了許多改動。這只是我作為本期代理主編的一點嘗試。希望各位能夠接受，並提出改進意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

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990年3月號 82期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1990. 2. 15. 出版

1982. 11. 17. 創刊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Copyright ©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 中國之春

## 目錄

78	中共在非洲的賭注	楊海文	74	俄羅斯再造新紀元	楊漫克	75	莫斯科：埋葬列寧	馬怡陽	68	再評新權威主義	李光程	63	哲學十年風雲	華一夫	思想家	田規	61	發動農民支持民運	丁楚	58	短期行為綜合症	楊天樹	42	中共軍隊的暗幕種種	許九元	40	中共高幹神秘死亡之事件知多少	吳靈	39	前公安部長李震死亡之迷	呂明	37	替解放軍訴苦	肖亞群	35	「六四」之後的中共對外經濟	呂明	特稿	33	從北京的外債危機	劉連增	31	社會主義制度解體後的一種新模式	密德	27	中國農業的深層問題——土地制度	密德	22	民主運動不從屬中共路線鬭爭	亞衣	20	海外民運之我見	匡國蒼	16	中共之命運與中國政局發展	胡平	政治	16	中共之命運與中國政局發展	胡平	80	人血不是胭脂	程鐵軍	83	評丁楚〈民主先是瀉藥後是補藥〉	師秦	84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致嚴家其、萬潤南	85	改良主義對大陸民運的誤導	李三元	88	萬潤南先生的「根」在哪裡？	倪育賢	88	不要給人民公敵做幫手	胡鳴	留學生天地	曉剛	41	移民局對留學生工卡申請某些限制	包路曉	89	各有一本難念的經	譚華	92	同學致敬民運人士 領館官員醜態百出	博華	98	改良還是革命	老木	95	選擇，一個宿命的悲劇	貝頌	93	關於「逃跑學」的斷想——反思之一	貝頌	大陸報導	郎	44	失落的冬天——大陸報導系列之二	李遠	51	文革紅人今安在	未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 主 編：陳軍  
主 編：丁楚  
主 筆：胡平  
編 採 主 任：楊漫克  
責 任 編 輯：劉義

經 理：尚平  
執 行 編 輯：李遠  
美 術 編 輯：蘇洋  
發 行 行：薛偉  
攝 影 記 者：吳方城

# 海外民運圓桌會議

楊漫克



-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 民主中國陣線
- 全美中國學生自治聯合會
- 全加中國學生自治聯合會
- 中國民主通訊委員會
- 國際團結委員會
- 六四之聲廣播電台
- 新聞自由導報
- 民主中國（加拿大）六四基金會
- 解放軍正義會
- 自由民主黨籌備組
- 中國民主黨
- 美中人才交流基金會
- 廣東企業家聯誼會

一月二十九日，將成爲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史上富有重大意義的日子。

這一天，各海外民運團體、各方民運人士、關心中國民主前途的華僑領袖、美國友人計四十餘人，在美國首都召開了首屆「海外民運團體聯席會議」。這次會議預示着，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將有望克服國人一盤散沙的傳統積習，在嶄新的高度上重整旗鼓，促進國內民運高潮的來臨。

出席一月二十九、三十兩日的海外民運團體計有：「民主中國陣線」、「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中國民主通訊委員會」（原退黨委員會）、「全加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六四之聲廣播電台」、「新聞自由導報」、「國際團結委員會」、「民主中國（加拿大）」、「六四基金會」、「解放軍民主正義協會」、「自由民主黨籌備聯絡組」、「中國民主黨」以及「美中人才交流基金會」等十數個團體。

本次「聯席會議」由「民聯」、「民陣」、「國際團結委員會」、「中國民主通訊委員會」的金岩石、黃奔、葉寧、馮勝平、張卓之等人籌備發起，廣邀各方團體和人士共襄盛舉。

目前海外民運團體的大勢格局，基本上是六四後的政局引致各種組織大量湧現的結果。其中，有在海外與中共政權抗爭達七年之久的

「中國民聯」，「六四」後逃亡海外人士組成的「民主中國陣綫」，這兩大團體政治訴求與構成極高，是為準政黨型的組織。「全美學自聯」則是草根性群眾組織和利益團體，政治訴求較低。

此外，尚有設於芝加哥的「六四之聲」廣播電台，設於洛杉磯的「新聞自由導報」、設於波士頓的「中國信息中心」和「退黨委員會」等功能性民運團體。

### 東歐變局可鑒

六四之後，由於天安門學潮領袖、知識份子精英、共產黨內改革派幕僚、企業家大批逃亡，迅即在海外掀起過一場迎接六四的民運高潮。去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們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國陣綫」時，曾吸引了各方民運人士聚集，曾試圖藉高潮之機，成立一廣集各方面人士和各海外團體的聯合陣綫，然未得要領。「民陣」只是做為眾民運團體之一而問世。

造成此一時勢的緣故自然很複雜，擇其要者，概有下述幾個方面：



——各民運團體多為六四後湧現出來的新面孔，背景異，思維層次亦有所差別。故很難在短期內相互瞭解溝通，組成統一的民運組織。

——對時局的評估偏於保守。六四後多數民運人士咸認為，將有一段較長時期的民運低潮期。「民陣」主席嚴家其的估計最為樂觀，然亦認為兩三年之後方有變數之可能，因此聯合的意願不甚強烈。

——六四後整個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心靈震蕩，中共改革及知識精英的「體制內」努力前功盡棄。當時對中國前途，特別是民主運動在新的形勢下將採何種策略，存在較大分歧和混亂，也在客觀上造成四分五裂的局面。

六四至今僅僅半載，國內外局勢已發生世紀性激變，致使中國民主運動的內在和外條件，均與六四時有明顯的不同，概如下數端：

(一)東歐——蘇聯共產黨國家的政治變遷、柏林牆之推倒、羅馬尼亞的革命、蘇聯開放黨禁、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出現非共產黨政權。這些「國際大氣候」的變化，形成強大氣壓直迫北京當局。特別是羅馬尼亞革命與中國「六四」事件極為相像，只是前者以專制的失敗告終，對中國的震盪最為強烈。而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創始國家蘇聯的演變，使僵硬的中共政權更形孤立。

### 葉寧：

### 海外民運應擺出流亡政府的架式



嚴家其：  
我們應有兩手準備：  
即和平演變和暴力反抗

(二)中國大陸局勢日危：陷入全面癱瘓狀態。中共強硬集團欲振乏力，欲罷不能。解嚴後北京市內則公開增派部隊，對民運的鎮壓和迫害尚無終止跡象。經濟危機惡化。中國今年進入內、外兩個還債期。由於「六四」後的國際經濟制裁，外債難於償還。八十年代初發放的內債——國庫券，更由於經濟的崩潰而不敷調配，甚至連國營企業的工資都發不出來，告發放產品抵消工資，再讓工人自己售賣生錢。故目前大陸民心已處在逼反狀態。

(三)「六四」後海外各民運團體在半年來守望相助，相互增進友誼。各組織時常採取聯合行動，共同發表時事聲明，設立統一的基金會組織，雖然其中某些事情不盡理想，甚至造成各團體間的相互磨擦。但總體而言，相互間的溝通、體認業已基本達成。「民聯」「民陣」

兩團體間來往最為頻密，互設顧問，成員互相要角，確立了良好的關係。

綜上述因素，大聯合已成一種共同的意願。尤其是羅馬尼亞與蘇聯的巨變，大家對大陸未來局勢緊迫性的體認，由此而生聯合刻不容緩的心境。筆者認為，中國大陸高壓之下的平穩狀態，到今年四月將有望被打破。從四月五日起，每每動員令般的日子接踵而致，將再被民運高潮。嚴家其先生估計認為，今年夏季在北京舉行亞運會期間可能會出事。

## 民聯調整部署

針對中國大陸可能出現的動蕩局面，在一月廿七、廿八兩日，中國民聯聯委會首先舉行了會議，對此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

中國民聯企劃幹事陳軍提出了一個簡稱「T計劃」的應變方案，對中國大陸未來變數進行系統的分析、確定對策。聯委會委員凡凡認為，海外民主運動的初級階段已經過去，現在只提「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八字方針已經不夠。要有更確切的政策和許諾，才能贏得民心。要提出一整套的應急方案和治國方略。

退黨委員會的葉寧等人則提出組織流亡政府或影子內閣，這方面引起最為激烈的爭論。葉寧認為，六四後的中國共產黨已不再具備代表中國的合法性，同時國內高壓下無法產生公開的民主運動。在此客觀條件下，海外民運應擔當起歷史責任，像戴高樂將軍那樣，適時組織流亡政府，爭取國際支持和向國內注入信心。

但柯鋼、王燕濱等另一派人認為，成立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及代表性將不會受到承認。如果我們自稱代表中國人民，那就和共產黨犯了相同的錯誤。

大聯合問題亦是聯委會的主要議題之一。



民聯聯委會調整組織，以適應大陸可能出現的變局。

雖然「民聯」「民陣」上層人士諸如嚴家其、胡平、黃奔、金岩石等均贊同聯合。但民聯各地基層組織反響強烈，現值就阻力性看法略述一二：

——激進意見認為「民陣」立場不明朗是被逼上梁山。這種意見雖佔少數，却有很大的影響力和感染力。民陣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主張，也在羅馬尼亞革命後受到更多質疑。

——認為民陣只有明星，沒有群眾，只有架構，沒有實體。故與民陣聯合實惠少。而民陣幹部出差住星級旅館的排場作風，民聯的盟員亦無法接受。

——認為民陣組織尚未歷煉成熟，各派大亨間互相難容，危機暗伏，因此今後民陣可能要經歷民聯過去經歷過的各種坎坷。

但與會者一致認為，無論民聯、民陣存在什麼問題，聯合的象徵意義不可低估，中共會感受到一種空前的壓力，在國際社會樹立統一的反對派形象。

為應付國內可能出現的激變，民聯適應形勢需要，作出大幅組織調整如下：

聯委會決定將民聯總部由紐約遷往華盛頓，以便同「全美學自聯」「民陣」協同運作。

按照胡平在民聯「四大」上提出的八大任務，聯委會批准總部成立八個功能不同，分責進取的部門（即所謂八大部）包括財務、企劃、宣傳、資訊、公關、理論、大陸工作和對台關係。即將全面鋪開各項工作。各項任職是：總幹事汪岷、辦公室主任張卓之、財務幹事黃奔、企劃幹事陳軍、宣傳幹事楊漫克、資訊幹事梁雲、公關幹事汪岷、理論幹事黎明、大陸工作幹事符公佈、對台關係幹事楊雲。

聯委會批准的另一項決定是在世界範圍分支部、聯絡站的基礎上，設立七大分區（組長負聯絡之責），美東組長張卓之、副職鄭之杰；美西組長林心聲、副職郭平；美南組長郁亦敏、副職林偉；美中組長齊光、副職吳志強、



澳洲組長待公佈；歐洲組長梁鐵杉、副職楊先智、亞太組長姚月謙、副職梁華。由於基層組織的擴張，民聯總部很難應付，故下設「七大軍區」，拓展基層組織發展和加強活動。

如果說，去年六四中國民聯由於內部紛爭未能起到應有之作用；那麼可以說，現在的中國民聯已經為下一次民運高潮，作好充分的準備。

### 聯合眾望所歸

一月二十九、三十兩天的「海外民運團體聯席會議」，共包括六項議程如下：

- (一) 組團訪問東歐記取經驗，發言人楊漫克；
  - (二) 六四週年紀念活動，發言人金岩石；
  - (三) 籌組研究中心，為中共崩潰後的各種可能性商討對策，發言人嚴家其；
  - (四) 民聯、民陣合辦刊物事宜，即民聯的「中國之春」和民陣即將出刊的「民主中國」，發言人胡平；
  - (五) 加強募款方面的聯合行動，發言人劉亞東；
  - (六) 設立各海外團體的聯合機構，發言人金岩石。
- 民陣理事會主席嚴家其首先致開幕詞。他說，海外民主運動現在的政治口號要非常明確



，即結束共產黨專制王朝。

嚴家其表示，羅馬尼亞經驗十分重要，獨裁者齊奧塞斯庫鎮壓人民，引起正當反抗。事件提示，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亦應作兩手準備；即和平演變和暴力反抗。他個人表示希望用第一手，但絕不排除第二手。嚴家其有關暴力革命的看法，是這位民運領袖第一次明確的表態，說明羅馬尼亞事件創造了新奇蹟後，許多大陸民運人士對革命的態度有所轉變。嚴家其的講話獲得會人士的一致讚許，亦使民陣過去不甚明朗的形象獲得良性的扭轉。

民聯聯委會主席徐邦泰，對此次聯席會議獲得幾乎所有海外民運團體的響應表示感謝。他將會談比做聚議聽，相信這次會議對中共將是一次不小的打擊。因為目前民聯、民陣外加各路團體，以人數上看，不過是兩個團，外加幾個縱隊。但一旦聯合起來，將獲得實質性的飛躍。

在第一個議題的討論中，嚴家其先生提議，民聯、民陣今年四月在東歐（暫定東柏林）舉行聯合理事會，一方面共同研議東歐的民主經驗，另一方面討論開代表大會爭取兩團體合二為一。「六四文獻攝製計劃」負責人龔繼遠透露，前國內中央電視台的一批專業人員，已自資拍攝一部大型六四文獻影片。包括兩小時的中文節目和一小時的英文節目。

最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東歐工作小組，由民陣的金岩石為召集人，包括學自聯代劉亞東；民聯代表楊漫克。東歐考察分三部份進行，第一步由龔繼遠等人派出攝製組，同時代表各團體前往東歐安排下一步計劃和拍片，二月上旬出發；第二步派出民運團體聯合考察團，

### 金岩石：

這次會議希望作到：「一報、一刊、一台、一會」。



龔繼隨：希望拍個影片把歷史紀錄下來。

三月下旬出發，與東歐各國反對派領袖會面；第三步舉行民聯、民陣兩團體聯合理事會，並與考察團在東柏林會師。

聯席會議認為，東歐計劃的目的在於形成一個世界共產黨國家壓迫中共當局的包圍圈，迫使中共放棄一黨專政，促進國內民主高潮來臨。

### 海外大有作為

今年六四週年紀念日，海外各民運團體將聯合舉辦近十項大型紀念活動。民運代表金岩石提出了如下紀念活動項目，獲得與會代表熱烈響應：

——發動世界人民為六四死難英雄進行大祈禱，目標定在十億。這項活動的達成，將依賴全世界各種宗教力量。退黨委員會的葉寧已草擬了致梵諦岡教廷的信件，爭取教皇對中國民運的支持。

——舉辦大型六四畫展，此項活動將在華盛



劉亞東：  
聯合基金會要知難而上。

頓舉行，由前「中國美術報」股東張郎負責

舉行多場義演活動，包括紐約、洛杉磯和田納西舉行的「中國美術報」股東張郎負責

一召集、串聯全世界共產黨，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中共的六四暴行。

一由大陸民運團體為核心，召集世界各地所有華人團體、黨派，發表「六四告中國同胞書」，造成三千萬海外華人聲討中共的聲勢。

一組織多個理論研討會，總結六四經驗，為下一次的決戰做好戰略準備。

一五月三十日美國國會討論最惠國待遇時，將展開遊說，爭取美國取消對中國貿易最惠國的待遇。

在籌組研究中心的議程中，嚴家其先生指出，八九民運的起因主要是十年改革的產物，共產黨的改革加速了社會演變，但却無法成功。海外民主運動，應當利用自己的優勢，為今後中國重建共和奠定基礎，即未來中國將成為什麼樣子？工業政策，土地政策，軍隊國家化一系列問題，都有待詳實的研究。

王燕濱補充嚴家其的提議時說，目前海外民運的氣魄，還不如延安時期的共產黨。毛澤東當時提出，要敢於鬪爭，敢於勝利。即做好接管政權的準備。而海外民運沒有這種氣魄，在中國未來走向上，也缺少可行性研究，空喊民主口號是不行的。

最後會議決定，理論研究方面將設立一個世界範圍的研究網，分專業提出應變計劃，由民聯企劃幹事陳軍負責具體事宜。而陳一諮先生與余英時教授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的「中國當代問題研究會」將協商作為整個計劃的一部份。該會將於四月在芝加哥成立一個三百人的顧問委員會。

民聯主席胡平就民聯、民陣兩團體合辦刊物一事發言中稱，兩團體的奮鬥目標基本上是一致的，分辦雜誌，有三個壞處，一是分割市場；二是分散財力；三是分散人才。而民主刊物的市場、讀者、作者都很固定。因此他建議，成立一個統一的編委會和撰述委員會。

然而合刊有兩個具體問題：一是「中國民聯」主辦「中國之春」已經寫入民聯章程，由兩團體合辦一定要開民聯代表大會時方能修改；第二個問題是，民陣方面由蘇曉康、遠志明主辦的刊物尚未發行，只有待發行後才能談得上合刊事宜。故數月後再做詳議。

聯席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是各民運團體聯合籌集資金的長遠計劃。嚴家其指出，「中國



民主與人權基金會」成立以來，沒有作出成績，關鍵是七個發起人（嚴家其、萬潤南、陳一諮、李祿、吾爾開希、劉水川、胡平）都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報紙上一發消息就了事，誰也沒有真正關心此事。這項工作要請專業人才來做。

會議中柯鋼提到萬潤南先生的理論，即企業家是造餅的，政治家是分餅的。但海外民運團體兩者都不是，而是申請吃餅的。分餅還談不上。

國際團結委員會的馮勝平認為，基金會成立後要錢的人太多，誰都沒有代表性或正統性。美國國會計劃九〇年給予各國民運一千七百萬經費，其中一百萬給中國。但由於中國民運沒有統一的接受單位，故有錢拿不到。但此一說法有人認為不確。

學自聯秘書長劉亞東前一段負責基金會的具體事務。他對一些傳聞做了澄清。目前該基金會尚未籌到基金，但籌建費已花掉了三千多元。金岩石特別強調，前述的七人委員會不是董事會，而是發起人。因為董事負責籌集資金，而不是花錢，因此今後設立專門的董事會。大會決定任命馮勝平為基金會的執行長，負責基金會的日常運轉。

君子合而不同

聯席會議壓軸戲為第六個議題——海外民運團體大聯合的問題。人們回憶了滿清末年孫中山反清建立共和的活動，認為這次會議相當於孫中山革命從興中會到同盟會的發展過程。而

王燕濱：敢於鬪爭，敢於勝利。

柯剛：中國最難是公有制變私有制。

中共政權已墮落得比滿清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鄧小平猶如慈禧「垂簾聽政」，楊尚昆猷如軍機大臣榮祿，趙紫陽猶如光緒皇帝。

民陣美洲總代表金岩石表示，這次會議希望作到：「一報、一刊、一台、一中（信息中心）、一會（理論問題研究會）」，在結束一黨專制的旗幟下，結成海外民運的統一戰綫。

六四之後，各民運團體間，特別是「民聯」「民陣」兩大團體之間，迄今為止合作得十分成功，建立了相互間的友誼，為大聯合奠定了相當的基礎。根據東歐以及世界各國的經驗，反對派的聯合（COALITION），在在野的時候比較容易，越接近權力時，越容易產生利益的磨擦。

東歐各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結束後的經驗證明，共產黨放權時，反對派方面由於派系林立，常常出現無法替代舊政權的問題，出現權力的真空。羅馬尼亞、匈牙利都出現反對派要求延遲民主步伐（推遲大選）的奇觀。

某些與會代表認為，海外民主運動如果停留在目前的四分五裂狀態，不僅對國內的民主條件的成熟無所作為，而且還會因此在未來得不到國內反對運動的承認，這種例子在台灣、南韓都屢見不鮮。傳說萬潤南對此有句非常生動的總結：即「歷史只承認最後一次。」因此，海外民運人士不可妄自尊大，民運功過，事在人為，歷史自有評說。



張郎郎。  
這種會的確和共產黨的不  
一樣，所以我沒逃跑。



劉永川：  
我樂見民陣、民聯合為一體。

在會議之前，各方人士對此次圓桌會議的期許有上、中、下三高低不同的程次：

- (一)各組織合併，召開新的代表大會，重選統一的領導班子；
- (二)各組織仍分而治之，但在具體事宜上進行實質和充分的合作。如合辦刊物、基金會、研討會等；
- (三)成立民運團體的協調機構，組成統一戰綫，只在遇到特別事件時採取聯合行動。

經過兩天的會議，在上述三層次目標上，第三項如期達成，第二項部份達成，第一項已可預期。因此會議可謂十分成功。大會結束時，除前述五項議題達成協議，並安排專人負責，會議達成「聯合聲明」，通過五項具體合作項目如下：

- (一)各團體在今年適當時候組團考察東歐，吸取結束一黨專制、建設民主社會的經驗和教訓；
- (二)各團體共同籌組六四週年紀念活動，並推動國際社會將六月四日定為世界民主紀念日

- (三)各團體將協同進行有計劃的理論研究，其中包括民主建國大綱和應付變局的緊急措施；
- (四)各團體共同組成統一的中國人權與民主基金會，統一籌措和分配民運捐款；
- (五)會議決定成立常設協調小組，負責各團體聯絡協調活動。

此外，民陣、民聯兩團體亦達成一相互間的協議，一月三十日由民陣理事會主席和民聯聯委會主席嚴家其、徐邦泰簽字生效。「聯合公告」中稱：兩組織應當在積極合作的基礎上迅速走向聯合，為共同目標——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而努力；雙方各派一名代表（民陣金岩石、民聯汪岷）負責聯絡協調，今年四月下旬在東歐召開兩組織常務機構的聯席會議，具體研究組織合併問題；成立「六四」工作組，廣泛團結其他各民運團體參加，為廣泛的聯合創造條件。

兩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大哲孔子更說：「君子和而不同」。中國的民主事業，端賴各方面有抱負的仁人志士為之不懈努力。民主是副世紀以來人類最難為的政治方式，而對中國人而言，我們只是剛剛開始艱苦的學步過程。\*



陳軍：總是以平常心看待民運。

# 海外民運團體聯席會議公告

東歐局勢的變化將大大加速中國民主化的進程，迎接這個大變局的到來，已成為擺在海內外民運力量面前的迫切任務。

為了有效地壯大民主陣營的力量，有效地利用我們有限的資源，中國民陣、中國民陣和中國民主通訊委員會於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在美國華盛頓共同發起海外民運團體聯席會議，以推動海外民運團體的聯合。派代表參加會議的有全美學聯、六四之聲電台、新聞自由導報、民主通訊委員會、自民黨籌委會、國際團結委員會、華盛頓州大六四基金會、民主中國—渥太華美中人才交流基金會、廣東企業家聯誼會、中國民主黨。還有一些無黨派人士也參加了會議。會議歷時兩天，共達成如下決議：

- (1) 各團體將在今年適當的時候組團考察東歐，從那裡吸取結束一黨專制建設民主社會的經驗教訓。
  - (2) 各團體將共同籌備今年「六四」紀念活動，並推動國際社會將六月四日定為「世界民主紀念日」。
  - (3) 各團體將協同進行有計劃的理論研究，其中包括民主建國的長遠大綱和應付變局緊急措施以及民主運動的戰略策略。
  - (4) 各民主團體共同組成統一的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統一籌措和分配各種民運捐款。
  - (5) 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常設的協調小組，以負責各民運團體的聯絡，協調各民運團體的活動。
- 與會各民運團體呼籲海內外各種民主力量，在一個共同目標下聯合起來，結束中共一黨專政，重建民主共和。

# 民陣民聯聯合聲明

「民主中國陣綫（簡稱民陣）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在日前召開的海外民運團體聯席會議上初步達成如下協議：」

一、雙方到會代表共同認為：民陣和民聯作為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兩支主要力量，應當在積極合作的基礎上迅速走向聯合，為我們的共同目標——結束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一黨專政而努力奮鬥。

二、雙方到會代表一致同意：民陣和民聯應當在條件成熟時向組織上的合併努力，並同時推動有共同意願的其他民運團體一起合併。此意向在經過雙方的最高權力機構認可後立即付諸實施。

三、雙方各委派一名代表（民陣方面金岩石，民聯方面汪岷）負責工作上的聯絡和協調，在今年四月下旬在歐洲召開東歐局勢研討會，召開民陣理事會和民聯聯委會的聯席會議，具體研究雙方在組織上的合併問題。

四、民陣和民聯將在「六四」週年紀念活動等一系列工作項目上直接合作，組成一九九〇年「六四」工作組，並廣泛團結其他各民運團體參加，為雙方在組織上的合併以及更廣泛的聯合創造條件。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委員會  
主任委員（簽字）徐邦泰  
民主中國陣綫理事會  
主席（簽字）嚴家其

# 關於《「T計劃」的幾點說明

## 「T計劃」——中國大陸危機應變方案研究計劃

陳軍

剛剛過去的八〇年代充滿了一系列驚人的變故。它以北京民運的劫難和東歐的偉大轉折為標誌而被載入史冊。我們跨入的九十年代，作為本世紀最後十年，是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基本結束的十年。在這十年裡，海內外社會各階層人士追求的政治目標是：結束共產黨在大陸的一黨專權，建立一個新的民主社會。

基於大陸目前的現存發展階段和社會條件，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特點，完成這一歷史使命，我們將面臨一系列政治解體、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的挑戰。應付和解決這些危機，降低民運成功的風險與代價，需要我們每個有識之士的智慧，細致的考慮和週密的籌劃。

在上述的基本前提獲得大致認同以後，我們在通過相當範圍的商討和切磋之後，初步擬出了這個「T計劃」的研究課題。此後不久我們又收到了嚴家其先生關於建立「未來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計劃構想。大致上「T計劃」的主攻方向與嚴家其的致力目標是一致的。在華盛頓召開的民聯民陣及其他團體參加的聯席會議上，對「T計劃」的討論和認可成為相當重要之議題。作為該議題引言人的嚴家其先生不僅強調了研究未來大陸民運突變、社會轉型各種可能之迫切和重要，也同意將自己的原先計劃與「T計劃」互補，作為各民運團體共同協調合作的研究計劃。

由於我是「T計劃」最早的草擬者之一，另外幾位是吳牟人、宦國蒼，加上聯席會議後

被推選為「T計劃」的負責人，所以我把我們初擬該計劃的幾點共識作一說明，讓各方面瞭解，並提出補充或修改意見。使「T計劃」能真正成為大家都參與討論的研究計劃。

我們的基本想法有如下幾點：

一、東歐民主運動成功的經驗告訴我們，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並非只有一個模式。從民運活動的政治精英和理念研究的知識精英，不能拘泥於自己以往有限的經驗和認知範圍中抽象出來的模式和政治原則，而應當在不斷變化發展的情勢下，確立自己的基本對策和方法。

經過「六四屠殺」的大陸，經由和平改革結束一黨專政的可能性相應減少。加之東歐特別是羅馬尼亞革命成功的影響，使大陸未來政局的演化，增加了更多的變數。比如說鄧小平死後，大陸民運會有新的契機。這個契機可能以什麼方式形成，各種政治力量，保守派、趨紫陽派、軍方實力派、地方勢力等將如何作為，都需要我們有預先的估測和瞭解。「T計劃」的側重點就在於瞭解各種變數，制訂可供選擇的應變方案。

二、東歐的民運發展，不管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它都是在短時間內獲得成功的。當民運力量在較短時間內，從一個在野黨甚至一個不成形的團體上升為主要政治力量或轉化為執政黨時，他們面臨的都是一個超出自己準備和經驗之外的一個新的政治環境和隨之而來的新課題。如何從政治制衡的反叛角色轉化到政治

設計的角色，以適應新的環境。度過新舊政體交接的困難期，對東歐這些國家，是一項艱巨艱當的重任。

我們大陸的民運人士應當從東歐的經驗裡瞭解到這些困難。今天大陸積壓的危機和各種困難比東歐要繁複難解的多。如果我們不從現在開始為將來的社會變動作準備，特別是共產黨垮台之後的危機爆發，在面臨新的政治格局時，我們就無法提出合理的政治設計和可行方案，作為度過困境，完成社會轉型，建立民主政體的基本綱領。這是「T計劃」的另一項主要研究部份。

三、目前在海外從事民運的各個團體組織，對自己的期許過高，但真正能做的却相當有限。如果我們的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不作合理的應用、調配，不僅容易產生事倍功半的結果，還可能造成事實上的浪費。

不管是失敗的大陸民運和東歐成功，都存在一個共同點，即海外的民運力量，在本土突發性政治力量的衝突和較量時，所能參與的空間十分有限，更不用說發揮多少有實際的影響作用。現階段在海外從事宣傳鼓動的輿論造勢，或注重民主理念的闡述啓蒙工作的知識份子，應當考慮把相當部份的研究精力放到為將來大陸變革作準備這一主題上。我們有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和一段已經不太充裕的時間。如果我們能夠洞見歷史已經形成的某些契機，賦予它更多的思索與籌劃，海外力量才有可能在大陸將來的民運突變中，從思想和策略方面發

揮主導作用。當年著名的馬歇爾計劃，是由一批專家顧問用兩個多星期完成的近五百多頁的報告。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歐洲經濟秩序的主要依據和構想均出自於此計劃。

四、大陸的知識份子歷來對政治的研討放在意識形態或文化的批判、繼承方面，在對某一現實問題進行較深入分析、評估時，我們也很容易忽視對事實和材料本身的陳述和瞭解，以致於我們作出的研究、邏輯形式太過實質內容，抽象的議論評判多過實際的證明瞭解。我們的文章裡，偉言宏論因為沒有常識的對應標準，落入書生議政的俗套。過多的激情浪漫，使我們的思考浮華，不能勝任樸實嚴謹的論證研究。身為「T計劃」發起人的我們，深知自己也未必有能力作這種研究。我們以往的知識背景和思想訓練較難達到「T計劃」研究的各個要求。然而，一個有積極意義的探討，有時候須借助於思考經驗本身的積累，對材料和事實的統攝過程，及重要的專業處理態度。思維方法的變化依賴於研究方法和陳述方法的變化。因此，我們希望關心和參加「T計劃」研究的朋友，能夠在研究方法上多給予重視，盡量使我們的研究能夠規範化、細則化，益量通過實例，舉證來說明觀點。對方案的確主要加以以條件的制約和其他相關因素。方案的可操作性能也應當是我們需要認真斟酌的重點。

五、參與「T計劃」研討的每一個人難免有各個不同的政治立場。但一個從事研究的學者與一個政治活動家有着根本的區別。在華盛頓聯席會議討論「T計劃」時，不少人建議在此計劃中加入如何促進民運發展的技術問題研究。實際上，「T計劃」討論的初衷，比較強調的是獨立研究的立場和價值，即它不是一種政治模式的設計和意識形態主導性很強的研究。而是注重提供訊息，提供選擇的研究。政治人物可以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明確「要什麼」的目標，研究者遵循的是現實本身的引導，從知識的角度勾勒出「是什麼」及「如何做」之不同利弊的大致情勢。「T計劃」是一個

個獨立的計劃，其獨立的前提首先在於每一個參加研究的人本身都是獨立的，其次它不從屬於任何的政治組織，成爲一個謀略或造勢的機構。再者除了「T計劃」本身的各個內容，或定期的研討會議之外，它不再有其他的存在形式，每個人只對自己的研究負責。當然我們希望社會各界都能關心和支持這一研究計劃，畢竟這是一項頗爲艱巨的工作，它的成果又是屬於社會的。

六、「T計劃」之「T」源自於三個「T」的概念。TRANSITIONAL 即對過度時期的研究，另外計劃和各項方案也帶有過度的性質。TEMPORARY 即此計劃不注重方案的長期效應和持久性，而是希望解決短期的、暫時出現的問題。故它本身也包含臨時應變的特徵。TEAM 此計劃只是一個工作班子，而不是一個新的組織。

七、華盛頓民運團體聯席會議通過決議，將「T計劃」作爲協調研究中心的主體。除了由陳軍負責該計劃的協調聯絡之外，各團體還將以贊助的方式給予實質性的幫助。

下面附上「T計劃」。

### 中國大陸危機應變方案研究計劃

#### 「T計劃」(草案)

吳牟人 陳軍 吾滿開希  
宦國蒼 胡平 徐邦泰

基於中國大陸目前的政局發展和東歐的經驗，中國民主力量將面臨大陸一系列政制解體、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的挑戰。在這種危機下，是否存在一套具體可行的應變方案，將是決定中國大陸能否盡早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並在此後和平順利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必要條件。

東歐的革命，不管是以和平還是以暴力的方式，都是在極短時間內發生的。這種發展方式，使得東歐的民主力量往往在缺少準備的情況下，成爲主要的執政勢力或合法公開的反對

黨。這對這些國家向民主化的順利轉化以及民主力量的穩定發展頗爲不利。爲了盡可能避免類似情況在未來中國發生，更考慮到中國情況的極端複雜性，我們認爲海外民運力量必須聯合起來，利用現有的人才和知識資源，預作大量深入的研究，提出一套可操作的應變方案，這也是現在海外的中國民主力量能否在中國大陸下一次民主運動中發揮重要的思想和策略作用的關鍵。

#### (一)、研究大綱

##### 1. 最可能事件模式。

中國民主運動未來最可能發生的事變的類型、出現方式、大致進程和特點。面臨的主要困難和解決方法。

##### 2. 動亂與應付。

未來中國在事變中是否可能出現全國性或地區性動亂。這種動亂是否會與歷史上積有的政治、民族、宗教、宗法派別鬭爭(包括「文化革命」中的派性鬭爭)糾纏一起。如何應付這類動亂。

##### 3. 軍隊。

如何使軍隊在民主運動中保持中立，或者使軍隊採用各種方式支持民主運動，反抗獨裁者。如何最小限度地使用軍隊推翻獨裁體制、如何防止避免軍隊中的派別衝突。在民主運動初步勝利後，如何盡快使軍隊退出國內政治，如何使軍隊擺脫政黨影響，軍隊國家化。

##### 4. 警察及治安。

保證警察(包括武裝警察)在社會治安中的主導作用、如何使警察按照法律保護民主運動。解散「群眾專政」體制。及時釋放政治犯，嚴格依照法律懲處刑事犯罪份子。

##### 5. 憲法修改。

如何適時提出修改憲法任務，採取何種程序修改憲法。擬定「民主中國新憲法(草案)」。

##### 6. 民主選舉與人民代表大會(議會)。

解散原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時機與程序。何時採取何種方式進行全國議會(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在全國大選前是否需要一個過度階段。競選機制的引入。

7. 政體結構。

除全國議會(人民代表大會)外,是否還要保留原有省、市、縣人民代表大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結構設計與變動。「三權分立」的可能性、必要性與實施方法。國家元首制度。內閣(部長會議)構成。

8. 政黨制度。

如何處置原有獨裁政黨及原有八個「民主黨派」。要不要解散共產黨或由共產黨改革派自行改組。制定實施「政黨組織法」,允許公民自由組黨。多黨制的民主政治,政黨與政府分離。

9. 新聞自由。

制定實施「新聞法」,保障公民新聞出版言論自由。報紙、電台、電視台以及出版社的民營與民辦。是否設立官方通訊社和政府中的新聞出版管理機構。

10. 企業與工會。

在政治變動中保護已有生產力和經濟設施(包括工廠、礦山、交通與通訊設施)。迅速實施市場經濟、保護和發展真正的與官僚集團無聯繫背景的個體經濟或其他民營集體經濟企業。發展原有國營企業,明確產權,進行有效變革。保障原有企業經濟活動的法令。建立自由工會和工人自治問題。

11. 保障國家財政。

原有銀行、金融體制的保留與變革。如何追回官僚貪污集團在海外的資財,取締與官僚集團相勾結的企業(官倒)之經濟特權。

12. 農村與農民。

穩定農村社會,發展農村商品經濟。農村物資供應的保障,不誤農時發展農業生產。鄉、鎮長直接選舉的實施。土地所有權變動,土地改革實施。農村公有設施(如水力、電力設

施)的保護及使用。

13. 市場與人民日常生活保障,主要是糧食及副食品。

14. 少數民族問題。

當民主運動與民族問題結合時如何處置。西藏問題如何及時迎達賴喇嘛進藏、藏人自治。新疆問題。

15. 香港問題。

依法廢止或修改原中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有關法律、法令。

16. 台灣的政治經濟力量如何支持及介入大陸民主運動。

台灣、大陸統一的必要性、可能性。中國國民黨能否在大陸重建。兩岸關係。大陸、台灣統一的過度形式。

17. 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組織如何及時介入大陸民主運動事變,如何及時進入大陸與國內民主運動力量協調工作。如何及時支持民運中產生的各種超越海外民運組織現有綱領的進一步要求,如徹底打倒共產黨,清算各個時期共產黨政治、經濟罪惡(包括「官倒」)參與者等。

18. 國際關係及外交。

如何爭取西歐、北美以及東歐蘇聯各國在經濟、政治、道義上的支持。

(二)、研究的基本要求

1. 每一研究必須在它設立的某種政治和經濟條件(即未來大陸危機的某種可能)下展開,也就是說,必須明確表明在什麼樣的具體條件下該方案的適用性。
2. 每一方案要盡可能將實施的辦法細則化,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
3. 所提出的方案要有一定的理論依據和經驗參考。

(三)、工作安排

1. 設立「T計劃聯絡中心」,該中心現設紐約,由陳軍、吳牟人負責協調聯絡工作。
2. 一九九〇年三月底前召開一次由三十至四十人參加的工作會議,確定具體的研究項目及研究個人和小組。
3. 一九九〇年四月底前由研究者個人或小組提出各課題研究計劃,包括所需經費預算。
4. 由聯絡中心每兩月提交一份研究進度報告。
5. 一九九〇年十月召開一次研究報告審查會議,將通過審查的研究報告在一九九〇年底之前結集出版成書。

四、經費

由聯絡中心提出整個研究計劃在一九九〇年的預算,並通過各有關方面(包括同海外各民運組織基金會,以及台灣方面)的聯繫為本研究計劃籌集資金。研究經費預算中,包括研究人員的資料工具費用、稿費,交通及生活補貼。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六日

聯絡地址:  
44-22 KETCHAM ST. 3A  
ELMHURST N.Y 10025  
電話:  
718-639-7483  
718-335-7849

# 中共之命運與中國政局發展

在今後的中國政局中，中共黨內開明派即要放棄共產黨之實，也要放棄共產黨之名。中共已死。餘下的問題僅止是它將於何時入葬。

胡平

中共已死。它死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餘下的問題僅止是它將於何時入葬。

一

所謂「中共已死」，意義有二。其一是指：一旦中國人民有了選擇的自由，人民將拋棄共產黨。

毫無疑問，在未來中國政局的發展中，中共黨內開明派仍會扮演重要角色。但顯而易見的是：

(一)、中共開明派不可能在取代強硬派重掌大權後繼續執行強硬路線。可以預見的是，伴隨着強硬派的復滅，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必將再起。新起的民主運動一定會提出遠較八九民運更為鮮明徹底的民主訴求即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彼時，掌權的開明派既不敢、又不能、復不願再度屠城，他們便會接受民間的民主要求，取消「四個堅持」，承認人民的自由權利。

(二)、然而，共產黨統治而不專制的局面並不能長期維持。出於對共產黨的刻骨銘心的不信任，大多數人民必將把自己的選票投給非共產黨的一方。出於對六四屠殺的巨大反彈，聲勢浩大的非共政治力量必會在政治開放後的一個極短時期內迅速形成。屆時，共產黨將被取代，過去共產黨提出的某些正確有益的政策主

張，將會納入其他非共政黨的綱領之中，這就使得共產黨本身永遠失去東山再起的可能。

二

「中共已死」的第二層含義是，中共黨內開明派也終將放棄共產黨的旗號。

沒有好的共產黨，只有好的共產黨人。六四之前，好的共產黨人或許還可能改造共產黨；六四之後，改造已不可能，猶如朽木之不可雕，唯有拋棄而已。

(一)、中共開明派既然放棄了無產階級社會要取代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要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等一系列基本信條，因此他們已失去繼續自稱為共產黨的理論依據。

(二)、中共執政四十年，劣績昭著；六四屠殺，神人共憤；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這個名字永世蒙羞。任何人，不論是紫陽復出，甚或是羅邦再世，均無力恢復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接過共產黨的旗號，無異於接過那一筆債還不清的巨大債務，只能使自己在政治上陷於極端被動。

是故，在今後的中國政局中，中共黨內開明派既要放棄共產黨之實，也要放棄共產黨之名。

三

六四是個分水嶺。八九民運興起之初，我們都指出，那是「中共自身改革的最後一次機會」。它失去了這最後的機會，因此，它死了。

一樁歷史事件所蘊涵的全部意義，往往不是所有人一下子都能充分領悟到的。戊戌變法失敗後多年，康有為還在為實現其協助大清王朝君主立憲努力，殊不知那時反清之勢已不可遏止，於是，康有為成了過時的人物。六四之後至今，仍有人寄希望於中共上層改革，是犯了同樣的不識時務的毛病。因為反共的思想已迅速蔓延。六四之前，人們不要共產黨的專制，但還可能不要不再專制的共產黨；六四之後，人們既不要共產黨的專制，也不要不專制的共產黨。倘若有人納悶：共產黨過去幾十年那麼專制，中國人都忍受過來了，為什麼它即便今後不專制了，人民仍會拋棄它？答曰：此一時，彼一時，中國人的忍耐力極強，要讓他們說「夠了」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一旦他們說「夠了」，一切便無可挽回。

四

毫無疑問，在催促中國人民思想變化的過程中，除了六四事件外，東歐的巨變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在東歐各國共產黨紛紛落選下



台或是改名換姓的情況下，中國人民是斷然不會再接受中國共產黨了。

有人說，東歐社會與中國社會存在着許多客觀的差別。這話也許不錯。但是問題在於：東歐巨變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民對待共產黨的心理和態度。這種心理和態度的變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整個一部中國近代史均已明證，不是人們的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我們知道，清朝社會基本上是一個與先前歷代王朝同質同構的社會，不是由於其內部社會結構的變化而僅僅是由於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輸入，才導致了立憲維新運動。這便是意識決定存在的一個明證。不錯，西方列強的侵略給予了清朝變法圖強的動力，但倘若沒有西方觀念的影響，則這種旨在圖強的變法運動（戊戌變法）不可能具有君主立憲的方向。爾後的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革命也都是在此相應的觀念的指引下完成的。以共產黨革命為例。沒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輸入，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更不會有共產黨的勝利。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榜樣，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社會顯著地不同於四九年前的中國社會。恰恰是中國共產黨的獲勝，最有力地顛倒了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事實上，百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革運動，無一不是一國國際大氣候「影響的產物，而「國際大氣候」的影響力，主要不在於它改變了多少中國的社會現實，而在於它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對待社會現實的觀點和態度。當自由的東歐人民紛紛拋棄了共產黨時，你怎麼能指望中國人民一旦獲得了自由之後還去認同共產黨呢？

有人希望中共上層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應該說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

第一，在中共現行政治格局的負淘汰形勢

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很難和平地上台執政。

第二，如果有某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和平地上台執政，他也很難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獲得巨大的個人威望，從而穩步地漸進地推行民主的轉變。潛力深厚的民間反對力量既不會給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那麼多的信任，也不會給他那麼多的時間。未來中共開明派領導人將沒有機會、沒有力量去主導民主改革。只要他不復採取強硬路線，那麼，轉瞬之間，整個共產黨的權力、便會喪失殆盡。關鍵在於，由於六四屠殺，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在中國開展民主改革的主動權。這就使得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失去了他以共產黨的名義一展宏圖的空間和時間。或者換句話說，中國的客觀情勢迫使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在五個月、乃至五個星期的時間接二連三地完成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在五年之內從容實現的漸進改革，其結果便是使他成不了戈爾巴喬夫，也就是成不了一個推動潮流的人，而只能成爲被潮流推動的人。未來中共開明派領導人所扮演的角色至多類似於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一個僅具象徵性的不握實權的「虛君」，如果他不肯放棄共產黨旗幟的話。更明智的選擇是，改旗易幟，像匈牙利共產黨、東德共產黨或羅馬尼亞臨時政府中的共產黨人那樣，他們或許能以一種相對新的形象贏得人們的某種支持，搞得越好，尚能在未來的開放政治中保有一定的競爭力。

六

歷史上，後來者是既佔便宜又吃虧。佔便宜之處在於：由於後來者在自己國家內部的事變發生之前，就預先從先行者國家那裡看到了事變的全部過程和全部結果，因此，它有助於使各方人士更好地認清大勢，調整行爲，少走彎路，加速成功。

正如一個人的優點往往也就是他的弱點。上述便利之處事實上也是吃虧之處。正因為各方人士從別處預先見到了事變的全部過程和全部結果，因此，在改革者一方，人們往往會不耐煩循序漸進而容易希望一步登天，在收初幾個有限目標尚未到手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最終目標的訴求；在保守者一方則相反，由於看到了在事變結束後自己利益的嚴重喪失，他們很可能從第一步就拚命抵擋。於是，在先進國家通過漸變實現的變化，到了後進國家每每便以突變的形式完成。英國的民主制是通過和平改革完成的，到了法國，實現相同的任務却導致了流血革命。因爲所謂改革，無非是分期分批的革命，而革命則是畢其功於一役的改革。孤立地看，「畢其功於一役」似乎比「分期分批」來得快，其實不一定，因爲要爆發一場革命，本身需要更長的醞釀時間。革命是遲來誤點的改革，所以它在時間上常常並不佔便宜。

八

大致上講，在社會轉變過程中，改革派的要求愈是顯得溫和節制，保守派愈是以爲護步無傷根本，則改革愈容易和平順利地進行。改革者倘具有高度的政治謀略和心理技巧，他就可以把每一個步驟都說成是有限目標的表現，從而在對方沒有明確察覺的情況下悄悄地改變力量對比。反之，假如改革者總是熱衷於提出超出自己實力並引起對方整體高度警戒的主張，那常常會在實際上延緩改革的步伐。

我們都還記得，「民陣」籌備成立之初，一度把「支持八九民運，反對六四屠殺」這一個有限目標作爲自己的基本綱領。綱領制定者的良苦用心，明眼人一望便知。遺憾的是，正因爲此一綱領的策略性太過明顯，因此它就失去了這種策略所必需具備的使對手難以捉摸的好處。換言之，這一低調的綱領並不足以迷惑那本來已高度敏感、高度警戒的對手，却可能因擬一些喜歡直來直去的同志。問題在於，在經

歷了六四屠殺和東歐巨變的今日，民運力量「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向已然凸現無遺，任何策略性的掩飾已然無濟於事。這種局面當然增加了我們推行漸進改革的困難。因為它強化了中共黨內各種保守份子基於維護共產黨統治地位這一共同利益的同舟共濟之感；同時，它還可能使中共開明派在與民間力量合作的問題上更加狐疑不定。

九

具體地說，在六四之前，一位中共領導人，只要他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同意與學生平等對話，願意接受學生自治組織存在這一事實，他在客觀上就起到了推動民主化進程的作用。六四之後，標準顯著提高，一個人要站在民主力量一邊，他必須同意為六四翻案，這意味著他必須贊成否定鄧李楊，必須承認共產黨政權屠殺民衆這一罪行，必須接納廣大民衆的反對傾向。在目擊了東歐巨變之後，一位中共領導人要成為改革派的標準就更高了，除非他準備放棄共產黨的絕對權力，甚至準備放棄共產黨的統治而不專制的地位，其而準備放棄共產黨本身，否則，他就只能在非楊即鄧的尖銳對立中站在反改革的一方，雖然他和反改革營壘中的其他更趨強硬的人士之間也充滿着矛盾。

時至今日，民運人士方面若試圖從策略的角度掩飾我們旨在根本改變整個共產極權制度的意向顯然毫無意義。不同的話具有不同的份量。擁護共產黨的話喊上一萬句，共產黨也未必相信，反對共產黨的話却不然，你只要喊過一次，共產黨馬上就信了。東歐巨變已經清楚地表明，共產國家的民主運動，同時也就是非共運動，共產國家的民主改革，同時也就是共產黨統治的終結，它常常也就是共產黨本身的終結。展望九十年代的歐洲，某些西歐的共產黨還可能繼續存在，而東歐的共產黨却很可能全部消失。這和馬克思主義的命運頗為類似：

在從來沒有實行過馬克思主義的地方，馬克思主義常常具有着頑強的生命力；而在實行過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它已經一蹶不振。

十

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作為後來者，我們無法避免後來者的不利之處。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應當努力發揮後來者的優勢。畢竟，後來者的好處要大於它的壞處。設想一下，倘若中國的八九民運不是發生在東歐巨變之前而是發生在那以後，結局不是很可能會好得多嗎？

發揮後來者優勢，最基本的一點便是讓更多的人，包括保守份子，更清醒、更徹底地體察到和感受到那個不可阻擋的大氣候、大潮流、大趨勢。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證明了，在促使一種制度改變的諸多因素中，不可或缺，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人們、上上下下的人們，都普遍地意識到，這個制度該變了。



十一

在今天，整個中共統治集團正處於極度的驚恐不安之中。他們正在用最後一點氣力，維持着那座注定要崩潰的大廈。事實上，他們極其矛盾，一方面，他們知道，只要他們稍稍放鬆一下，大廈頃刻便會倒塌；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不明白，他們越是拚命地支撐它，那便意味着他們繼續犯下新的罪惡，一朝垮台，他們的下場越見悲慘。

不久前出版的一期「經濟學家」(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為「給專制者留出路」，鑒於齊奧塞斯庫和諾瑞加的下場可能會促使後來的專制者變本加厲地作困獸之鬥，作者建議給專制者留一條出路，例如像南朝鮮，把前總統、光州屠殺事件的元兇全斗煥送進寺院。不錯，這種使暴君免於公審和刑罰的作法「於正義或許有虧，但對和平與民主都是有利的」，「更重要的是，這種作法能夠減少許多痛苦和災難」。

我以為，中國的民主派也應作出這樣的承諾：給中國的專制者們留下一條出路，讓他們在離開權位之後能和他家人一道過一種有保障的生活。作這樣的承諾當然是有前提的，條件是他們不能犯下新的罪惡，否則必將受到加倍的懲罰。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向中共開明派送去明確的信息：對於他們旨在改變極權專制的任何形式的努力，我們民運力量都將給予堅決的支持和有效的合作。不用說，在這種支持與合作中，民運組織務必十分注意堅持自己的獨立性，並且不失時機地發展自己的力量。

十二

歸根到底，來自民間的持續不斷的壓力是促成社會轉變的最重要的因素。對於我們民間力量而言，非暴力反抗方式仍是我們的基本手段，因為唯有這種手段才具有最大的現實可行性。(至於非暴力反抗與政變、兵變的關係，

我在「革命需要條件，改革需要智慧」一文中已有說明，茲不多論。儘管中共一小批強硬派仍在叫囂今後要繼續用血腥鎮壓來對付民眾的反抗，但是我們應當看到，中共的這種鎮壓手段已經到了它的盡頭。大量的心理學研究和以往的歷史經驗都證明：一支對自己的人民和平反抗進行屠殺的軍隊，是不可能再重複第二次類似的鎮壓的。

由於民間再度發起大規模的非暴力抗爭，從而實現中國社會向民主轉變的決定性勝利，這是有極其偉大的意義的。

第一，它可以避免更多的流血衝突。

第二，它可以保證民主局面的出現而不會導致以暴易暴（以暴易暴並不是規律，但確實是一種較大的可能性）。

第三，它能有效地確立起對理性的堅定信仰。（八九民運失敗後，國人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的問題還是要槍桿子說了算」等思想廣為流行，它反映了人們對理性幾乎喪失了信心。如果未來中國的變化，是以軍隊為主體，民意僅僅作為背景而完成的，那只會強化人們對理性的不信任和民眾對自身力量的無力感，後遺症是很多的。）這一點相當重要。民主制是一種理性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本身體現了對人類理性的信賴。一個國家能否建成堅實鞏固的民主政治，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那裡的人民對理性本身力量的信仰程度。因此，如果未來中國的變化是以具有民主理念的和平民眾為主體實現，那對於未來整個民族的心理會產生極其深遠的積極影響。當然，成功的兵變往往離不開民意的背景。正如成功的和平革命離不開軍隊的廣泛同情為背景一樣。但是，在具體的變化過程中，誰是主體？持槍的軍人還是和平的民眾？誰是後盾（或背景力量）？這種區別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固然會歡迎上層的政變或軍人的舉義，但是，如果我們能首先調動起廣大民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去邁出中國轉變的關鍵性一步，那就更好。

各位良師益友：

「我們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嗎？」

「中國人只能是美、英、日統治下的模範公民嗎？」

請參考 ROBERTS RULES OF ORDER (SCOTT FORESMAN 版本，一九九〇)，內容有二：

一、會議法：西諺說：「懂得開會是民主的基礎」。此書總括了英美兩地五百年的經驗與傳統，非常有用，而這些東西在中國文化中則是空白區。很多內容我們似懂非懂。

二、社團組織法：「懂得組織社團實行民主運作和合作是現代社會的基礎」。這在中國文化中也是空白區。

# 學習民主的必讀書

— 推荐 ROBERTS

RULES OF ORDER.

中國人的觀念一向在兩極定位：

一端是：個人修身齊家；另一端是：治國平天下、國家民族大義等。

至於如何組織團體，絕少提及。各種同鄉會、黑社會組織、保甲團練等，離現代化甚遠。

有一個鮮明的例子：東林書院和哈佛大學大約都在三百多年前成立，現今東林書院只剩下一些頹垣石碑。兩者命運不可同日而語。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體也常在兩極擺動，一端是：一盤散沙，或者都是天才、司令、驕兵悍將，誰也不服誰；另一端是：大一統，高度集中，不向任何人負責。

上述的會議法及社團組織法都是行為規範，不是大戰略、大理論，不過：

一、是大智慧，是長治久安之道。有人說

：武衛兵器一人敵，孫子兵法是萬人敵，資治通鑑是宮廷帝王之術，那麼一套能夠把一百個中國人團結起來的現代化民主運作規範簡直是百萬人敵了！是突破中國文化局限性的大智慧；

二、如果能照其最低標準實行，這個團體或公司可以達到民主運作的最高水平；

三、這些規則能夠賦予社團相當獨立的組織人格，不以個別人員的人格代表全體，或其去留左右全體，從人治變成法治；

四、這些規則獲得美國法律承認，在國際會議上大部份認可。

有人說：海外民運的首要目標和注意力是推動革命，而不是實踐民主。

我的看法是，我們大部份的精力和資源確實應該放在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上，不過如果不實行最起碼的民主運作，我們內部將無法合作，互相抵銷，對外工作效率更低。

而且，海外民運團體是未來中國政治的預演，如果一個人不懂代數幾何，而自稱懂得微積分，我是不相信的。

過去，許多人希望中共推動政治改革，取消特權，等等，大家想一想，在民運團體內推動政治改革也可能頭破血流，不難想像中共的情形了。

我們生當中國社會文化的轉折期，時代創造英雄，英雄創造時代，現在必須要為未來集結力量作好準備。

林心聲

# 海外民運之我見

海外民運組織面臨的五大難題是：  
明確其性質與功能、組織整合、理論研究、財務及公共關係。

宮國蒼

自去年春夏之際至今，海外民運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以目前的情況看，它也面臨着一個怎樣整合與發展的問題。

比較現實地講，海外民運大約面臨下述幾個難題：(1)做什麼與怎樣做？(2)組織的整頓、整合與聯合；(3)理論研究與宣傳；(4)財務與經濟後援；(5)公共關係。筆者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談談對上述幾個問題的看法。

第一，做什麼與怎樣做的問題實質上也是人們常常談及的海外民運的性質與功能問題。至少從目前的情況看，絕大多數組織與個人都已逐步走出原來的，在體制內、外之間猶豫、徘徊的境地，比較明確地表示了他們的政治立場；從共產黨一黨專制這個體制的直接對立面角度來反對共產黨及其體制。在這個意義上，海外民運的實際歷史功能也即是作為共產黨的有組織的政治反對力量。如果人們承認，共產黨的體制的根本政治特點是一黨專制，而未來的中國的民主政治體制應該是多黨制的話，那麼，在共產黨體制之外，以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的立場來反對共產黨及其一黨專制體制

，則是走向多元與民主的第一步。

由於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條件還不允許建立具有干預群眾基礎的反對派組織，人們常常由此而得出「中國大陸不存在能取代共產黨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的輕易結論。但是，無論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八九民運，還是波蘭的團結工會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政治經驗，都告訴人們，在共產黨體制本身沒有重大危機條件下，要建立這種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對派組織是十分困難的。但是，一旦出現重大的社會與政治危機，要達到上述目的也不過是二、三個星期的事情。

有些朋友常常津津樂道地談論「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內的徹底的改革派合作」的重要性。筆者並不否認改革的歷史意義。從這一定義上看，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出現使體制外的反對力量蓬勃發展的一些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條件。但是，從嚴格的政治意義上看，體制內的改革並不是民主運動（特別是海外的民主運動）的主要歷史功能。體制內的改革也很難最終突破體制本身的歷史局限，直接否定共

產黨一黨專制。從現實的政治角度看，如果體制內的改革派還在當權與推行改革，體制外的反對派則有在保持自己政府獨立的前提下，從體制外對其施加壓力，將改革推向極限的歷史責任。但是，如果民主運動所追求的不是開明君主體制式的「新權威主義」而是多黨的民主體制的話。它就不應該將自己的歷史功能局限於「支持改革」的狹隘框框之中。恰恰相反，民主運動能做的和應該做的是，利用改革的環境與氣氛，迅速發展自己的反對派組織，憑藉自己的政治力量迫使體制內的改革派作出能導致直接否定體制本身的政治讓步；多黨制與普選。至於六四之後，原來的改革勢力已經土崩瓦解，如果民運還在用含糊不清的邏輯與語言空談與「改革派」的合作，那是對自己與歷史的嘲弄。在保守勢力當道，國內的政治與經濟全面倒退的條件下，民主運動的立場應該比過去更加明確與堅定：反對共產黨及其一黨專制。至於海外的民運，它本身就不存在與「體制內改革派」合作的條件。坦率地說，當「體制內改革派」仍然大權在握的時候，它又何曾想到同包括海外民主運動在內的大陸民主運動的「合作」與「支持」呢？這也許是中國的改革派在政治上遠較東歐的某些改革派不成熟或幼稚的表現之一。但是，對於某些既打着「民主運動」的旗號，又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返回到體制內去的朋友們來說，中國的體制內的改革派的先天不足難道不是早已被歷史所證明了的嗎？如果在海外的民主運動的政治立場還不如十年之前的魏京生先生明確，這樣的民主運動要之何用？從客觀上看，這樣的海外民主運動還起着維護專制的歷史作用，因為它標榜「民主」，但却與民主精神風牛馬不相及。

第二，海外民主運動需要什麼樣的組織與聯合？一個從事民運的組織本身應該是民主的、這在透明度較高的海外則尤其重要。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一個民運組織內部如果不能建立與健全一套較為完善的民主體制，其壽命是不會很長的。問題的要害並不是宗派主義與個

人權勢欲。任何組織特別是政治流亡組織，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宗派主義，也一定會有某種或某幾種形式的個人權勢欲在那裡作怪。問題的要害是有沒有從制度上防範宗派主義干擾組織本身的生存與發展；防範個人權勢欲超越組織的利益。當然，不同的民運組織成立與發展的歷史不同，其內部制度的健全過程也不同。但是，從六四到今天，已經八、九個月。如果一個民運組織仍然未能健全自己的內部制度的話，它的前途就很難看好。問題的實值在於，民運組織畢竟不是私營公司。個人權力過度膨脹、營私結黨、排斥「異己」的結果常常是產生無窮無盡的內鬨。這樣的民運組織恐怕是很難建立什麼公信力並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生存與發展的。從已經建立的幾個民運組織的情況看，它們的成員組成與運作狀況已經決定了沒有一個能將它們作為自己的獨立王國來經營。而一個獨立王國式的或家長制式的「民運」組織是很難獲得社會的認同的。

民運組織要不要聯合？筆者的看法是聯合要比不聯合好。其原因是，某些組織的內部問題已是積重難返，面臨分裂的前景。與其他組織聯合也許能彼此取長補短，在聯合與整合的過程中，以制定新制度的辦法來克服現存的問題。當然，由於某些既得利益，這種聯合能否順利實現，則是另外一回事。談到制度，筆者認為，最關鍵的一條原則是要使一個民運組織的所有成員（無論是主席還是秘書長）都要受到有效的監督與制衡。

第三，在大陸形勢惡化的條件下，海外民運應該在理論上有所發展。這裡所謂理論還不是指「未來中國的政、經體制」的藍圖描繪，或某些應變計劃。在目前的條件下，海外民運首先需要做的則是對中國大陸與世界的形勢的認真分析與研究，然後才談得上提出自己切實可行的任務、戰略或政策。不然的話，人們只能用「大陸經濟（八九）年底會崩潰」、「鄧小平二年內會垮台」之類的不甚嚴肅的外行話來應付輿論界。講這類外行話的實際結果是

不斷地減少自己的公信力，使民運成爲一個空話與大話的論壇。此外，民運也應該對一些重要的國際問題與反對黨政治的理論問題作一些瞭解、分析與研究，充實自己。唯此，民運（特別是其領導人）才能在國際舞台上站住腳。今天的國際社會畢竟不是一個只靠虛名就能長期混下去的舞台。海外民運如果不能在這方面有所進展的話，它將永遠落後於時代的潮流。

第四，財務問題永遠是任何政治流亡組織的一個相當大的難題。目前看來，由於各界的支持，各主要民運組織均能生存下去。但是，各主要民運組織都面臨一個怎樣節源開流，並且完善其內部財務制度的問題。筆者認為，像學自聯那樣定期檢查並公佈（至少在其組織內部公佈）帳目的辦法是可取的，而像某些民運組織中連其理事與監委主席都不知道錢的來龍去脈的做法是不稱職的。財務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二個人的做法將會（如果沒有已經）引發內部矛盾與衝突，削弱民運組織的團結與公信力，斷送其長遠的財源。

第五，海外民運的公共關係要逐步走出留學生與唐人街的小圈子。像學自聯那樣的院外活動是一個較好的開端。但是，這種院外活動的性質太專門，只涉及到個別政策或立法問題。它還不是對所在國（這裡是指美國）的對華政策的主流派的影響。至少在今後的一、二年內，西方各國都會有面臨一個怎樣重新評估它們的對華政策的過程。這也將會是一個研究與制定新的對華政策的過程。如果計劃、運作得法（這裡的得法是指理解所在國的基本國家利益與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利益的共同點與不同點，並且懂得別人的邏輯與語言），海外民運在這方面應該會有更大的潛力。

此外，各民運組織應該有計劃、有組織地去接觸，利用國際媒介新聞界，而不是消極地等着被採訪。在這方面，海外民運更需要發展自己的理論研究與形勢分析，逐步在國際社會中確立自己的成熟形象。

\*

# 楊愛倫移民顧問公司

ELLEN YOUNG IMMIGRATION CONSULTING CORP.  
紐約州政府註冊

接辦各類移民及入籍案件，延期及轉換身份，代填表格，法庭翻譯，文件翻譯公證。  
本公司聘有經驗豐富之專業律師協助處理  
下列案件、意外傷害、地產過戶、離婚遺囑、公司登記、代遞法院傳票。

41-15 JUDGE STREET, ELMHURST, NY 11373  
TEL: (718) 565-8218 FAX: (718) 458-0872

皇后區艾姆赫斯特法官街41之15號7號地鐵82街橋區車站G.R.車 ELMHURST AVE.站



# 民主運動不從屬中共路線鬥爭

八九民運脫離了中共路線鬥爭的軌道  
人民運動獨立性：反對黨與職業政治家

胡耀邦、趙紫陽還不是民主派  
民主運動包括在經濟上清算官僚階層

亞衣

本文主要討論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獨立於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或派別鬥爭之外的必要性。

一個陳舊框架：

用中共路線鬥爭觀察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大陸系統地接受過文化教育的人，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幾乎所有歷史課本都在證明毛澤東的話，全部文明史都是階級鬥爭史、人們難以知道作為經濟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歷史。至於中國現代史，則大致等同於中國共產黨黨史。以至於有些專家主張中國現代史之分期自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開始；即便主張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史起點的學者，也認同「五四」是中共成立的前奏及思想組織準備，在中共當權者及歷代理論權威眼裡，共產黨是歷史的主角。於是，中小學歷史教師只好對學生說：抗日戰爭就是共產黨打日本鬼子，沒有國民黨的份；而「十大路線鬥爭」貫穿一切的「中共黨史」，則成了文理科大學生的必修課程。

幾十年一以貫之的這種教育，已經在一個代中國知識份子中形成一種傳統，它在各個層面上，甚至在潛意識中不知不覺又強烈地影響着人們的思维方式 and 行動規範。多年來人們關切地注視着共產黨領導集團名單中誰上誰下，哪一些人得勢哪一些人消退。他們把自己對國家前途的關心，對人民未來的期望，化為對中共黨內某一個、某一批領導人的擁護、支持的行動。在文化生活中，那些歌頌古代或現代「包公」、「海瑞」的電視劇、小說、報告文學長期走俏；在政治實踐中，人民運動的主題歷來是對黨內某一派的討伐和另一派的擁戴。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不用說了，直至一九七六年極為壯觀的天安門「四五」運動，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及平民們也是把自己的意願充分表達為對故總理周恩來的追思和對出而復退的鄧小平的支持。這種民主運動的實質，從整體上還只是充當了中共黨內路線鬥爭某一方的群眾基礎。人民對「民主」的理解與訴求，基本上還是要求一個黨內的「為民作主」的領導人物出現。



歷次政治運動中的中國老百姓

外在於中共派別鬭爭，  
是八九民運的可貴之處

十三年以後發生的「六四」天安門運動的重要特徵之一，在於它第一次顯示了人民運動的獨立性。

幾個月來，在對一九八九年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中國民主運動的反思和檢討聲浪中，有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意見。一些人認為「六四」運動之所以失敗的一個原因在於青年學生不了解黨內上層鬭爭，「街頭政治」沒與黨內改革派取得一致，或者說，「黨內改革派和社會上的民主派沒有很好結合」。(陳一諮「共產黨自己毀了自己」，「世界日報」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

大致可以肯定，這是一個事實。運動的起始，是大學們追求民主自由的自發行動，毫無黨內路線鬭爭背景。隨後是一般知識份子和市民的參與。至於與黨內改革派有較緊密聯繫的，作為趙紫陽系統不同層次的智囊或顧問的「精英」的整體介入，更是後來的事。它主要表現為「五·一七」宣言和五月十九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等四單位聯署的「關於時局的聲明」。但是在事實上，這些動作並未能支配整個運動的主流方向。

從運動開始直至五月十八日學生代表與李鵬公開對話，學生們的要求基本上圍繞於「要求對話」，「要求給運動平反、肯定」，「要求傳媒如實報導和新聞自由」上。「五·一七宣言」則明確與前一天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的談話相呼應，指出鄧小平是「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個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五·一九聲明」更是呼籲要「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見吳牟人等編「八九中國民運紀實」，上冊第二二七頁，二五九頁)然而，學生們對此並未表現出太大的興趣。總之，整個

運動所面對的是共產黨當權集團，而不是該集團的這一派或那一派。從運動口號(包括「打倒官倒」)到運動方式(靜坐、遊行和絕食)，都沒有什麼明顯的倒李保趙的內在動機和外觀傾向。這樣，整個運動在時間和空間上都不同程度地脫離了中共黨內兩條路線鬭爭或派別鬭爭的軌道。本文不準備評價這種脫離究竟是優點還是缺點，它是否真是導致運動最終失敗的原因。我只是認為，就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的進程而言，它總歸要邁出這獨立的一步，現在，這一步終於邁出來了。



人權、自由、平等、民主——六四運動的獨立口號

中共黨內「改革派」不是民主派

有些人之所以把八九中國民運的這一特徵視為缺憾，是因為他們的目光習慣性地注視於中共黨內領導層的派別鬭爭，認為黨內改革派(或曰「開明派」)是中國民主運動希望所在。在思想傾向上，在言論表達上，這些人每每顯現出對中共某個派別或代表人物的過份鍾情，甚至到了不自覺地為這種代表人物的錯誤(或罪惡)作某種辯解的程度。

在分析「六四」慘案的成因時，有人指出是中共黨內保守集團(總後台為陳雲)採取「激怒鄧小平、犧牲趙紫陽」的策略所導致。(陳一諮：「共產黨自己毀了自己」)這樣，大屠殺的元兇首惡鄧小平成了一個「被激怒者」。還有人把「六四」以後(請注意是六四以後)的中共高層劃分為陳雲一類的「專制派」、鄧小平一類的「開明專制派」以及趙紫陽一類的「全面改革派」。(丁學良：「六四之後大陸政局的走向及對台灣的影響」，「世界日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七日)而此時的趙紫陽派在中共高層早已不復存在。不久前，民陣某些負責幹部在台灣發表講話預測未來中國民運時仍希望趙紫陽復出「以凝聚改革派」並「進而成為主流」。(「中央日報」，一九九〇年一月五日)

我不明白上述說法的事實根據何在。實際上，在整個反對人民民主運動過程中，在「六四」大屠殺的準備與實施過程中，鄧小平與陳雲在基本利益上已經沒有區別。「人民日報」四·廿六社論，是鄧小平四·廿四講話的忠實表達。(此時的鄧小平已清楚表明「不能完全避免流血」，要「快刀斬亂麻」)；之後李鵬、楊尚昆、陳希同等人的作為，則是完全依照鄧小平的意願進行的。蹣跚趙紫陽起用江澤民

的決定，是鄧小平在五月九日和三十一日兩次召見李鵬、姚依林等人時宣佈的。六四以後的「勝利大檢閱」，又是以鄧小平的公開露面而昭示天下。完全可以說，鄧小平是這場民族新修劇的總設計師或總導演。在中共領導集團內，沒有一個人能取代他的這個角色。（寫到這裡，我建議有興趣的讀者重讀一下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時對鄧小平在清華大學一次講話的稱讚。那次講話說到了殺人問題。）因此，把「開明」這個修飾詞再加在「六四」屠殺以後的鄧小平身上，實屬不當。

稱得上「開明」的是趙紫陽，還有已故胡耀邦。因此現在更需要討論的是，趙、胡這一類開明派或改革派是不是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的依托。我以為不是。因為他們不是政治上的民主派。

在我看來，政治上的民主派或民主政治家至少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尊重基本人權，主張人道主義；(二)主張政治平等，承認反對派存在的權利並在法律保障下進行平等競爭和自由選舉；(三)主張言論自由和新聞監督。

讓我們用這些起碼條件來評價中共黨內的開明派或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如胡耀邦、趙紫陽，或者萬里、胡啓立等人。在「人道主義問題」上，他們的言論基本上沒有越出胡喬木寫的那本關於人道主義的小冊子的內容，即只在「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框架內游動。（倒是鄧復方有過幾次「出格」言論，也許他具有太子和殘疾人基金會負責人的雙重身份而無所顧忌。）關於基本人權，則閉口不談。他們比公開承認並宣揚普遍人道主義的蘇聯政治家差了一大截。在多黨政治、競選制度等現代西方民主上也絕不敢打「擦邊球」，總不忘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和「四個堅持」，雖然有時也有點言不由衷。在言論自由、思想開放上，他們左顧右盼，時緊時鬆。胡啓立在全國文代會上幾次講話，確實成功地在中國文人中幾度掀起「春天來了」的歡呼。但同樣是他，下令查禁文藝刊物「百花洲」。趙紫陽出色地用「新技術革命浪

潮」衝擊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也發出過反自由化「不要隨便擴大到」經濟理論界的指令，在「八九」民運中又讓報紙電台「自由」了一陣子，但終究未能使「新聞自由」的口號登堂入室。至於胡耀邦下台前夕實「新聞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的講話，萬里與方勵之爭辯時的精道態度，人們都還記憶猶新。

毫無疑問，這些人是共產黨內的開明派、改革派，但稱不上「全面改革派」。因為缺少了政治改革這種其重要的一面。他們不是嚮往現代民主，主張由民作主的民主派。我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內沒有民主派，有，但他們沒有進入領導集團，或者早已被清洗出黨。也不是說共產黨領導集團內不可能有民主派，只是現在還沒有。

需要獨立的反對黨和職業政治家

於是，以建立現代民主社會為目標的中國民主運動就不能再使自己從屬於中共黨內領導層中的某一派別，不再受中共派別鬥爭所左右，而將希望轉向其當然的主體——中國人民的獨立性上。只有這種獨立性才是其成功的保證。在共產黨外建立一個或幾個獨立的反對黨，形成一批非共產黨的為民請命的人民政治家（包括職業政治家）就是這種獨立性的重要內容。

已經有一些主張建立反對黨的文章。歸納起來，大致提出了兩方面的理由。其一，共產黨頑固的獨裁體制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礙。要消除這一障礙，沒有獨立的、強大到足以與共產黨相匹敵、相抗衡的嚴密的反對派政治組織即反對黨，是辦不到的；其二，即使撤開要「打倒共產黨」這個問題不談，若要在未來中國建立一般民主政治制度，也必然是一

他們是不是民主派？



種多元政治，其組織表徵就是兩黨或多黨制衡。所以，有共產黨以外的反對黨存在，就是中國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本文不再重述對上列兩點理由的論證，只想說一說建立獨立的反對黨與政治妥協的關係。



經常聽到一些人宣稱民主政治就是妥協政治。在討論「民主中國陣綫」的策略口號和要不要提「打倒共產黨」時，也有人幾次以波蘭團結工會為例說明「妥協」的重要性，盛讚團結工會如何善於對波共政府進行「黨人的」妥協。我以為這些論者似乎忘記了或有意迴避了一個重要前提，即在團結工會的這些妥協以前掌權的波蘭共產黨所作的妥協：承認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同瓦文薩對話。共產黨的妥協是被迫的。這是因為在它面前矗立着一個獨立的、強大的，在政治上已無法消滅的「反對派政治組織——團結工會。這一點非同小可。在獨立的、政治上的反對黨根本沒有形成時，修談如何同獨裁的、決不承認任何民主政治組織（無論民聯，還是民陣，中共政權都宣佈它們為「反動組織」）的當權派進行妥協，實在使人感到不知所云。

與建立獨立的反對黨聯繫在一起的一個問題是形成一批獨立的人民政治家。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大忌。共產黨執政以來，是從不願意讓平民百姓過問政治的。最多讓你充當一個他們「運動群眾」時的籌碼。毛澤東在文化革命中號召人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順着他所指的方向攻打其政敵。在共產黨官僚眼中，參政從政也是他們的一個特權。誰要在國內或國際政治問題上說三道四，那麼等着你的便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帽子。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的共同罪名，就是不安本份而參與政治。不久前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的批判王若望的文章，一開首便攻擊他不搞創作搞政治，不當作家當「政客」（樂保俊：「王若望其人其事」，「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〇年一月十日）。

我們不能忘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政治舞台上首批登場的非共產黨政治家。他們就是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在政治上向共產黨發起英勇進攻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浦熙修等，他們尖銳地批評共產黨的「黨天



這裡有職業政治家嗎？

下」，鼓吹民主黨派與共產黨「輪流執政」；認為民主黨派領導人不僅可當副總理、副委員長，也可任正職；主張在共產黨之外搞「政治設計院」。可惜這些人很快就作爲釣起來的大魚一個個被消滅。我以為，一九五七年這場風波中非共產黨政治家的獨立活動是鄧小平一直不願爲「反右鬥爭」平反的重要原因。這種活動對共產黨的領導權是極大的威脅。即使在這十年「改革開放」時期，共產黨領導集團對於魏京生、方勵之這些不同層次的「持不同政見者」也是狠下毒手的。所以，只有在海外，才是王炳章、胡平等入獨立自由地發表政治見解的地方。

「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造就了一批具有獨立性的民間政治家，王丹、柴玲、吾爾開希等名字響亮地越出了國界。除了青年學生，還有一批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挺身而出，例如劉曉波、侯德健。即使是原來與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某一派別有各種聯繫的顧問或智囊成員，也在坦克的隆隆聲中被用到了體制之外。

可以說，現在是獨立的人民政治家產生和成長的好時機，包括職業政治家。我之所以在這裡特別提到職業政治家，是因為中國的民主運動需要他們。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建立民主社會是極其困難的事，沒有一批全心全意，以中國民主政治爲自己的事業目標的職業政治家，是搞不好的。在我看來，各個民主政治組織，政黨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就應當是職業政治家。「民陣」的幾位領導人會幾度聲明不當「職業革命家」，反對「職業革命家」。對毛澤東、鄧小平之類「職業革命家」的仇恨心清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推廣到否認一切職業政治家存在的必要，我以為極不妥當。所謂職業政治家並不是指只懂政治權術不懂其他的黨棍，他們仍然可以有（而且通常也必定有）其他的專業依托；所謂職業政治家也並非指終身政治家，像卡特總統那樣任期滿後仍然可去經營農場。從這個意義上說，方勵之也



台灣多黨政治中的一幕

可能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某個階段成爲職業政治家，成爲某個反對黨的領袖，這與他的天體物理學家身份並無衝突。總之，大陸中國不再需要毛澤東、鄧小平、鄧穎超式的「職業革命家」，但實在需要有自己的布什、戈爾巴喬夫、李登輝、哈維或阿基諾；需要自己的瓦文薩、葉利欽、黃信介、朱高正或溫尼·曼德拉。

### 反對官僚剝削集團

是人民運動的當然訴求

在評論中國人的民主素質低下時，有的朋友以八九天安門民運爲例，說真正把廣大民衆動員起來的是「打倒官倒」之類的口號，而不是政治上的民主要求。我承認中國百姓的民主素質較歐美諸國來得低，但我不贊同這些朋友所作的推論。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在人民民主政治運動中，常常會出現，甚至必然伴隨有人民的經濟要求。即使國民黨統治時代的學生運動，也是將「反飢餓」與「反迫害」並提的；第二，民主政治的追求或實現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人民能自主地表達個人或集團的意願，無論這種意願是直接政治的、經濟生活的還是基本人權的。所以，在人民運動中，不管是「反對官倒」，還是「反對攤派國庫券」，都會成爲一個具有民主政治意義的口號。如果現在有人在長安街刷上「陝北某山村一戶三口被凍死」或「某公子在瑞士銀行私人存款三十萬法郎」的標語，那麼，它就是一種政治的顯示。

本文不準備探討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官倒」的複雜歷史現象。兩年前我曾認爲「官倒」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進行「原始積累」的必經之路，雖充滿血腥和污垢，却不失進步的歷史意義。現在，從人民民主運動的獨立訴求出發，我以爲「反對官倒」是大眾百姓天經地義的權利。

四十年來在共產黨反人民政權重壓下生活的中國大眾，他們要推翻的不僅是獨裁者的政治壓迫，而且還有經濟剝奪。他們嚮往的是民主的政治體制、自由的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伴隨的良好物質與精神生活。而「官倒」恰恰與人民利益背道而馳。它違背了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原則、利用獨裁政權的政治支撐對人民大眾進行經濟剝奪和超經濟剝奪。在「官倒」

出現以前，共產黨官僚集團對人民的經濟剝奪主要是間接的，即用國家財政支付各級官僚各種特殊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享受。「官倒」出現以後，官員們的行政權力更可以通過它直接地轉化爲一種貨幣收入（例如一紙批文可以轉變爲多少萬人民幣）。這樣，官僚集團對人民的剝奪的數量便迅速地增長，人民大眾的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也就迅速加劇。

因此，「官倒」（無論它是否加上「民營企業」的外衣）在本質上是與人民大眾的利益相衝突的。儘管在民主運動的某個時期，人們的政治要求暫時地掩蓋住了其他經濟上或基本人權上的要求，但總有一天，這類要求還會在適當時機被尖銳地提出來的。東歐諸國人民在推翻了共產黨獨裁政權後迅速地對共產黨「秋後算賬」——包括清算官僚們的經濟罪惡，就是一個明證。在中國，老百姓也會對共產黨權者們的貪污、盜竊、侵吞和揮霍國家寶財以及「官倒」進行徹底的清算。這是獨立的人民民主運動的天然結果。任何一個「民運人士」都要像尊重人民的政治權力一樣尊重他們的經濟利益。

人民的心聲：「讓貪官污吏滾下台！」





## 中國農業的深層問題

# 土地制度

密德

美國紐約大學

一、「耕者有其田」夢想的實現

土地在歷史上一直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一個民族的興起，往往伴隨着對異域的征服和版圖的擴大。對於中國這樣很早就已跨進農業社會的國家，土地更被視為社稷之根本。在先哲賢人的教誨中，對土地制度的論述也隨處可見。他們都把理想的土地制度視作立國安邦的基礎。幾千年的史實也雄辯地證明，歷代皇朝的更迭，往往和農民造反相聯繫。而推動農民造反的，無非是耕者有其田這一理想的執着的追求。新朝代建立之初，也往往把重新劃分田地作為恢復社會秩序、繁榮經濟，贏得民心的首要大事。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在工業尚未成為社會的主要經濟部門之前，人口的繁殖和土地資源的相對不足使兼併之風無法避免，往往數代之後再度形成「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的不均局面。只要一週飢饉，大批無地農民就會挺而走險，造反的烽火迅速燎原大地。中國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便是這麼一種週而復始的循環。即使到近代，土地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先有幾乎摧毀清皇朝的太平天國運動，後有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戰爭。由此可見，即使在本世紀中葉，土地問題在政權的更疊上，仍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耕者有其田是中國農民幾千年來最執着的夢想，這是因為他們的命運和土地緊緊相聯。在一年又復一年的耕耘、施肥、播種、灌溉、鋤草、收割的循環中，作着他們永遠作不完的夢。儘管他們把自己整個生命投在黃土之中，儘管他們身強力壯，吃苦耐勞，無情地吞嚥着他們肌體和歲月的黃土，給他們的回報却一直是菲薄的、吝惜的。除了大自然的苛刻外，他們還要忍受歷代統治者的巧取豪奪。

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使億萬農民相信，耕者有其田的夢想是可以實現的。土地改革的口號不但使共產黨被廣大民衆視作救星，而且也成為瓦解國民黨軍隊中大部份出身農民的低級將士的強大心理武器。

在四九年後的最初幾年裡，中共確實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新政權用殘酷鬥爭的方式，急風暴雨般地清算了地主階級，從而使中國的土改帶有特別濃厚的血腥氣，與日本、台灣或南朝鮮通過和平購買的方式完成的土改相比，其弊病是明顯的。

不要說對一般的地主，就是對違法的惡霸地主，是否需超越過司法系統而對他們作殘酷的清算、人格的侮辱以至剝奪他們的生命，是應該重作檢討的。況且當時的首要任務不是鎮壓地主的武裝反抗（這在中國一般來說並不存在）而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以加速恢復和發展經濟。無地、少地農民只要能得到土地，便已衷心擁護土改。地主富農若可部份得到補償，對新政權之敵視自然也會減輕，其反抗也可大部份瓦解。同時他們或本身便有知識、有經營能力，或其親友、子女為受過良好教育者，對當時的中國而言，都是最應珍視的。若使他們保有某些財富或平等之公民地位，他們或可將其才智、資金貢獻於農業，或可轉移至其他經濟部門。這在日本、台灣、南朝鮮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辦法。

不過封建地主階級畢竟是歷史上應淘汰之階級，所以土改的方向是正確的。由土改所爆發的九億農民的生產熱情是驚人的，短短幾年便使經歷了幾十年戰爭和內亂的中國農村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到一九五二年，農業生產的指標如糧食、棉花、大牲畜的年底存欄數、水產品等都已顯著超過歷史最高產量。土改之後，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一個自耕農階級取代了佃農階級。但這個大有希望的階級沒有存在幾年，便因為中共的自食其言而迅速從歷史舞台上消失。

## 二、自耕農階級的消失使中國農業失去內在活力

自耕農對土改的熱愛，對耕作技術的精益求精，以及由於擁有地權而產生的自尊、自豪

和自信，使這個階級成為大有希望的階級。但是一個富裕的、自立的、有進取心的自耕農階級必定獨立於黨的權力之外。習慣於操縱民意，一心追求對民眾生殺予奪的至上權力的中共，是無法容忍任何一個階級與之分庭抗禮的。現實是，土改之後欣欣向榮的自耕農，事實上已不再有求於中共。相反，自耕農一旦和城市中的私營企業家階層携手同盟，便可組成足以動搖中共獨裁根基的反對勢力。把權力置於較經濟發展更為優先地位的中共前領導人如果說晦於經濟發展的規律的話，却諳於一黨專政的權術。於是，他們喋喋不休地向缺乏政治經驗的民眾描繪一幅農村兩極分化後的地獄圖，在威脅利誘下，在短短幾年時間裡，使農民經歷

了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諸運動，在「走共同富裕道路」這一頗合乎國情民意和文化傳統的漂亮口號下，一個欣欣向榮的自耕農階級消失了，被旋風般的各類合作化運動弄得暈頭轉向的農民，在沒有意識到之前，已淪為喪失一切土地和生產資料，並喪失人身基本自由和權利的農奴。

客觀地說，互助組運動和合作化的初級階段還有其客觀的合理性。互助組是換工性質，並不涉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統一經營，因而不涉及土地的集體化和收成的統一分配。初級社也還沒有否定土地的私有制，成員可以自地帶着土地加入或退出，並且加入的農民其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例如牲畜等）是參加分



紅的。這種合作制不但在分配上防止了後來大肆盛行的絕對平均主義，而且在經營上也有來自內外的壓力。經營不善的合作社，其成員可自由退出，這使效率低的合作社自動淘汰，這是內部的壓力。經營得法合作社則構成外部的壓力，這些合作社因能吸引越來越多的農戶而擴大規模。從資料來說，到一九五六年止，即在高級社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之前，中國的農業生產是穩步前進的，農民的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

一九五七年起的高級社，已帶有人民公社的種種弊端，例如土地歸集體所有，不再參加分紅、農民已沒有退出的自由、收入的分配雖名義上是按勞分配，實際上徒有虛名。這種帶有嚴重弊病的農業組織成立不到一年，一九五八年又由人民公社所取代。人民公社的成立，標誌着中共對農民的控制已達到最大程度，或曰農民的社會地位已降到僅次於奴隸的地位。在公社化的最初幾年，由於共產風的肆虐，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連續幾年的飢饉餓死了起碼幾百萬農民。這使得醉心於把農民組織在一種准軍事共產主義體制中的中共前領導人不得恢復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但他們從來不忘记加上一句「在條件成熟時，過度到以大隊以至公社一級的所有制去」。在文革上，這種窮過度會又大肆盛行了一陣。

不管公社制如何帶有均富（應說是均貧）的色彩而使農村中最懶惰、最不求上進的一批農民覺得還可接受（由此推想，可能在奴隸制下，也會有些得寵於主人的家奴會反對結束奴隸制），這種農業組織是根本違反農業的生產規律的。現在又以世界革命的最後堡壘自據的中共，幾十年來一直扮演一個偏執狂和自大狂的角色。盡管經過二十多年的反覆試驗證明，人民公社無法解決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中共甚至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還試圖強化人民公社這種違背人性的組織。即使在承包責任制已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後，中共領導人中的保守派

還試圖把責任制限制在邊遠和貧困地區。然而不管中共給人民公社抹上多麼溫暖、漂亮的色彩，冷峻的現實是在公社制度下，二億多人民掙扎在飢餓線上，全國人均佔有的糧食逐年下降，副食品供應越來越緊張。一個幾年來以農立國的民族，逐漸淪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糧食進口大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土改後維持土地私有制不變的日本、台灣、南朝鮮，盡管其農村存在這種、那種的問題，不但沒有出現中共所描繪的人間地獄的景象，還因為農業的成功而有力地推動了工業化的最初階段。偏偏在被中共厚顏無恥地描繪成人間天堂的人民公社體制下，出現了餓殍千里的地獄景象。在這種體制下，農民既已淪為農奴，他們已喪失最後的生產積極性。以勤勞刻苦著稱於世的中國農民，在公社制下養成了千方百計裝傻偷懶、磨洋工、混工分的心態。蘇聯搞了五十年的集體農莊，已使得蘇聯農民忘了怎樣種好地，正在求助於中國農民。可以想見，如果公社體制延續的時間再長些，中國農民精耕細作的傳統也會喪失殆盡。

### 三、責任制下的佃農階級並無投資興趣 ——中國農業的潛在危機

公社制度的最大弊端在於違背農業生產的客觀規律。不像工業生產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前後工序是密切相聯，並且有容觀標準可對每一工序的數量和質量加以檢驗，從而對勞動的監督和計酬成爲相對容易的事。農業生產在空間上的散佈性和前後工序在時間上的廣延性和間隔性，以及自然因素造成原因和結果的不確定性，使農業勞動的監督成本大大增高，從而使得在農業生產中，有效的勞動監督事實上徒具虛名。既然生產的最後成果由代表國家利益的公社所掌握，農民並不關心如何增加最終產品，他們關心的只是如何通過混取更多的工分來獲取較大的一份。農業生產的天然合理的單位



是家庭。在家庭為單位的體制下，最終產品掌握在農民自己手中，不管是分成制還是定租制，農民都有積極性擴大最終產品，以使自己留有更多的產品。這早已成爲經濟學的常識。

所以當酒足茶飽之後，在橋牌和網球幾乎消耗了所有精力之後，還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純潔性來麻醉自己的中共官僚們沒有恩准之前，掙扎在貧窮和飢餓之中的農民已堅信人民公社不是人間天堂，毅然決然地搞起包產到戶來。這種責任制說穿了不過是使農民由農奴的地位提升爲定租制下的佃農的地位，國家是大地主，各級鄉、村領導是大、小管家，代表國家收取定租。在定租制下，土地不屬於佃農，但只要完成定租（即公糧的訂購任務），剩下一切都屬於佃農。因此，農民在地裡幹活出不出力，動不動腦筋，已不需專人監督。

農奴制下的被迫勞動成了定額制下的自覺勞動。責任制的成功使它不脛而走，並使中共的改革派有足夠的證據回答保守派的責難。雄辯的事實是，隨着責任制的逐漸推行，徘徊了二十幾年的中國農業突然恢復了活力，到一九八四年止，糧食、棉花、副食、水果等迅速增長，並在糧食播種面積逐年下降的情況下，糧食總產和人均佔有量都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實行了幾十年的票證制逐漸成爲過時的制度，城鄉的市場可謂一派興旺。這可稱得上是意外送到中共手中的甜果，從天而降的禮物。儘管中共又一次將農業的成功寫到自己的功勞簿上，事實是責任制既非中共的首創，又非中共所自願推行。可能中共還不一定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只是因爲人民公社實在不爭氣，經過二十多個春秋仍無法證明其存在的價值。面對向全國迅速蔓延的責任制，中共實在無顏面再阻擋。

由農村開始的改革，並非表明中共的先知先覺，中共三十年的統治已向人們證明，中共是覺後知後覺或無知無覺的頑固派。當東歐、蘇聯的大地在五十年代後期吹起改革之風時，中共以反修爲先鋒自據，整天潑婦罵街般地指責這個國家是叛徒，那個國家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在國內又掀起文革狂瀾，把大好江山弄得滿目瘡痍，國民經濟幾乎處於崩潰的邊緣。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忽然祭起東歐、蘇聯早已搞過的改革、開放，重拾人家的牙慧，並厚顏無恥地又把人家的發明歸功於自己。在東歐、蘇聯試行了一、二十年，在資本主義國家已實行了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行之有效的辦法，甚至是一些常識，一下子又成了中共某些領導人的智慧的結晶、天才的思想火花。包產到戶並非什麼新創造，古已有之。中國目前的責任制中的弊病還很嚴重，從長遠看，還有嚴峻的農業危機。但好大喜功又思想膚淺的中共決策人被責任制最初幾年的奇蹟所陶醉，以至得意忘形地宣佈中國從此拋掉了農業問題的包袱。

然而話聲未落，農業即出現困境，自一九八五年來，種植業一直停滯不前，總產量也在一九八四年的水平上徘徊不前。即使被大吹特吹的一九八九年的收成，也只是和一九八四年的收成持平或略低。鑒於中國目前每年幾乎淨增加一千五百萬人口，這表明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這五年間所新增的約七千五百萬人口，農業並沒有能力負擔他們的口糧。結果當然是人均口糧的再次逐年下降，票證的再次恢復。

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爲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共對四項原則的迷戀（實質是對黨天下，或鄧家天下的迷戀）使中共無法容忍徹底放棄對農民的控制，無法接受自耕農階級的崛起。中共強調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是想讓農民長期處於佃農的地位，使他們在土地的使用權問題上永遠有求於中共。如此，中共就可操縱他們，剝奪他們，讓他們爲自己提供源源不斷的貢品。然而正像歷史對中共鐵了心推行的人民公社這一現代農奴制的懲罰是農業的長期萎縮一樣，歷史對中共目前的佃農制的懲罰是使農業失去持續增長的後勁。

中共一直不肯把在土改時更已屬於農民的土地還給農民。在責任制下，土地是按人頭分下去的。農民只有使用權，並無所有權。如果人口是靜止不變的，這樣做也無妨，因爲農民事實上可以長期使用下去。問題是人口在增長，而土地的面積却因爲工業和民宅用地而日見減少。在均田制下，新增人口自然要求自己的一份，不然就會覺得不公。這樣人口的壓力就導至經常性的土地糾紛和經常性的土地調整。從各類報刊、特別是農民日報的報導來看，鄉村幹部任意收回農戶的部份乃至全部土地的事層出不窮。一九八八年順義縣強迫收回部份農民承包的土地更成爲全國性的新聞。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能不產生信心危機。凡到廣大農村走一走的人，不難發現一方面農民手頭有了錢就蓋房或作其他非生產性的投資，例如蓋廟修墳，一方面對農村的基礎設施的投資，特

別是與土地有關的投資急劇下降。有機肥的施用量也大量下降。幾千年來被視爲命根子的土地，在責任制下的農民眼中，只是能使他們近期內獲利的工具，而不是傳之子孫的砒霜。佃農的短期行爲，特別是在租約行將結束時拼命掠奪地力的傾向，在中國農民身上暴露無遺。這種短視的行爲在擁有土地的自耕農身上是看不到的。

#### 四、給農民以真正的土地所有權

一種好的制度創新，不但能使經濟從無效率的狀態迅速移至有效率的狀態，而且通過促進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加速積累而使生產能力不斷提高。這樣的制度創新不但有短期的正效應，而且有長期的正效應。責任制下的土地制度雖能促進佃農增加勞動供給的數量，及提高他們所提供的勞動的質量，却無法提供有力的誘因，引導農民對土地作長期的投資，因而使責任制下的佃農的儲蓄有極大的增長，可惜大部份都流到非生產領域。很明顯，世界上沒有那麼便宜的事，又要馬兒走，又要馬兒不吃草。只要不給農民以真正的土地所有權，農民不會冒風險，下血本對土地作長期的投資。中共現在又在鼓吹增長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從而使本已拮据的財政進一步捉襟見肘，也使其他諸如教育、科技等部門的處境更加困難。在農民由佃農變爲自耕農前，農民是不會去爲中共分擔這份困難的。究竟中國的農業何去何從，人們還要拭目以待。但有一點是可以預料的，在土地制度沒有進一步的創新之前，八十年代初期所出現的農業奇跡是再也不會出現了。如果農業的僵滯局面繼續延續下去，中共改革的最後一點老本都會蝕光。那時，歷史會以什麼方式懲罰統治者，就由不得缺乏起碼想像力的中共的選擇了。

\*

# 社會主義制度解體後的一種新模式

劉連增

八十年代末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迅速解體，給人類帶來了新的希望，它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運行已經到了盡頭，一種偏離人類社會發展主流的社會制度體系，行將在人類歷史中消亡。但是，社會主義制度解體後，會向何種社會制度形態轉換呢？人們自然會回答，向西方社會制度模式轉換。然而，真正的情況或許有所不同，這裡，我提出一種向新的社會制度模式轉換的可能性。

在理論上，如果我們以政治和經濟兩種制度來劃分社會制度形態，又以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自由經濟與集權經濟來標誌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我們就會發現，人類的社會制度模式應該有四種，即：民主政治—自由經濟；民主政治—集權經濟；獨裁政治—自由經濟；獨裁政治—集權經濟。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除了民主政治—集權經濟模式尚未出現外，其它三種模式均先後出現。一般說，社會主義國家屬於獨裁政治—集權經濟模式，西方國家屬於民主政治—自由經濟模式。

在已經出現的三種社會制度模式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即便是相同的社會制度模式，在程度上仍然有所差別，基本上可分為低度模式和高度模式兩類。例如在民主政治—自由經濟模式中，美國屬於高度模式，即高度民主政治與高度自由經濟，而印度屬於低度模式；在獨裁政治—集權經濟模式中，中國大陸屬於高度

模式，即高度獨裁政治與高度集權經濟，而南斯拉夫屬於低度模式。

社會主義制度解體後，會向哪種社會制度模式轉化呢？從理論上講，它向其它三種社會制度模式直接轉化的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主義制度實踐的結果和所具備的現實條件來看，它向兩種社會制度模式直接轉化的可能性較大，即高度模式向獨裁政治—自由經濟模式轉化，低度模式向民主政治—集權經濟模式轉化。

為什麼社會主義的高度模式向獨裁政治—自由經濟模式轉化的可能性較大呢？這是因為，實行高度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皆具某些共同特徵，它們是：(1)基本上屬於經濟自給型國家，對國際社會的經濟依賴程度較弱；(2)都是以暴力革命取得政權，並經過長時期的創建過程；(3)起點是封建色彩較濃的社會形態；(4)幾乎沒有民主制度的歷史；(5)軍隊和政黨有長期的融合過程。在這些特徵下，社會主義制度一經建立起來，其政治制度自身裂解的可能性較小，對民主意識、思想的接受也十分困難。同時，由於政權本身是通過暴力取得，用暴力方式鞏固政權為理所當然，這便大大增加了暴力變革社會制度的難度。可以說，沒有一定的偶然條件出現，以暴力方式達成社會制度變革的可能性甚微。然而，這些國家却有着漫長的私有經濟歷史，且多屬於資源型國家，當集權經濟走到極端，也就是經濟走向崩潰，並對政治統

治產生足夠的威脅時，自由經濟模式的產生便成為可能。

社會主義制度向獨裁政治—自由經濟轉化的基礎是公有制向私有制轉化。有人認為這種轉化幾乎不可能。我認為，這並不是問題的實質，它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從理論上說，公產與私產之間不存在不可逆關係；從實踐上看，獨裁政治與集權經濟完全可以分離。問題是如何尋求一種比較好的解決方式。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前提必須明確，就是不能把國家作為當然的資產佔有者，它只是把資產還予人民，因此它沒有資產利益所得問題，也就是說，國家與人民之間不存在資產分割問題。明確了這個前提，餘下的問題找到公平的解決方法並不難。

實際上，實行高度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不多，更多的是低度模式國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大多屬於此類。因此，我們重點討論的是這些國家向民主政治—集權經濟模式轉化的可能性。與高度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較，低度模式國家的共同特徵基本相反。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國家政治制度的裂解比較容易，但經濟制度的轉換比較困難，換句話說，它們容易走上民主政治之路，但不容易走上自由經濟之路。關於前者，事實已經作出回答。關於後者是因為：

第一、自由經濟的充分發育必須經歷一個資本積累過程。資本積累的方式有三種，一是

靠資源積累，即開發原材料產品；二是靠勞動積累，即開發勞動密集型產品；三是靠技術積累，即開發技術密集型產品。低度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三個條件均不充分，甚至是缺乏，這就造成它們資本積累的能力很低。如果整個世界的情况均是如此，或許它們還有緩慢積累資本的餘地，但當代世界不同，留給它們的餘地大大縮小了。

第二、自由經濟的充分發育必須通過市場競爭。參與市場競爭的條件有兩個，一是所有競爭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二是競爭者都是站在同一起點。當代國際社會的兩端發展，已經形成了西方國家獨佔市場的整體壟斷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低度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不可能處於平等地位和同一起點，因而幾乎不構成競爭。如欲競爭，只能強行擠入，但那需要大量資金的無效付出為代價，顯然這些國家根本辦不到。

第三、自由經濟的發展是以利潤原則為核心，而利潤原則則沒有絲毫道德色彩的。低度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自由經濟的自我發展十分困難的情形下，只能依靠吸引發達國家的投資來帶動自由經濟的發展。但是在利潤原則作用下，由於這些國家普遍的經濟開發指數不高，經濟收益較低，投資者不可能投入大量資金。因此，它們依靠外來資金發展自由經濟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無論從這些國家的內部情況和國際社會環境看，能夠向自由經濟直接轉化的條件均十分缺乏。如果強行過度，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甚至使經濟發生大幅度倒退。因此，低度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解體後，可能的直接轉化模式是向民主政治——集權經濟模式轉化。如果這種模式真的出現，人類歷史便出現了一種完全新型的社會制度模式。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後，人們表現出的——個明顯傾向是對變革獨裁政治的期望比變革集權經濟要高。這是因為，自由同資產佔有相

比，自由更重要；民主制度與私有制度相比，民主制度更重要。同時，變革一種政治制度可以在一天內完成，而變革一種經濟制度則需要相當的一個時期，這些也都為集權經濟在這些國家的延續提供了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獨裁政治下的集權經濟與民主政治下的集權經濟有本質不同。第一，經濟的決策主體發生了變化，在獨裁政治下，經濟決策的主體是反映執政黨意志的政府，而在民主政治下，經濟決策的主體則是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第二，經濟決策的機制發生了變化，在獨裁政治下，經濟決策機制表現多變的經濟體制和決策，而在民主政治下，則表現為穩定的法律規則和制度。第三，政治與經濟完全分離。在獨裁政治下，政治與經濟高度融合，且政治干預經濟，而在民主政治下，經濟則充分獨立於政治之外，基本不受政治影響。這些不同，有可能使民主政治下的集權經濟優於獨裁政治下的集權經濟。

以上所討論的只是現階段或在今後一個時期內社會主義制度解體後能夠轉化為其它社會制度模式的可能性。就總趨勢而言，我認為，無論向哪種社會制度轉換，最後都必然向民主政治——自由經濟模式轉換，因為人類社會發展證明，這種模式到目前為止是最接近於人類理想的社會制度模式，也是能夠最大限度刺激經濟發展和發揮人們創造力的社會制度模式。不僅社會主義制度必然向這種模式轉化，獨裁政治——自由經濟的社會制度也在向這種模式轉化。近幾年台灣、菲律賓、南朝鮮向這種模式的轉化趨勢尤為明顯。即使在民主政治——自由經濟模式中，其低度模式也在向高度模式轉化。在八十年代，日本國營鐵路向私化轉讓、英國國家航空公司拍賣給個人及國家醫療衛生制度的改革，都明示了這種跡象。



# 說評人誰罪功秋千 天安門血案照片集

精裝燙金封面，全書200頁特級銅版紙彩色精印。

210幀權威照片，版權購自世界各大通訊社。

請珍藏歷史見證，購送客最佳禮品

唯一中英對照本，美華人人可閱讀

(美國市場零售價\$29.50，詳見「世界日報」出版廣告)

現特別優惠中外民運人士及中國留學生價\$24元，每本請加郵費：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美國\$1.60

支票請寄：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 加拿大\$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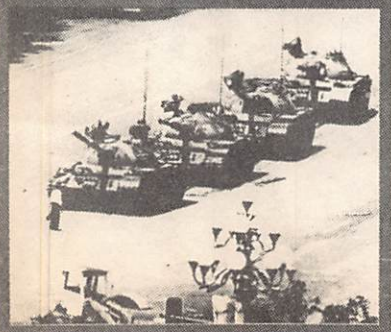
74-14 WOODSIDE AVE 歐洲\$14.00

ELMHURST, NY 11373 南美洲\$9.00

電話：(718)429-6777 亞洲\$20.00

## 獻給自由

DEDICATED TO FREED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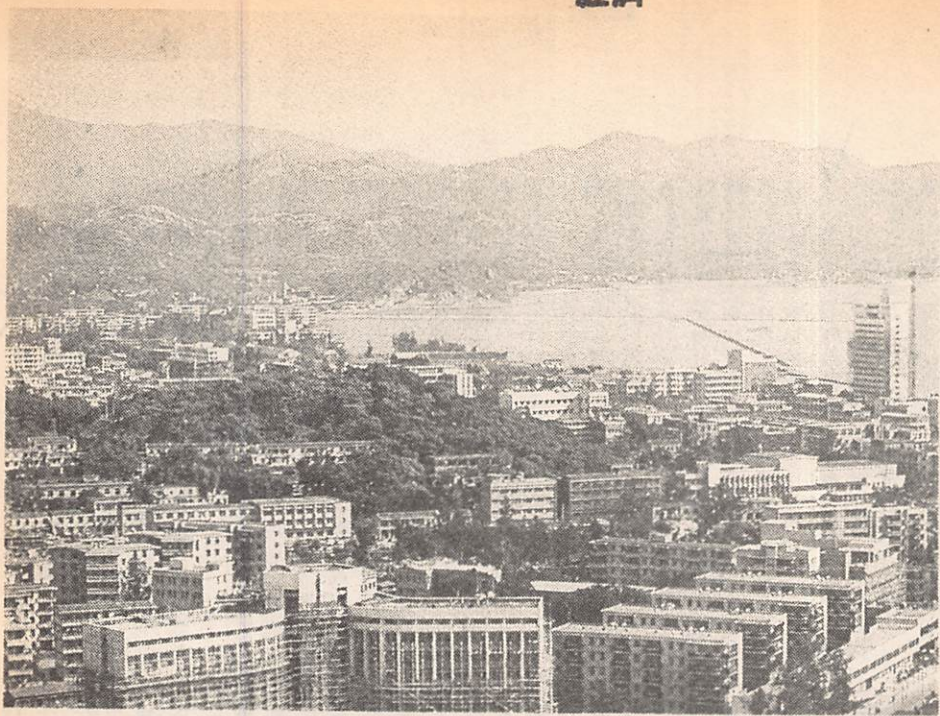
CHINA SPRING 1990.3



# 從北京的外債危機

## 看世界銀行停止貸款的必要性

肖亞群



一月十一日北京戒嚴令撤銷後，各國政府和國際有關金融組織反映不一。美國國會和美國總統發言人最近就發表了措詞不一的講話，而議論最多的是恢復給中共貸款，美國在處理不應該支持世界銀行給中共提供貸款又成了熱門，對中共使用這些優惠貸款的過程和償還能力較為明瞭，現提出供有關方面參考。

### 一、廣東省使用幾筆貸款的情況及償還分析

1、八六年世界銀行安排中共一筆五年期限用於開發沿海地區養蝦業，總額約一·五至二億美元。廣東安排使用一億美元，世界銀行的貸款官員經到實地考察以後同意這筆貸款於八六年三月交付使用。由於對蝦養殖初期開放階段，農民不需要外匯而只需要人民幣，廣東省得到這筆貸款以後，首先由省計委用這筆外匯進口了小汽車、電視機、冰箱等緊俏消費品，在市場上銷售以後再按一美元付給農民四·七元人民幣，而按當時外匯市場兌換是一美元兌五·七元人民幣。

其次，貸款由省撥地市縣一級又被層層盤剝，如電白縣就挪用這筆錢蓋辦公樓和幹部宿舍。經過以上幾道環節真正落到農民手中用於養蝦的資金只為應得的四分之一。

其三，農民養蝦收穫時，各級規定了一個最高收購限價強行收購，嚴重錯傷了農民的積極性，使一個很有發展前途的項目夭折了。

這筆世界銀行貸款目前償還情況如何呢？廣東八六年沒還錢，八七年只償還了當年應償還的百分之五，八八年還了當年應償還的百分之十二，八九年約償還了當年應償還的百分之十五。即這筆世界銀行貸款目前償還利息都有困難。為了保持償還信譽，中共於八九年在日本給予的中期貸款中先墊還了一部份。

2、八八、八九年中共得到了日本、比利時、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政府貸款幾千萬美元，廣東是使用這種政府貸款較多的省份。當然，這種貸款的償還期限達十五年之久，以後償還如何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但使用情況無不使人憂忡。如一個項目使用政府貸款二百五十萬美元與辦包裝廠，實際進口設備僅九十美元，其餘的資金用於蓋房子和進口國內緊俏物品。

3、八八年中共廣東省得到了美國的一筆貸款約一億美元，還款期限為五年。目前被安排使用這筆貸款的項目全部夭折。原因有三：一是中共經濟形勢所逼，壓縮了所有的項目人民幣配套資金；二是項目使用單位要通過幾道關卡才能得到貸款，而每一道關卡都要扣下管理費百分之二，項目使用單位實得資金為百分之九十；三是各級官員的貪污腐化又使項目資金大打折扣。可以肯定，美國這筆貸款單靠這些項目本身償還已不可能了。

### 二、中共的債務危機已到了

舉足維艱的地步

87 5  
88 12  
89 15  
1329

毫無疑問，發達國家給予第三世界國家例如像中國這樣的經濟落後國家優惠利率的貸款，是為了支援該國的經濟建設，促進落後的生產力向高科技發展。世界銀行的貸款無疑也包括了這些內容。適得其反，這些優惠貸款不但不能使中國的經濟復甦落後的生產力走出低谷，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負擔。

中共實行的一黨專制，是各級政府腐敗的溫床。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中共現行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不可能促使經濟高速發展，雖然，十年開放改革的成果給人民與文革過後的滿目疤痕相比較，確實進了一步。但目前對世界的進步潮流、科學、民主、自由的衝擊，國內人民自身要求解禁束縛於身上幾十年的枷鎖，又反過來是對中共現行體制的一個挑戰。換言之，中共目前的經濟管理手段，是不足於管理好、使用好這些優惠貸款的。

中共的債務危機，已是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目前，中共官方公佈的債務總額是四百五十億美元，這只包括中國銀行、國務院下屬對外公佈可以向外舉借外債的十大機構（如信託投資公司）等的外債借款統計，而沒有包括國務院各部、各省、地方市的對外借款。官方公佈的債額四百五十億美元的選款高峰期是從九二年起至九六年之間。

而地方的外借債務總額應為多少呢？中共歷來沒有對外公佈過這一數字。廣東省的外債總額約有四十億至七十億美元之間，上海、遼寧約與廣東持平。北京、天津、福建、浙江、江蘇、山東、黑龍江等省，約佔上三省市的一半左右。按此推算，全國各省市的地方外債總額約為二百五十億至三百億美元之間。即全國外債總額應為七百億美元。地方的外債償還期限較短，一般為三年至七年之間，也就是各省市的外債償還高峰期在九〇年至九三年之間。因此，中共的償還高峰期應於九〇年開始。目前，外債償還已使中共經濟面臨着極大的困難。

為了度過政治民主和經濟危機兩度難關，最好的出路不外乎兩條，第一是壓榨國內人民，把外債危機轉移到國內人民頭上；第二是再舉借外債，拆東補西。這也是目前中共急於想得到世銀、日本、英、美等國貸款的主要原因。

第一條出路是中共認為歷史上最行之有效的手段。目前的措施有二，一是強行購買公債即國庫券，從八二年開始每個國家職工十元上至八九年的六十元，強令購買的範圍從幹部擴大到農民以至大專學生。除了國庫券外還有地方債券，大約每個幹部一年被強行購買的公債為一個月的工資；二是增加出口量，而增加出口量需要人民幣與美元的比率上調。中共目前仍不敢使人民幣與美元的比值上升至公認的比值。但仍作有限度的放鬆，如前一段公佈的外匯與人民幣換率上升百分之廿一，對擴大出口當然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中共最近又準備再上調百分之十，一年內上調幅度達百分之卅一。二，在中共歷史上實屬罕見。外貿出口的歷史證明，人民幣與外匯比率上調一次，則通貨膨脹率也上升至這一水平。由於外貿出口實行中央補貼虧損，地方外貿出口與中央急於要外匯還債這雙重矛盾，必然是促使外貿收購價格大幅度上漲，造成整個社會的物價膨脹。

可以肯定，中國九〇年的物價指數將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之間。

第二條出路也是中央、地方共用的途徑。地方的外債擔保人也是中國銀行，或由中央認可的。因此，地方的外債實際上也是中央的外債。中央的外匯來源於地方外貿出口，而地方又千方百計挖中央的牆角。這又是雙重矛盾促使中央和地方去採一個共同點，挖西牆補東牆，例如上舉的對蝦養殖世銀貸款，八九年的償還期就是從日本得的貸款填補了這一缺口。

三、各國政府和世界各金融組織暫停給中共貸款的必要性

①、暫停給中共優惠貸款是促使中國快速走向民主化、結束一黨專制的推動器。以上所述，債務危機將使中共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暫停貸款就堵死了中共尋求出路的第二條即拆東補西的手段。當然，還要暫停給中共地方的貸款。這樣，中共必然只能走第一條出路，即回到六十年代初還債蘇聯的景象，將債務危機轉移到國內人民頭上。目前國內一些大中型企業已發不出工資和獎金，有的企業沒有流動資金，生產停滯。廣州鋼鐵廠



停止貸款對這樣富裕的農民會有什麼影響？

廣州造紙廠這些全國有名的大企業都產品質壓人與廠領導與政府共度難關。加上九〇年的物價膨脹，必然使工人積怨多年爆發出來，而羅馬尼亞爭民主的勝利又進一步促使工運、學運進一步合作，使中國民主曙光早日到來。

2. 暫停給中共貸款也可使各國和世銀免受經濟損失。

中共每年出口總額約為三百五十至四百億美元之間，正常年景的結匯率為百分之七十即二百六十億美元左右。百分之三十的外匯用於進料加工變出口，用於更新設備進口的外匯約佔百分之二十，還有進口糧食、家用電器、香煙、酒類、小汽車等國內緊俏商品以回籠人民幣資金，據幾年統計以上每一個產品每年都需要一億美元以上即進口這些消費品每年約在六十億美元之間，這樣中央和地方應餘額外匯為一百億至一百一十億美元之間，中央佔百分之六十，地方佔百分之四十。即中央所得六十億美元之間，還沒有扣除外事活動，出國考察、學者外派的外匯支出，實際能拿出償還外債的不會超過五十億美元，僅夠償還四百五十億美元外債的利息。八九年貿易逆差更達六十七億美元，根本拿不出外匯償還外債。八八、八九年兩年中共都是靠動用黃金儲備償還外債的。

中國固然是一個廣闊的誘人的市場，近年來包括美、日的西方大國在中國的市場上得到了好處，但請西方首腦緊記，那是胡、趙兩人掌管經濟大權，政治比較寬鬆，外匯管理不嚴，沒有債務，有多少外匯中央、地方都可以進口設備和消費品的特殊環境下出現了。而目前中國政治上處於一片白色恐怖中，經濟一蹶不振，中國領導人的開放形象也變了，加上外債、內債的纏繞，必然帶來外匯管理趨緊，限制進口設備和消費品，而國內出口貨物短期內又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外匯來源又何來呢？舊債未償，又怎能償還新債呢？

天安門廣場上血跡未乾，中國政府便緊鑼密鼓地作出姿態，聲稱改革開放的國策將一如既往，中國國門仍然向外國投資者敞開。然而半年多的事態發展證明，動蕩不安的政局與倒行逆施的政治、經濟政策，不僅使中國的開放政策出現了空前的倒退，同時也使外國投資者的信心降到了歷史最低點。特別是由於「六四」以後，各國銀行對華貸款的凍結、中國旅遊業與出口業的蕭條，獨、合資企業在華投資的

對中國當前購買力的失望，使當天芝加哥期貨市場上小麥合同每蒲式耳跌了六點五美分，紐約期貨市場上生糖與棉花合同也大幅下降。然而受衝擊最大的，還是在中國投資額達一百一十五億美元之巨的外資企業。「六四」後的幾天內，絕大多數在北京的獨、合資企業迅速撤出了外方人員，許多在外地的外資企業也跟着停業、撤員。美國麥道公司宣佈停止在上海生產B71八二型飛機；並撤出全部美方人

# 「六四」之後的中共對外經濟

呂明

壓縮等原因，中國的外匯收入正急劇下降，一九八九年外匯儲存跌至一百四十億美元。加上近年來政府及民間企業高築債台達四百五十多億美元之巨，使中國政府有可能面臨它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外債支付危機。

外匯的收支平衡與儲備，是中國政府實行開放政策後一直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然而外債支付發生困難，却是「六四」的直接後果。天安門廣場事件對中國對外經濟有着深遠的影響，其衝擊波遍及了世界各地。「六四」消息傳出，香港股市恒生指數暴跌百分之二十二。

員。許多外國企業，包括一些正承包重大工程項目的公司，紛紛援用有關「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的法律條文中止履行契約，並撤出人員、器材。南朝鮮、泰國、新加坡等國家則漁翁得利，眾起而爭奪從大陸轉移的投資與貿易。泰國總理迅速調令各級政府機構作好吸引撤離中國及香港外國投資的準備，而非律賓貿易與工業部長則宣稱，「外國公司即使不停止在華作業，也將在第三國尋找發展機會」，並「歡迎」投資者前往菲律賓。對和平示威者的鎮壓，也導致了各國政府

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如中止對中國的出口保險、暫停中國政府在西方各國的債券發行、凍結各大銀行的對華貸款等。緊接着世界銀行在各國政府壓力下宣佈凍結正在談判中的全部七項對華貸款後，西德政府凍結了一項高達十二億西德馬克，用來幫助建造上海地鐵的貸款。美國政府宣佈凍結一筆以中國政府為對象的十四億美元的長期低息貸款後，日本政府也中止了旨在幫助中國建造鐵路、公路與電站的所有貸款計劃。

中國政府的另一台傳統創匯機器——旅遊業，也在「六四」後遭到了空前的破壞。據中國旅遊局官員透露，去年六月訪華的外國旅客僅有二萬二千人（其中還包括一大批記者），比八八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一。該月百分之九十的旅遊團被取消。去年夏天應是旅遊旺季，但大多數賓館只租出了百分之十的床位。北京、杭州等地的香格里拉和假日別墅等豪華旅館紛紛裁員，麗都飯店與香格里拉甚至將房租減半後仍無濟於事。雖然近幾個月來旅客人數略有回升，但估計在今後二、三年內中國旅遊業不可能回到「六四」以前的水平。

所有這些，都給中國政府十分有限的外匯儲備帶來了嚴重的威脅，並直接影響到該政府今後幾年內的外債償還能力。

七十年代的中國，與獨夫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羅馬尼亞一樣，曾是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為了這項「殊榮」，兩個國家都在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上下出了巨大的代價，因為在當今世界上大至國家，小至企業，自身內部的資金是遠遠不夠其發展所需的。一九八二年中國國際信託公司（CITIC）首次向國外發放一百五十億人民幣的債券，獲得相當成功。當時各國銀行之所以願以低息向中國貸款，一來由於中國外債少，信譽較高；二來也由於各國銀行都想捷足先登，打開中國市場。不到十年時間，中國政府與企業向國外借款四百五十多億美元。據美國「銀行家」雜誌統



廣交會外匯收入怎夠還外債

計，八九年的外債高達中國政府預算的百分之五點六，而五年前這個數字只有百分之一點六。然而近兩年來中國政府的外債支付能力開始受到懷疑。首先是由於中國債券發行開始出現失控現象，地方政府與企業紛紛向國外借債，這些債務很可能最後要讓中央政府擔保。其次，一九九〇年以後的幾年內，將有大批短期外債到期，而「六四」後對外經濟的種種發展以及八八、八九年度的貿易赤字，使這幾年的外匯儲備告急，大大削弱了償還能力。

雖然去年底世界銀行宣佈了恢復對中國貸款，而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也宣佈允許日本銀行重開對華業務，然而對中國政府償還外債的能力的懷疑，將使今後幾年內外國銀行的對華貸款以短期、高息為特徵，屆時各銀行還會要求以越來越多的不動產與現金作抵押。美國兩家最大的貸款分析機構 MOODY'S INVESTORS 和 S & P 銀行也已經將中國在國外的債券從 A++ 級降到 A+ 級。

為代應付短期外債支付的困難，中國政府採取了種種措施，如實行李鵬、姚依林等長期鼓吹的緊縮政策外，嚴格控制進口，直至於去年十二月宣佈將人民幣貶值百分之二十一。然而專家們估計僅僅靠人民幣貶值與控制進口等措施很難達到增加外匯收入，逆轉外貿赤字的目的。首先中國的進口在緊縮政策下已經大幅度緊縮，人民幣的貶值能壓縮的餘地十分有限。其次，中國的出口商品之所以競爭力不强，主要還不是由於價格過高，而是質量太差，一味壓低人民幣價格不能達到增加出口的目的，盲目控制進口對中國經濟也將有不良影響。到去年底，百分之八十的進口產品都進入了中國的製造業，其中百分之五十五是化工、交通與機械產品。大幅度壓縮這類進口，不僅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也將直接打擊中國企業的創匯能力。

※

## 替解放軍訴苦

吳甦

解放軍說：不准打電話



「六四」之後，解放軍聲聲掃地，民心盡失。筆者因出國前吃過幾年「軍糧」，不免物傷其類，但又頗感不公。誠然，沒有解放軍就不會有「六四」大屠殺，「八九」民運也可重寫，但軍人並非冤頭債主。這裡，筆者想用更為同情的筆調敘述解放軍那些鮮為外人所知的各種苦惱，或許能為各位了解和評價解放軍提供另一個角度。

## 魚水之情變成魚肉之慾

在大陸，幼稚園娃娃也會唱「軍愛民」、「民擁軍」、「軍民魚水情」之類的東西。不能否認，解放軍和中國老百姓的親密無間，確曾是事實，但是那已經是歷史。如今，魚水之情早已被魚肉之慾所取代。不過，令人覺得滑稽的是，在今天的大陸中國，被魚肉的對象是軍隊。

長期以來，部隊在物質供應方面所具有的優越性，使它在同地方打交道時往往被視為「大戶」、「財神」，一有機會就被人「敲」上一杠子。這些年隨着地方政府權力的加強，部隊被敲得就更苦了。

筆者曾經在中原某部一空降師呆過。每次訓練任務下來，特別是到了實跳訓練期，部隊首長最撓頭的，並不是怕伙食不好調動不起積極性，也不是怕訓練計劃不周密影響跳傘成績，甚至也不擔心飛機出事故障下來。說起來會讓人莫名其妙，他們最擔心的竟是傘兵們從

藍天投向祖國母親的懷抱時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立足之地，也就是傘兵和武器的落點。這裡有作物，那裡有莊稼，到處生機勃勃，往哪裡跳？往山裡跳，要損壞林木。我們部隊會為每根小樹付出過比木材還昂貴的賠償。因為小樹會長大成材，而木材價格只看漲。往地裡跳樹會長大成材，而木材價格只看漲。往地裡跳？那得損壞莊稼，損壞莊稼自然也要賠。價錢面議，往往很實在，數目也很驚人。有一次，部隊看中了黃河邊上的一片荒灘，這裡看不見莊稼。如果選在旱季，荒灘更寬，水也淺，很理想。

傘兵一個接一個跳下去了，順風而下，好不威風。可還沒等收拾好傘具，展開戰術動作，群眾就來了。他們說這裡有莊稼。指戰員們仔細一看，稀稀落落的真有幾棵。於是，賠！丈量面積，大得很。按畝產不高不低的中等水平算，每畝三百元，還沒有考慮糧食漲價的因素，總共是若干萬元。部隊方面認為，這不合理，面積太大，莊稼又稀，有的根本沒碰着。再經過艱苦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的協議是：按屁股印算。以屁股印或腳印為中心，再算上降落傘面積。天之驕子們，不敢再飄飄然

我的一位同學在坦克部隊。有一次他們去接新裝備的坦克。歸途中被群眾笑臉相迎截了下來。接着，人們向軍人們伸出了手。顯然，不是來犒勞。甚至也不是要烟要糖，而是要「過路費」。沒有錢，絕不放行。部隊原以為磨一磨，拖一拖就會解決的，錯了。村長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放你們走了，錢就泡湯了。」他們認準了這是個發財的機關。於是，一天兩天過去了，十天八天過去了……坦克整整在這裡晾了一個月。眼看着嶄新的砲塔被風吹、雨淋、日晒，坦克手們心疼得流淚。最後終於還是留下了「買路錢」。不要以為這是部隊偶爾「破費」。他們部隊駐地離訓練場卅六

公里，每次訓練以上路坦克計算，每輛要付二百元一趟「買路錢」。不遠處另一坦克部隊與當地議定的價目略有不同，以里程計算，精確到米，因為那段路程總共只有三公里。差路段每輛坦克通過一米收二元。按質論價，公平交易。僅為這段三公里長的路，部隊訓練一次得花一至二萬元。

如今的英雄連，人去樓空。當年的英雄走的走，升的升，找不到了。聽到的只是，幾年前連長指導員鬧矛盾，拉幫結派，一個戰士因想不通而自殺身亡。一九八四年考核，全連射擊投彈項目均不合格。於是，連長指導員被降職處理。師裡立下軍令狀：誰能一年改變面貌，馬上升職晉級。

現任連長指導員就是那時走馬上任的，他們在全師人面前揭了榜。一年後，全連射擊總評優秀，隊列七十分以上，連長指導員也立功受獎，只是當初的許諾至今尚無着落。

指導員是個直性子：不想幹了，想轉業，部隊沒什麼奔頭，錢的問題，兩地分居問題，年齡大了轉業找工作也成問題。

### 二十起事故的大勝負

解放軍在中共的宣傳中歷來被標上「鋼鐵長城」、「堅強柱石」，似乎「無往不勝」。然而，其內裡呢？

這是停泊在東海某軍港的××號驅逐艦。據稱，這艘驅逐艦的裝備在中國海軍中首屈一指。艦上人員告訴筆者，只要它能夠正常發揮其設計性能，他們就敢在現代海戰中同任何海上強國的同類艦隻較量。一九八八年的南中國海域曾發生過一場規模不小的中越海戰，結果是越方以數艦被擊沉，數百人葬身魚腹而落敗。實際交戰過程很短，雙方對峙却長達數週。越方不過一艘運兵船再加上幾艘小型護衛艦。但由於地點離中國海岸綫較遠，在中國以

大陸為基地的空軍的飛行半徑以外，因而盡管越軍猖狂，中國海軍却不敢動手。為有必勝把握，急電東海××號驅逐艦。該艦日夜兼程趕到南海。於是戰鬪打響，果然出手不凡，前後半小時不到，解決問題。然而，這實在是在不同量級之間的較量。然且，即使如此，該艦指戰員還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兒。他們的緊張是有根據的。就在這半小時之內，艦上大小事故將近二十起，包括砲彈因其直徑大於砲筒口徑而欲進不能的怪事。對手實在太弱，無還手之力。否則，每一個事故所造成的攻擊的停頓都足以讓中國官兵們長眠海底。要知道，現代海戰中僅一門大砲一秒鐘就有十幾發甚至幾十發砲彈發射出去。戰後，照例是視捷、嘉獎，熱鬧一番。豈知，就在有中央軍委派員出席頒獎的慶功大會上，艦隊長手指着在台下前排就坐的後勤部長大罵：「我操你八輩的，你拿了多少賄賂，敢拿我們指戰員的性命當兒戲！」一九七九年對越反擊戰中也曾有砲兵部隊用過臭火砲彈。據查那是「文革」時期的產品。一九八八年海戰是否還在用文革存貨，不得而知。戰事結束，鑒於越方並不死心，隨時可能再犯，總參令該艦迅速回原基地檢修，於一個月之內趕回南海。畢竟是中國海軍第一，好鋼就得用在刀刃上。但它却在上海一呆三個月不挪窩。當然不是將士們眷戀花花世界，或者居功自傲敢違軍令，而是因為不知有哪一處關節沒打點到，一直沒讓進修理廠，直到筆者離開上海，該艦還在東海岸邊讓「海浪輕輕地搖」，被迫「樂不思蜀」。

這是一處港灣，裡面駐有海軍某部一勤務

船大隊，一護衛艦大隊。

一九八八年勤務船大隊五十名官兵外出執行生產經營任務。七個月回來後，軍官平均收入四千元，士兵二千元。而護衛艦大隊是個全訓單位，辛辛苦苦訓練一年，不僅沒撈到一分錢，反而貼進去二萬多元，幾年積存下的「私

房錢」全搭上。這種對比是顯明的。於是，一些部隊廣開財路，把訓練放到生產經營之後，有的選定了指標，如：某雷達連為完成全年六千元的生產指標，全連出動搞「勞務出租」，四個月沒進訓練場，某勤務連與地方一家鞋廠簽訂糊鞋盒的合同，每人每天定額二百個。於是，戰士值班，頭戴耳機，手糊鞋盒……

一九八八年初，解放軍航空兵某部作戰參謀馬振民的父親收到兒子來信，信中說，春節不能按原計劃回家探親，因而準備利用訓練之機，開着飛機在二月二十六日飛過家鄉上空，在空中探望親人……

很準時，當天上午十點，飛機出現在河南臨潁縣辛莊上空。先是超低空飛行，幾分鐘後又以橫滾、螺旋狀飛來，接近村莊時飛機左搖右晃，過去之後先側起，轉過來又仰起頭，但很快就帶着雷霆的怒吼，呼地墮下地面，一聲「轟隆」……二十六歲的馬振民犧牲了，價值七十多萬元的飛機墮毀了。

在馬振民脫離航綫，擅自下降高度的同一時刻，該團戰備訓練值班室，標圖員正伏在辦公桌上，專心致志地啃「數理化」，雷達上的目標消失了，他的目標仍很明確：七月份的全軍沈考，創一流成績，上一流軍事大學；領航參謀，正在給千里之外的未婚妻寫清書；當他的思緒還沉浸在兒女情長中時，飛機已經消失二十多分鐘。此時，指揮訓練的最高指揮員安排完起飛後，在指揮室裡一手夾着香煙，一手拿着報紙。

三級值班人員，三個嚴重失職者！



# 前公安部長

## 李震之死

醫 靈

### 特稿

近讀國內出版的「林立果選妃」一類的文革書籍，常見已故公安部長、中共中央委員李震的名字，不禁想起文革後期死於非命的李震事件。此事曾以不同版本流傳朝野，經好事之徒誇張、渲染後，幾乎與福爾摩斯探案相仿。由於我與李震一家關係密切，知悉若干內幕。現如實寫來，為後人編著全面、真實的中共黨內鬥爭史以及選毛澤東本來面目提供一點材料。

李震死於中共黨內鬥爭的微妙時刻。當時，林彪集團退出了中共高層（其主要代表人物甚至退出陽世）而出現了權力結構的巨大空白。以周恩來為首的溫和派與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為了填充這一空白進行了激烈的明爭暗鬥，中共十大和四屆人大是這一鬥爭的主要戰場。李震是謝富治的老部下。一九六五年謝富治出任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後，將其調至公安部。李震善於秉承上意，懷有一腔愚忠，因而於一九七二年謝富治患癌病逝世後成為公安部長。中共十大前夕，李震受命於毛澤東前往山東調查活動。有相當一段時間，頻密往返於京魯

之間，風塵僕僕。李震長期從事公安保衛工作，對調查活動守口如瓶。但其家人私下猜測這一調查活動是針對江青、康生的。

李震每次自山東返京，都要前往中南海首見毛澤東。這在當時被視為無上光榮。李震回到家，不免要與家人分享這一巨大幸福。故其家人知道李震正在辦理欽定的神聖任務。李震家住公安部大院，平時在五號樓辦公。

出事那天晚上，李震正在家中觀看彩色電視（當時尚是稀世之寶）忽得中央辦公廳電話，說是中央首長要在五號樓召見李部長，命其速去。這種電召本是平常事情，故李震及其家人都未注意。

李震出門後，遙視五號樓一片漆黑，咕了一句：「怎麼搞的……」——這是其家人聽到李震死前的最後一句話。

李震一夜未歸。翌晨，李震夫人去五號樓尋夫，李震已吊死在其辦公室的角落裡，死去多時矣！

李震夫人乃女流之輩，五內俱裂，馬上電告于桑及另一位副部長，並向中央報告。

周恩來聞訊大驚，當他得知現場已被于桑等二個老公安破壞時，更為震怒，下令將二人隔離審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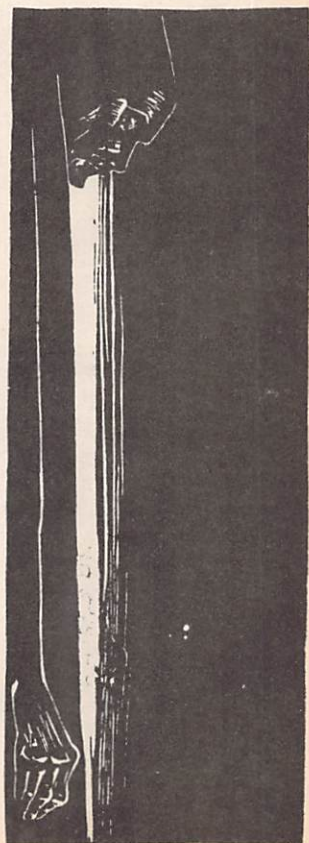
李震死時口中含有數十片未溶化的安眠藥片，衣履不整。判斷其死於他殺的原因有二：一、自溢者的勒痕呈馬蹄形（因體重下墜），而李震頸上的勒痕是正圓形，顯係被人勒斃。二、李震頸上之繩係其辦公室窗簾繩，兩端齊刷刷的被剪斷，而其辦公室內並無刀剪。

中央遂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專案調查組。該組尚未行動，毛澤東的聖旨即傳下，大意是李震平時工作不力，不能令人滿意。隋朝也曾發生過大臣離奇死亡事件，至今還是歷史之謎云云。

由於毛澤東的這一暗示，專案組雖前後更換三位組長——周恩來、王洪文、華國鋒——終不能偵破此案。

李震死後，遺屬遷往平民住宅，與謝富治遺孀飛黃騰達成雲泥之比……

在此，我謹向遠嫁英倫三島的李震之女呼籲：你已在自由之地，請拿起筆來揭露真相。畢竟，人命不是草芥！



# 中共高幹

# 神秘死亡

許亢亢

## 知多少

在一九五五年獲得將官軍銜的中共高級將領（總計一千六百多名）中，有部份人士屬非正常死亡。鑒於中共黨內鬪爭的殘酷性和神秘性，他們的死亡真相至今依然撲朔迷離。然而，人們總會尋到一些蛛絲馬跡，為這些政治壽碼的離奇消失做出合理的解釋。

李克農（一八九九至一九六二）是中共情報工作史上的一位顯赫人物。生前歷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是中共軍隊五十七員上將之一。李克農早在延安時代便被譽為「中國的捷爾任斯基」（捷爾任斯基為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第一任KGB首腦）。

李克農自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後即從事黨的秘密恐怖工作，其頂頭上司是周恩來。兩人關係非比尋常。

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宣佈李克農因病逝世。喪事隆重熱鬧，與李克農的官場地位完全相符。然據有關人士透露，李克農係因長期以來在辦公室內被人置放了放射性物質而致死。李克農家屬原擬查究，却因上峰吹來的強風而作罷。此後，李克農家屬得到中共中央的妥善照顧，其女兒、女婿皆是高幹，女婿曾任國務院郵電部副部長多年。



李克農(中共著名的地下工作者)

謝富治（一九〇七至一九七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軍委辦事組成員。佩上將軍銜。一九七二年謝富治逝世時對外宣佈的理由是癌症，而真正原因却是槍傷不治而亡。

謝富治死前數月，曾由其妻撫扶出來與訪華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壽西斯古會面。發表於「人民日報」的傳真照片上，謝富治頭部、臂部纏着綁帶的狼狽相清晰可見。幾個月後

，中共中央公佈了謝氏謝世的訃告。謝富治是文革派的核心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多行不義。身為林彪、江青的紅人，他參加了一系列倒周活動。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澤東、林彪及中央文革為了落實軍隊「支左」，特派中央文革大員分赴各地遊說實力派軍人。謝富治、王力、余立金赴西南華中地區，關鋒去東北；迫使地方軍頭支左。謝、王、余到了武漢以後，與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上將發生正面衝突。武夫陳再道命手下人綁架了謝富治，毆打了王力。這就是文革中舉國震驚的「七二〇武漢事件」。

關於武漢事件解決的具體內幕，至今仍未和盤托出。但是周恩來曾先後四次飛赴武漢進行調停（七月十日、十四日、十八日和二十一日），說明武漢事件的戲劇化結束是與周恩來奔走調停分不開的。武漢事件是整個文革運動的轉折點，對後來中國的政局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武漢事件解決之後，毛澤東為安撫地方軍頭，携張春橋、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等人巡視大江南北。在毛澤東出巡期間，數十萬紅衛兵將周恩來包圍在人民大會堂達兩天兩夜之久。而周恩來通過老練、圓滑的談判技巧擺脫困境（這是周恩來在文革熱潮中最危急的時刻）。當時文革派的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均在北京，制止此事易如反掌，尤其是身為公安部長的謝富治難咎其責。

原中共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中將（一九一四至一九七六）是一員虎將。在中共軍隊內素有「能打現代化立體戰爭的指揮官」之美譽。

皮定鈞極富指揮才能。解放戰爭時期，他為中原軍區第一旅旅長，能征善戰，軍紀嚴明



# 移民局對留學生工卡申請某些限制

包路曉律師

ROBERT F. BELLUSCIO IS AN ATTORNEY PROCTICING IMMIGRATION LAW IN FLUSHING, QUEENS, NEW YORK

包路曉是位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執業的移民律師。

一九八九年六月份，在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之後，移民局在司法部長的指示下給予中國大陸人士某些在移民及工作許可方面之權益，在一九八九年的十二月份，布希總統又進一步給予某些協助，包括了撤消對那些可以改變成永久居留身份或是其他非移民身份的中國大陸人士回國服務兩年的限制，同時下令某些中國大陸人士可獲得工作許可，此令指定某些有資格的中國人將不必放棄原有的非移民身份來換取工作許可。

一九九〇年一月四日，GENE McNARY，由布希總統指定的新任移民局長，發佈了指示更進一步的解析了總統的命令。

皮氏不顧部下勸阻而登機，結果遇難。另據可靠消息說，在事後搜尋飛機飛行記錄黑盒時，檢獲皮定鈞警衛長的手槍（經檢驗槍號核實），發現子彈上了膛。按軍事常識來分析，擔負軍事首長高空軍事演習任務時，絕對禁止子彈上膛。只有一種情況例外，那就是發生了非常情況才被允許。由此可見，皮定鈞的座機發生了某種非常事件。

極富戲劇性的林彪事件以林家破人亡告終。然而，其餘波殃及他人。成立於一九七一年九月的「林彪專案組」的兩位主要負責人李震、王良恩先後遭人暗殺身亡。

另外，原中共福州軍區第二政委劉培善中將於一九六八年初被宣告自殺身亡。而據劉培善夫人左英回憶，認屍時劉培善身上有明顯傷痕，似他殺而非自殺。

上述案例代表了一個時期的命運。如果以強權、武力、槍桿子為基礎的中共政壇不進行徹底變革，這類悲劇還將不斷重演。

\*

指示澄清了移民局應遵循的程序：如持有J簽證又受必須回國服務兩年限制的中國大陸人士要在駐海外領事館提出簽證申請。

這假定只適用在那些已成為非法身份或是因非法工作而無法在美更改身份的人士才需要向美駐海外領事館提出簽證申請。指示說明，當在提出此移民簽證申請時，應通知移民局並提出撤消回國服務兩年限制的申請。雖然此程序包含了如何處理「移民簽證」之申請，但是它還是沒有提到申請「非移民簽證」而撤消回國服務兩年限制的可能性。由此看來，要獲得「非移民簽證」，申請人必須要有資格在美更改身份，並且要先將身份改變才可。

此指示同時也對給予學生工作許可有更多限制的詮釋。此指示說明F—1及M—1學生將不會獲得一張新的工作許可卡；而會在他們的I—20 I—D卡上得到工作許可之字樣。除

此之外，此指示並限制了F—1、M—1及J—1身份的人在上課期間，每個禮拜不可工作超過二十小時，在這項限制之內，唯一對這些學生有好處的是他們不必等到完成了一年的學業之後，也不必證明因經濟需要而須取得工作許可。學生們千萬要小心不要掉進這個陷阱。學生必須還要保持 FULL-TIME 學生的身份，並在學期間每星期工作不得超過二十小時。

又再，雖然中國大陸人士在獲得工作許可後不會失去他們的合法身份，但是他們還是必須遵守限制以保持他們的合法身份。其他受限制的例子是H—1、L—1及J—1的人士不能夠在他們許可工作的機關外再受雇用。

移民局所以之突然改變他們對指示的解釋，更證明了須要眾議院提案立法之理由。這也是為什麼眾議院應廢棄總統之否決。但是，很不幸的是，這些未定的法律還是未包括一些有關中國人之問題（如：其中重要的一項而被忽略的是有關以人口控制之外，以其他政治因素為理由之申請案件）。

\*

# 中共軍隊的暗幕種種

楊天樹

是軍隊還是土匪？

「六四」凌晨的槍聲是一個里程碑，從那一刻起，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舊情了結了，很多人重新認識了這支軍隊。

在很多北京人的回憶中都提到以下場面，這些鏡頭會深深地烙在他們的腦海中：

六月三日深夜，當軍隊路過木樨地時，士兵瘋狂地向兩邊的高樓和樹上掃射，像打鳥一樣把躲在樹上的市民射下來。兩邊高樓的玻璃被打得碎片亂飛。

六月四日晨，南池子的軍隊向平民開槍，士兵們一邊掃射一邊手舞足蹈，開心地狂笑，以致很多人懷疑他們是否吃了迷幻藥。

六月五日，滿載軍人的兵車從長安街上駛過，士兵們舉槍向北京飯店掃射，打得玻璃四濺，士兵們開心大笑。六月六日美國大使館門前也發生類似事件。

整個六、七月份，戒嚴部隊在街上濫捕嫌疑人員。抓到後不問青紅皂白，先打一頓，打後致殘者不勝枚舉。

見到這付場面的人，很多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在電影和小說中那支彬彬有禮，紀律森嚴的軍隊嗎？怎麼和土匪一樣？

可是，如果人們仔細讀一下「六四」之前半年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民主與法制以及很多報刊所報導的有關軍隊內部的狀況，那麼就沒有人會對士兵在「六四」慘案中的表現感到奇怪了。

這支軍隊，不但僵在頭腦上，而且爛在軀體上。中國青年報驚呼，現在軍隊兵源的素質之差，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 軍營中的罪犯

一九八四年，安徽南陵縣某鄉七名新兵胸戴大紅花在親友的擁簇下準備登車，公安人員突然出現，當場在七名新兵中逮捕四人，原因是有犯罪紀錄。

一九八六年，河南某市人民武裝部正組織新兵登車，警車忽然呼嘯而至，從新兵隊伍裡揪出一個當地的流氓盜竊集團。

一九八七年，駐河南省的一個新兵教導團剛把新兵安置好。公安局的人就來造訪了。幾天時間內，在這個團裡有一個班的人因入伍前的罪證被抓走。

解放軍報的報導更是觸目驚心：

江西橫峰縣的殺人犯劉友山在犯案後潛入安徽霍丘縣以孤兒身份定居，後來被征兵入伍。三年後，劉友山回老家被人認出，便逃到越南，供出大量軍事情報。之後被對方交換戰俘遣送回國，才就擒落網。

另一位殺人犯朱志坤流竄到河南駐馬店，通過其姑父的關係混入軍隊，並被分配到部隊保密部門服務。兩年後被公安局查出，緝捕歸案。

一九八八年三月，濟南軍區某團不得不對入伍前有「劣跡」的十六名士兵作出處理：二



軍營裡經常可見到士兵們在一起猜拳行令，消磨時光。

人開除軍籍，十四名中途退伍。他們大部份都有「進宮」的紀錄。其中三機械連的士兵史某在家就是慣偷，曾四次被公安局拘留，三次被勞改，放出來後，竟奇蹟般地混入軍營。

一九八八年八月，某軍事法庭該年先後審判了二百八十七名軍內的刑事犯，其中百分之六十八在入伍前就犯有前科或有劣跡。

## 社會的垃圾筒

林彪說：「解放軍是個大熔爐，是個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還有不少人相信這個話，希望把自己的不肖子孫送進這個大學校改造，把廢鐵送進「大熔爐」煉成鋼。

余可是個獨生子，整天在部裡打架鬧毆，常常拿着菜刀把人撞着滿街跑。幾次進了「號子」，但都因年輪小被放出來。余可的父親余會計無可奈何！只好求助於武裝部和派出所。「這孩子這樣下去就毀了，部隊是個鍛鍊人的熔爐，紀律嚴明，讓他進去鍛鍊幾年吧！」

武裝部的幹部面有難色，誰知派出去的警察也來說情：「這孩子再混下去，遲早要進監牢。把他送進部隊管教管教吧！他一走地方治安也安寧。反正誰當也是兵，看在余會計的面子上高抬貴手吧！」

就這樣，余可被塞進了軍營。可是這個「大熔爐」並未把他煉成鋼。一年以後，余可秉性難移，在一次口角中一刀捅死副班長，上了軍事法庭。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在負責招兵的武裝部門口，常常可以看到以下場面。當家長的纏着征兵幹事求情：「俺這孩子不是讀書料，整天和街上不三不四的龜孫子打得火熱，我文武招都使過了，沒用。請首長高抬貴手，讓他到部隊去管教兩年，學點技術，今後也有了飯碗。」「解放軍報」的記者在北京軍區某師進行了調查，竟發現有一半以上的人過去都有不同程度的刑事劣跡。

現在社會上對中學畢業生的出路有個順口溜：一流的大學生，二流的混個工，三流的個體戶，四流的去當兵。兵營，成了社會清除廢物的垃圾筒。

### 文明遺忘的角落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五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報導了廣州軍區某團對近百名戰士掃盲的「先進事跡」。看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海南軍區某新兵教導師黃參謀向記者訴苦說，該師每軍都有幾十名新兵因身體不合格被送回原籍。其中很多是低智能兒、羊角瘋患者和精神病人。試想，如果老百姓知道槍桿子是握在這樣一批人手裡，他們晚上怎麼能睡得着覺？

新兵的文化程度之低要遠遠低於他們的履歷上的學歷。一些士兵檔案裡填着初中高中的學歷，但連寫信都要請人代筆。某團一位代理司務長自稱高中畢業，在一次軍需部門查帳時，拉開抽屜抓出幾把黃豆數開了，弄得後勤部的糧草官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這位高中生的糧草官算，平時靠數黃豆記帳。此事傳開，在全軍成爲笑談。

然而，正是這樣的士兵，奇跡般地衝過征兵中的層層關卡，拿着合格的入伍通知書，走進軍營。

如果人們知道了這一切，就不會對北京堵軍車的鏡頭中士兵們那遲滯的目光麻木不仁的表情而感到不解了。

### 濫竽充數的征兵

當兵的素質低自有它的社會原因。七屆人大期間，遼寧省遼陽市人大代表鍾寶祺答解放軍報記者問說：農村商品經濟發展了，征兵越來越難。當兵名額多的村鎮，應征的人數不夠，只能推薦有劣跡的青年入征充數。

一位曾到廣東珠海征兵的幹部提起那裡的征兵工作就不寒而慄：那裡征兵，體檢有誤工補貼，入伍月工資定到一百到二百不等，每年還有三、四千元的優惠補貼，這樣，主動報名應征者仍然寥寥無幾。蘇南地區的征兵和抓計劃生育結紮差不多，征兵季節一到，村裡的適齡青年紛紛逃到外鄉。最後，村幹部只好靠抓鬮來決定誰去當兵。有的地方乾脆攤派，派民兵「拉壯丁」。

總之，在比較發達的地區和文化水平比較高的地區，當兵已成爲最不受歡迎的職業。一些當地有「劣跡前科」的青年因爲很難找到工

作，企業不要，單位不收，只好去當兵混糧。由於在發達地區征兵難，大多數兵源越來越依靠落後愚昧的地區充數，以致造成全軍文化水平普遍下降。

### 魚水情變水火情

自八十年代以來，軍隊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就在隨着它的素質下跌，而「六四」之後軍人的形象則降至負點。過去母親對出門的孩子說：「有困難，迷了路找解放軍叔叔幫助」。可是現在母親則嚇唬哭鬧的孩子：「再不聽話，就把你送到解放軍那裡去！」

北京市民在大屠殺後與解放軍已勢不兩立。一個兒子被殺的母親爲了復仇給戒嚴部隊送去有毒的水，士兵猶豫不決，不敢接，因爲上級傳達有放毒事件發生。老太太見此自己先飲，然後再給士兵一碗，最後兩者同歸於盡。

「六四」之後，中共強迫群眾觀看一批歌頌人民解放軍光榮歷史的電影受教育。一個電影「巍巍昆崑」有一個鏡頭是國民黨政府在南京用高壓水龍鎮壓學生「反飢餓反迫害」遊行示威。每演到這裡，下面一片噓聲，人們大聲叫道：「國民黨真笨，比共產黨差遠了」，「傻瓜，上坦克嘛！」然後，影場一片會心地大笑。還有一個電影講解放軍和反革命份子搏鬥。一個戰士被打死，全場一片掌聲，另一個戰士又被打死，又是一片掌聲。

軍民關係正處於一個惡性循環中。人民對軍隊越憎惡，越沒人去當兵，於是當兵的人素質就越差，人民對軍隊的印象越壞……

看來要想挽回軍隊的形象，解放軍只有立新功。立什麼新功呢？看看羅馬尼亞就明白了。

## 失落的冬天

大陸報導系列之二

李遠

本來按編輯部的計劃，應該在古城西安呆一段時間，以便隱蔽一下。自從「來自大陸的報告」陸續在「中春」發表之後，中共公安部立即指令海關總署和邊防總局核查九月以來入境名單，並電告各省市公安局政治處，嚴密注視可疑份子的行踪，追查中國民聯份子，企圖找到我這個海外民主力量第一個回大陸寫報導的記者。但十二月底羅馬尼亞民運的政局變化，特別是齊奧塞斯庫之死，彷彿給中共當局頭頭一棒，差點沒打暈了。所有軍隊立即進入備戰狀態，各情治單位如公安部、公安部也進入緊張狀態，把注意力放在十億子民身上，唯恐激發民主浪潮之後，再掀起一場更大的民主運動。聽說楊尚昆在開羅訪問時，從電視上看到羅馬尼亞的示威集會，連忙要鄧辦接通老鄧，也不怕美蘇的衛星監聽，以帶哭腔的腔調對老鄧講：「你要千萬保重身體，你健康一天，我們就放心一天。東歐的今天充分證明了您英明偉大，千萬保重。」上層社會一片驚慌。一月底中央文件有關羅馬尼亞的報告下發到省軍級後，北京軍區這次參予六四大屠殺決策的幾個將軍，紛紛把子女叫到身邊，要他們想一切辦法盡快出國，不要等將來中國政局變化，像齊奧塞斯庫兒子那樣，看着老子被人打死睡罵。當官的驚慌失措，百姓暗暗高興。本來新年對於中國人並不是很講究的節日，可今年元旦

，家家舉杯痛飲，人人預祝明年能像今年東歐人一樣，過一個自由年。

中國老百姓畢竟是東方民族，他們心中想的是民主和自由，可表現出來的言行却仍然是那種消極、忍耐和失落的情感。國外很多讀者非常關心六四之後國內的普遍狀態，希望瞭解大陸真實的表面現象。為此，筆者用近二個月的時間，走訪了北京、廣州、上海、西安、南京、成都、深圳等地，就一些現象進行了認真的觀察，實錄了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的世態百像，供讀者自己去觀摩、思考……

## 一、大學生和TOEFL

自從十二月九日政法大學和人民大學七個在中央廣播電視大樓前呼喊「我們國家為什麼窮」的同學被抓後，北京各大學的學生幾乎全部沉默了。與此同時，原本生意蕭條的各種「托福」(TOEFL)輔導班、英文補習學校突然生意興隆，像滬文、京東、興華幾家比較有名氣的民辦外語學校，竟在招生時排起了長隊，使校方不得不擴大名額編新班。一位學生致力於民辦學校的老者對筆者說：「這是中國四十年來所未有的現象。」面對這給他和他們同事帶來巨大經濟收入的現象，老先生感到有些憂愁。包括大學生自己也知道這現象的背後

是什麼情感。但面對南海高高的紅牆和天安門城樓上那從沒變樣的老毛畫像，「我們也不知道出國是不是一條最好的路？雖然六四的槍聲打碎了我們的幻想，我們的前途無法預測，但畢竟這裡是生我養我的祖國。」一位戴眼鏡的女大學生說。她看到我拿起照像機在照排長隊的人群，拉了一下我胳膊說：「請你饒恕你的同類，我不希望幾十年後，有人看到你這張照片，說我們這一代是逃亡者。」她看我放下像機繼續說道：「我知道有一天，我們，包括現在在海外的五萬名留學生，一定會後悔我們今天的行為，因為中國人國粹的天性注定留洋的人不能為民衆所接受，從而也就注定要失去他們在國內所能起到的作用。但面對今天，我們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假如你不願當順民。」

走進北大、人大的校園，圖書館內滿滿的座無虛席，掃一眼桌上的書，英文書竟佔了大部份。像台灣出版的「清華托福題解」、「托福字匯的突破」、「GRE入門」幾乎人手一冊，冷落了二年的「出國人員實用英語」再度暢銷。據北大新華書店一個店員告訴我：「現在最好賣的書是「托福題解」和「論持久戰」。

幾乎所有的布告欄上都貼有托福補習班招生廣告，費用高達一百至二百五十元，仍然人滿為患。特別是聽說今年一月十三日的托福考試是最後一次，報考托福的人到了打破頭的地

步。據說到十月底為止，報考人數已遠遠超過托福測試中心預計在北京的最高人數，各報名點從去年十月二十日就不再受理報名事宜，如今在北京，誰能報上名，可謂是京城「路子最野的主兒」。

三十美元的考試費和十五塊錢的手續費，加上走後門的開支和上補習班的幾百元錢，對赤貧的中國大陸家庭來說，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但筆者所接觸過的家長無一有怨言。他們異口同聲地聲稱只要孩子逃脫虎口，自己死而無憾。中國人爲父母者實在是鞠躬盡瘁。儘管絕大多數大學生和他們的家長都在做着留洋夢，但托福之後還有很多現實問題他們都沒有認真地考慮過。幾乎每個大學生都天真地認爲美國、日本的大學會給他們獎學金。談起經濟擔保之類的實際問題，他們茫然不知所措。六四之後西方國家對民運人士並不熱情的態度，台灣當局躲躲閃閃的樣子，日本、澳大利亞正在變化的留學政策，他們一無所知。反而對美國正在進行的波洛西有關「一簽證的法案他們倒是十分關心。也許是受中共宣傳的影響，也許關係到他們切身利益，他們幾乎一致不滿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所採取的「保護自己」的行動。用北大國政系一研究生的話說：「他們到美國都學會自私了，爲了留在美國享受，把國內幾十萬大學生的出路都堵死了。」是非曲直，各有說辭。

就目前看，只要鄧小平還活着，出國留學這條路還不會斷掉。但如果美國的行為激怒中共高層，關閉出國之路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中共真的將這幾十萬大學生認爲唯一的一條生路堵死，那留在國內的那些做夢都在念托福的少男女們可真的要發瘋了。

記者有個同學在國家教委當副司長，屬於直昇飛機派。他對六四大屠殺十分不滿，但又埋怨學生太任性，導致現在的大倒退。對於出國留學政策一事，他透露國家有關方面正密切注視美國國會的反映，並調整了在美各領館教育參贊和領事，加強了留學生情報反饋，同時

### 苦讀托福，天安門廣場夜景之一



配合國家安全全部派出爲數不少的職業學生，希望扭轉前一段留學生失控的情況。關於公安局發放出境卡的問題，他嘲笑外國同學太不瞭解共產黨：「爲什麼要卡呢？沒必要。把不滿情緒的人都放走才好呢！都走了不就安靜了。」同樣的話，筆者從另外一個在高層當大秘的同學嘴裡也聽到過。他說：「國外也把共產黨看得太簡單了，特別是那些從大陸出去的留學生也幼稚得令人可笑。如果沒有內中原因，能有大批學生、作家、個體戶跑到香港、法國和台灣？中國大陸邊防歷來「鐵壁銅牆」，幾十人、幾百人成批越境，好像演電影，怎麼可能？就像方勵之，如果沒有最高層授意，從八八年就被二十四小時監控的方氏夫婦怎麼可能，在中共情治機關鼻子底下進入美國大使館？你知道美國大使館從秘書到傭人僱了一百多個中國人，而他們百分之百是國家安全部的職員，就算方勵之有神助走得進使館，又怎麼能活到今天？美國佬從四十年代就讓中共耍着玩，從馬歇爾到布什，二百年的文化怎麼能鬧得過二千年的歷史？告訴你，到八九年十二月底爲止，從閩（福建）、粵（廣東）、滇（雲南）邊境共逃出二千人，國安部上月報財政部海外開支增加三百萬美元，這就是說，這二千人中最少有百分之五是派出去的「民運人士」，讓敵人安置自己，這才是共產黨的高招兒。所以今年元旦老頭們看台灣「中央日報」社論說「八九年大陸民主大逃亡」，賈春旺笑着說：「這是民主大派遣，要抓的我們都抓了，該放的我們早放了。」老兄，在美國呆幾年別把共產黨整人的手段都忘了。」

又見了幾位在老頭身邊作秘書的朋友，大致看法和所閱到的文件都證實了上述說法。這也就是爲什麼讓方勵之進入美國領館；爲什麼抓王丹一定要抓在台記者手裡；爲什麼抓陳子明、王軍濤一定要和港支聯的人一起抓。這不就證實了八九民運是美將港反動勢力是黑後台的宣傳？在這一點，共產黨不愧是老手。

## 二、舞廳·歌手·爵士樂

十年前，中國漸進的經濟和漸開化的文化意識，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刮起了一股跳舞熱潮。覆蓋面之廣，發展之迅速，皆出人預料，故當時有人把它稱為繼文革「忠字舞」之後又一次「全民皆舞」。

還記得，那時的「舞廳」和可供跳舞的地方並不多，而且常在公園的廣場、草坪或機關的禮堂、球場、食堂裡，沒有樂隊、歌手伴奏，常常以擴音機和高音喇叭就「蹦蹦恰恰」地跳起來，想起來令人回味。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舞會進入高層次，一批專業豪華舞廳和伴舞小姐應運而生，但很快又被電視錄相和吧業擠出市場。六四之後，該種行業像托福補習班一樣異軍突起。因為錄相帶凡國外均被「掃黃」，政治又不能談，國民心態一度頹廢，而頹廢的最好表達，便是跳舞與醉酒。

成都，曾是大陸舞廳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走在人民南路、春熙路等主要大街上，幾乎給你一種感覺：家家皆舞廳。據官方統計，從八九年六月至今，成都的音樂茶座和舞廳，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恢復營業，每晚顧客幾萬人，使成都市公安局不得不每天專派幾百名警察到各舞廳「督察」。記者找到原有國際經濟諮詢公司的一位朋友，他現在辭職下海成為成都民間舞會協會的理事長，專門負責協調各舞廳的樂隊和歌手，同時兼管保安，好似香港黑社會的老大。據這位朋友介紹，從六月四日到六日成都人民南路警民衝突之後，大學生和知識份子開始尋找發洩憂鬱的方式。於是早已蕭條的舞場，成了他們最好的去處，八十多家樂隊和三萬多名歌手幾乎全是由大學生和曾經參予學潮的機關知識份子組成。凡是來舞廳唱歌的歌手，大都能歌善舞，特別是跳起踢踏或霹靂舞

時，往往能激起觀眾的情緒，使人暫時忘記了六月的流血和外面的沉悶。

郭君，二十五歲，是近來活躍在成都舞廳、茶座的知名歌手。他早在四川音樂學院讀書時，就認識了「幫社會哥們」，課餘時經常參加舞廳、茶座的演唱。今年五月學運期間，他成為「成都地區高自聯」的重要成員，六四北京大屠殺的消息傳到成都，他和同學組織了聲勢浩大的聲援北京高自聯的遊行，並在人民南路廣場靜坐示威，直到六日大批軍警鎮壓時負傷才離開成都。避了一個多月，傷也養好了，他重新回到成都，經過長時間痛苦的思索，毅然向學校提出退學，他謝絕了國外朋友幫助他出逃海外的好意，留在了成都，並加入了個體歌唱戶的行列。幾個月來，他從月季皇后大酒家到金座咖啡廳，用他那粗獷、雄渾的歌聲，渲洩着他那壓抑在心頭的悲憤和惆悵。一曲「信天游」、「一無所有」把聽眾帶到了激烈的五月和慘烈的六月。他深沉地對筆者說：「中國人的生命應該在中國燃燒。我曾發過誓，決不離開祖國，我要歌唱那永遠難忘的過去，為死者和生者的忠魂歌頌。雖然我曾三次被公安局傳訊，並列為學自聯頭號人物之一，但我還是不離開成都，不離開我的觀眾和我曾為之流血的土地，反正，我別無選擇。」

王某，郭君的同學，六六成都大遊行的組織者之一，他從四川音樂學院畢業後，被分到郊區一中學，並明確告知是由於參加學運的原因，要求他繼續接受審查。於是他決定下海，不再享受國家幹部的「優待」，成了成都舞場中的歌星。當我在新月舞廳搖曳的燈光中傾聽他那如泣的「悲歌」、「再度孤獨」時，深感我們這一代人的不幸和上帝的不公。

當然，歌手和舞廳的再度熱門不單是靠這些政治失意的大學生造成的，大批文藝界人士由於不滿目前的工資待遇和嚮往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環境，紛紛棄公從私，進入了一撈錢

「的世界。

R先生，三十歲，原是成都軍區軍樂團的長號手，愛人也是部隊醫院的大夫。上班無聊、生活單調，小兩口又拖着一個孩子經濟狀況較為緊張。他的長號技巧嫻熟，曲調悠揚，在蓉城遠近聞名。終於，他經不住有人三番五次上門造訪，於去年底開始瞞着部隊，走上了舞廳樂手之路。從「國歌」到「軍歌」，從「愛的羅曼史」到「等你回航」，他感到人生的另一價值。同時，這個「第二職業」使他日子越過越紅火，每月五六百元的「地下」收入，使他那兩間原本沒什麼東西的房間裡鳥槍換砲，從先鋒四千元音響到地毯組合家具應有盡有。R講：「我是軍人，但我以我沒有拿着衝鋒槍殺我們的同胞而自豪。但我又無法脫掉我身上的軍裝走入社會，夜晚的號聲也許就是我內心的獨白吧。」

德西美朵，四川戲影樂團的著名歌唱家，她的歌聲清甜、圓潤、悠揚、婉轉，被稱為國內民族唱法的「一枝花」。然而她也下海下。在金夢歌舞廳，她一曲「故鄉的小巷」把筆者引向了童年那美好的回憶。當她站在記者疑惑的眼光下訴苦時，那神情是那麼憂鬱：「你說我們這些「藝術家」該怎麼活？一個月百把兩百元養一大家子，物價和解放前夕一樣飛漲，拍一部電影才給二百塊，一年又能拍幾部？我喜愛自己的民族唱法，又不願意去「走穴」，所以只好走進這裡，起碼我不接受什麼人的檢查、審關、評定。在這裡，我唱得輕鬆、自由，也不用去集中學習什麼文件，我想怎麼唱就怎麼唱，我就喜歡這種自由的空間。」

筆者幾乎天天到舞廳聽歌，發現除了流行歌曲和迪斯科之外，在一些高檔舞廳你還可以欣賞到典雅的室內音樂，從巴哈到亨德爾，從貝多芬到柴可夫斯基。他們希望在醉人的樂曲中忘記現實，在搖曳的燈光中懷念美好的東西。從廣州到上海，從深圳到重慶，夜生活的興

## 涉外婚姻中的老少配



盛，無不浸淫一種憤怒和失望。  
 意想不到的，我在成都飯店蜀樂宮聽歌時，中間竟有幾個相聲演員出場，表演電影「平原游擊隊」中的「松井的部隊進村了……」，「地道戰」中的「鬼子來了，快跑……」和老鍾叔壯烈犧牲的場面，維妙維肖，寓意深遠，令人浮想聯翩……

## 三、公關小姐及涉外婚姻

公共關係一詞在西方是「PUBLIC RELATIONS」。基本定義是接待客人，結識朋友，聯絡感情，獲得信息等等。美國從十九世紀就把公共關係做為一個特定業務與經營管理，生產技術管理列為企業中三大內容，並產生了

公關理論和公關人員。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公共關係隨着大陸的改革開放，開始進入古老的東方世界。然而歷來夜郎自大的中國人，則把公共關係的鼻祖之冠戴在了自己頭上，凡翻閱大陸出版的有關公關書籍，居然無一例外地把春秋戰國遊說列國的蘇秦、張儀，甚至連王昭君也算在內，恭稱為世界公共關係之始，令人哭笑不得。

不管歷史是什麼樣的，反正中國大地自從公司潮湧起之後，公關小姐燕語鶯聲，伴隨着經濟交往無處不有。由於這種特殊職業的產生，在中國大地又形成一股強烈衝擊傳統理論觀念的疾風，衝垮了二千年的封建堤壩，衝破了女人不經商的固有觀念，也衝散了無數個家庭。

九〇年元旦，我應邀出席北京某公司與美國洛杉磯一台商關於合資創辦中美商務大廈的簽字儀式。雙方簽字是在北京第一流的王府飯店進行的，豪飲豪吹之後，包括一名副部長在內的京城衆官，在幾位苗條小姐連拉帶拖加撒嬌下，來到長城飯店迪斯科舞廳，開始了所謂聯歡活動。

筆者在一旁觀察，幾乎每一位重要官員懷裡都有一位妙齡女郎，四目相視，意在其中，大概是舞廳全讓這個 PARTY 包了，居然放起悠揚婉轉的華爾滋，大大方便了兩性的交流。

朋友將投資商王先生介紹給我，並告訴對方我個人軍方背景。對方立刻堆下一臉笑顏，擺手把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召過來，連聲說「久仰大名，讓我的公關主任南希陪陪你，明晚我另請老哥一桌，幫幫忙。」說完又去應酬東主去了。我從遞過的名片知道對方在洛杉磯只不過是個三流公司，料想無此巨款（二千萬美金）在大蕭條的北京投資旅遊業，內中必有其他原因。公關小姐嗲聲嗲氣地坐下來，二十多歲，一米七左右，腦子滿靈活，一見面就知道我不屬舞池裡那幫共產黨幹部。幾口拿破侖下肚，她開始給我講故事。關於她本人的這裡免談，一不知是真是假，二保護別人隱私。我最感興趣的是關於北京的公關小姐。她告訴我目前在北京有二個公共關係組織，公共關係小姐有一萬人左右，還有兩個民辦公關學校，近千學員。由於外商駐京機構老板均為外籍人士，大部份家眷留在本國，北京又無男性消遣的地方，於是從八七年開始大肆招募公關經理，一大批原在機關、學校、報社、文藝單位工作的女青年，由於姿色和語言的優越而成爲那些性飢餓的外商們的秘書兼公關小姐，以至於北京市政府不得不通告外商不能再聘中國公民，必須通過外國事務局派遣。通告歸通告，外商絕不會喜歡外事局調派的那些難看的老處女，依然暗地僱用滿意的小姐。不可否認，前兩年對外經濟的發展，這些公關小姐起了巨大的

作用，與大陸做過生意的人都知道，大陸各機關廠礦，人浮於事，官僚主義嚴重，經常發生品質不合格，交貨期延誤，拒理投訴等情況，外商由於語言、國情不通，常常碰釘子，而這些公關小姐土生土長，又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社會關係網，現在與金錢合在一起，幾乎無處不通，特別是對付那些財色雙收的實權人物，令外商大賺其錢。於是便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故事。在北京人望而生畏的大賓館飯店中，經常有一批足登意大利女皮鞋，身穿香港名牌衣裙，擦口紅化淡粧的摩登小姐出現，走路叫「的士」，吃飯到「東方」(東方明珠海鮮高級餐廳)的小姐們儼然成了一群新興貴族，白天週旋在各機關公司的辦公桌飯桌上，晚上流連在舞場酒吧，深夜則回到老板的懷抱中。甚至選出現一些高級公關小姐，由於她們姿色出眾，社交手腕高超和辦事效率高，常常身兼數家公司，做多家生意，拉八方客戶，並備有私人秘書、司機，成爲一種公關個體戶，月收入均在萬元以上。

鄭小姐，二十八歲，原中央電視台新聞記者，皮膚細嫩白晳，瓜子臉，大眼睛，新潮服裝，面帶微笑，一口純正而甜潤的普通話，曾迷倒千百萬螢幕前的觀眾。二年前忽然一日不見，在西苑飯店視了一間辦公室，從首汽公司包了一輛豐田臥車，聘了一位英俊小生做司機、秘書兼保鏢。掛牌「中港合資公關公司」正式營業。一時間生意興隆，財源茂盛，一月收入等於她在電視台三十年的工資獎金。某酒家明天開業，但衛生防疫站的公章却遲遲未蓋成。別看這公章，少了它開業就是非法，誰都可以封你。於是港方老板求到鄭小姐，小姐櫻口輕開：二萬塊現金。老板無奈，明知對方獅子開口，却恨自己公關不靈。定金付過之後十五小時，鄭小姐拿出當年採訪精神，直奔當事人家中，軟磨硬磨，內中技巧不便書出，反正使那個酒家如期開業。類似事件在鄭氏公關公司

檔案中紀錄極多，各有千秋。

公關行業的興起使一些官方機構也開始眼紅，新華社首先創辦環球公關關係公司，把原來的廣告業務換成公關關係的牌子，使新聞買賣成爲合法。另一些人也不甘示弱。以「經濟日報」原總編安崗爲首的一批老幹部於拿薄一波上方指令，成立了「中國公關關係協會」和「中國公關關係總公司」，駐軍民族飯店，擴招人馬，鬧出了不少真真假假的故事，成爲北京上層社會的趣談。當然，這個協會和公司最大的公關任務是挑選麗質小姐給中顧委們到外地「考察」時用。使用內容屬國家「機密」級。

公共關係小姐目前在全國大概有十五萬人之衆，大多數分佈在外資企業、外商駐京辦事處、合資飯店和高級酒吧。六四之後，外商紛紛逃離大陸，從而產生了一系列令他們頭疼的事情，這是當初他們所沒有想到的。原因是，中國鎮壓學運之後，開初了大規模清查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繼而又「掃黃」。搞得這些本來就不清楚的公關小姐如臥針毡，紛紛向在臥室裡指天許願的老板提出移民國外的要求，使那些原有家室或無家室而不願結婚的男人大傷腦筋。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出的出國潮席捲大陸，民運人士有地下通道可循，大學生可考托福留學，海外有親友者可借探親之由離去，而靠姿色和嘴皮的公關小姐只有靠每天晚上摟她睡覺的男人了。於是涉外婚姻又成了出國潮中的一大浪潮。在廣州、北京、上海只要你手中有外國護照、美國綠卡，親朋好友會紛紛上門將自己的妙齡千金推銷給你，熱情之至，除出國之外絕無其他條件。有人甚至聲稱，如果你站在北海公園、外灘或中山五路大喊你有美國護照，保證有一個排以上的娘子軍跟你回賓館。當然目前還沒有誰神經兮兮地去試試，但國內小姐與外國人結婚成爲一種時髦。當年電影明星沈丹萍外嫁五十多歲的德國人曾讓國人

向背很久，而今天的大陸，二十歲的女孩子找一個六十歲的外國老頭都會讓同伴羨慕半死。據公安部戶籍管理司統計，八九年涉外婚姻二萬一千件，其中年齡差距十二歲以上者佔百分之六十以上。上面所提的公關小姐和雇主關係更爲複雜。由於老板大多已婚，又抵不住小姐的要求和媚力，只好在國外開具假未婚證書到大陸註冊結婚，並與小姐談妥到國外的條件，或給一筆錢一刀兩段，或在外購屋甘做旁室，或爲其申請外國護照仍居留北京爲自己工作。從而一大批會活躍於北京、上海、廣州的公關小姐突然間出現在美國西海岸、紐約的華人圈子中，與法國巴黎難民營中的民運人士形成兩股出國潮。

隨着紐約、巴黎、香港華文報紙大陸妹徵婚廣告的日益增多，大陸涉外婚姻已成爲中共最頭痛的一件棘手問題。

#### 四、霹靂舞——失落的冬天

中學生在想什麼？中國未來的一代在幹什麼？帶着這個問題，我把目光投向十五、六歲的一代天嬌。然而，這一代人的失落感甚至大於我們，那種天真中的疑惑，思索中的徬徨和喪失對前途的希望，無不使那些稚嫩的心靈蒙上一層灰色。今年聖誕節前後，美國電影「BREAK DANCE」又一次在大陸各大城市上映，一股覆蓋面極大，來勢兇猛的霹靂舞潮，在迷茫的中學生中迅速蔓延，刮起了一陣又一陣旋風。這種劇烈而瘋狂的舞姿，彷彿只有它才能充滿那幼小而無窮大的求知空間，使那些正在發育和求識階段的少年如醉如痴地愛上了它。

入夜，當你步入廣州、北京一些新潮舞廳、現代私人舞場，就會發現活躍其間而且跳得較爲出色的「霹靂舞王子」，幾乎全是些十四五歲、十六七歲的少年中學生。這些靠父母養育的中學生，幾乎全有一套滿夠味的牛仔裝，





中學生，

中學生，

中學生

柔質軟鞋，無指皮手套，鍍金墨鏡，身在其間，讓你想起美國B.B. King中的節目，抖動的身體，震耳欲聾的音樂，充滿了刺激和發洩的情感。

在廣州越秀區的麗達舞廳，我看見一位全副霹靂裝束，有點面熟的少年。在閃爍、迷離、旋轉不定的七彩燈光下，隨着歡樂激揚、節奏極強的新潮音樂，只見他輕快起舞，移動着太空步，從容亮相，極迅速、極靈活地轉動揮舞着全身每一個關節、每一塊肌肉，讓人遺忘世上的一切，沉醉在這痛快淋漓的舞姿中。他一會兒雙腿悠悠然，極似電影中的慢鏡頭，一會似從天降，形如閃電般的急速，翻騰旋轉，令人眼花繚亂，什麼「臥魚」、「蒼龍」、「蛟龍玉柱」、「魔高一丈」……等許多讓人叫不出名字的舞姿，猶如身在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幻想世界，大有「妙處難與君說」之感。

等他五曲跳完，大汗淋漓地步出舞池，我走向前，以一個海外來人的身份，希望他談談今晚的感受。

他很坦率，以還沒完全變正的半童音說：「我今年十六歲，高中一年級學生，我們那個學校屬『第三世界』——極普通的區辦中學。每年沒得幾個考得上大學的。但人人又都想當前幾名，幾年前我們幾乎都沉浸在學習、考試之中。但中學生也是大人，起碼我這麼認為，對社會各種現象有自己的思考。社會上腐敗的現象，知識份子不公平的待遇，對我們讀書的熱情起到了反作用。我一個大學畢業的叔叔，整整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平反後只有八十幾元工資，還不如他兒子在高弟街賣二小時服裝掙得多。過去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現在則是「知識越多越貧困」。我們老師一個比一個窮。高學歷、低工資；人口多，住房少；上班緊，下班忙，一年四季爛衣裳。和那些整天坐出租車，身穿高爾夫西裝衫的倒爺們簡直天差地別。所以四月北京學潮一開始，我們學校

的高年級同學就參加了廣州高自聯，我們和大學一樣反對官倒，反腐敗。否則我們讀書爲了什麼？然而我們絕沒想到解放軍會開槍打大學生，過去我們在學歷史、政治課時曾聽說國民黨如何鎮壓學運，但在不久前一部電影中（「巍巍昆崑」），連蔣介石都不准開槍打學生。你說我們多傷感。所以現在讀書越讀越沒意思，連博士生都鬧着退學幹個個戶，我們死讀什麼？廣州海珠橋事件後，我開始跟我一個當演員的表哥進出舞場，舞步越跳越好。我這人大腦不很發達，小腦却靈活，去年九月深圳霹靂舞大賽我拿了第二名，從此廣州各大舞廳都讓我帶舞表演，從此我在上學之外有了「第一職業」，不但錢越掙越多，舞廳也越跳越大。有時乾脆和同學們在教室裡跳。學校老師總是不順眼，可他們的干涉又那麼無力。我幾個週末晚上的收入比校長工資還高，連我們學校的體育老師都偷偷請我教他，叫我「師父」。像我這樣的，廣州少說也有幾百人，至於那些天天跑舞場的學生更多。告訴你，別看我小，我可有三四個女朋友，趕都趕不走她們……

我好像忘記了我自己的中學時代，和今天的中學生相比，我們是那沒有色彩。可它畢竟培養出了衆多的博士、碩士。該如何定義呢？這留給研究社會學的同胞吧。

就在這家舞廳，我選看到另外幾個跳霹靂舞各具特色的少年男女。我被告知是幾所名牌中學的高材生。

深夜，繁華的羊城變成霓虹燈的世界，我信步走進東山區內一家門票只售五元的舞廳，五彩繽紛的暗淡燈光下，一群十五六歲的男女學生在瘋狂地扭動身軀，沉醉在夢幻的樂曲裡。其中有幾個女學生穿着暴露，描眉畫眼。一位身穿超短裙，染指甲的女孩告訴我：「我對學習已失去興趣，父母一個在外面打牌賭博，一個熱衷於健美打扮，一見面就吵架鬧嘴。我出來跳舞就是爲了躲避他們，享受生活。」另

一位女學生毫不客氣地喝光我桌上的飲料說：「人生如夢，我們這才是珍惜青春。」

還有一對形影不離，卿卿我我的少年男女讓我一看就知道他們在進行着朦朧的早戀。坐在我面前後，他們極爲坦誠地承認他們的戀情。那個小男子漢說：「我和她是同一學校不同班次的同學。我和她是在海珠廣場集會罷課認識的，我是廣州中學生支援團的負責人，她是負責印傳單的。共同的理想使我們連在一起。她人漂亮、能幹、乖巧、跳舞一流、心地善良又有思想……」她緊偎在他肩頭，不時點頭稱是，並說：「我們之間是純潔、真誠的，並不像有的作家描寫得那樣污七八糟。共產黨反對中學生談戀愛。可他們的先例像我們這麼大時都有孩子了。平時我們沒有單獨約會的時間和環境，只好晚上來到這裡散心、跳舞，既少了老師、家長的指責，又玩得痛快……無聊既然大人都來得，我們爲什麼來不得？難道我們中學生不是人？實在可笑……」

據東山賓館一位負責人透露，活躍在霹靂舞場上的基本上是青一色的青少年。中學生又佔了很大比例，甚至還有十一二歲的小學生。面對這種情況，不少老師認爲：迷戀跳舞的中學生，從學校走向社會，從家庭湧向舞廳，頻繁地與社會上不法份子接觸，勢必會影響學習。輕者沾染不良習氣，重者走向違法犯罪之路。理由是：中學生經常去舞廳跳「抽筋舞」，不光是心神不定，眼花繚亂，不思學習，而且還日益追求時髦和物質享受，精於打扮，學會抽煙喝酒泡咖啡，走向墮落……

中學生則聲稱：「我們的生活軌跡難道只能是家庭——學校——家庭，書本——課堂——書本的枯燥循環嗎？最後又有什麼好結果在等我們呢？上大學，挨槍子兒；當教授吃粉筆；做博士賣小吃。我們圖什麼？何況工、農、兵、商、幹都有八小時之外，我們爲什麼就不能有自己的課外娛樂？唉！凡正我們是被遺忘的、多餘

的一代，如今中國是老年人的世界——摘自「蘭州晚報」，「一個中學生的來信」。

關於中學生進舞廳，筆者熟識的一位著名社會學家指出：「中學生是中國的未來，我們國家却沒有給予他們良好的發展環境，幾十年動蕩不定的政治風雲，無疑破壞了他們內心的承受力，使他們失去了對學習的信心和對周圍的熱愛，逼使他們多種壓力下走入頹廢和消極，呈現出今天這樣從大學生到中學生都感到迷茫的現狀。」

在北京，據有關部抽樣調查，跳霹靂舞入迷成癮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校中學生。以培養尖子學生出名的景山中學，僅八九年下半年就處分了八名因跳霹靂舞而曠課的學生。北京一四九中則因跳舞而引發一場北京多年罕見的打群架，一名十五歲男生被刀刺中心室而喪命。

在上海，由大世界、中知報、美國耐克公司聯合舉辦的「耐克杯」霹靂舞大賽中，有數千名中學生報名，最小的只有十歲。

在天津，當天津歌舞團團辦了一個霹靂舞培訓班，爲迎接全市性的舞蹈大賽作準備時，竟有四百多名爭相報名，讓人無法理解這衆多的青少年那來的每人二百元的高昂學費。

在哈爾濱，年齡十三至十七歲的中學生，成爲舞場上佔百分之八十的主要顧客，一位十六歲的女學生以連跳三十小時的紀錄刷新「東西南北」最高紀錄，賽後住院則長達三個月之久。因沉溺於跳霹靂舞而曠課或不歸家者，佔全市連紀學生的百分之四十五。更有進者，獲「一九八九太陽島之冬」霹靂舞大賽優勝獎的兩名正在讀初二的女學生，竟雙雙退學，加入了一支民辦藝術團，開始了雲遊八方，四海爲家的演藝生活，而他們今年却只有十四歲……

該說什麼呢？失落的幻想，失落的祖國，失落的生活——這是一個失落的冬天。

# 人紅革文

今安在

未名



歷史是一面鏡子，有時會使人感到無地自容。

有的人活在這個世界，默默地生在極小的空間，但他們死而無愧，安然瞑目。有的人生在這個社會，叱咤風雲，曾幾何時，然後悄然匿跡，在痛苦和回憶中靜度餘生。所有的人都是歷史的過客，上帝安排了每個人的一生，我們無法選擇。

二十多年前的中國歷史，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傷痕和記憶，同時也使我們認識了一些過眼雲烟般的人物。也許你還記得他（她）們，也許你已經忘記。但這畢竟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現實；他們還都活着，同我們一樣生存在這個世界上，何不讓我們重新再認識他（她）們一次？

## 一、大陸第一公主，最年輕的市委書記——李納

提起文化大革命中自力這個名字，也許今天三十五歲以上的大陸人，還能記起這個經常出現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的筆名，文革中許多篇帶有毛澤東最新指示的檄文均出自該作者，可見文章背景之深。其實，自力乃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共產黨第一公主李納也。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李納，在進入「解放軍報」工作的第一年，就捲進了由其父母導演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毫不落後地成爲名噪一時的軍內造反派頭頭，以二十五歲之妙齡奪得第一軍報總編（革委會主任）之職，成爲那個年代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繼而又晉升爲北京市最年輕的市委書記，達到了她年輕政治生命的最高點。



李納仍生活在對往事的痛苦記憶中。

今天的李納，你找也找不出那個體態豐盈，表情自得的市委書記的影子。走進西單靈境胡同中直機關宿舍大院，你常常可以看到一個體態圓胖，面無表情，雙目呆滯的中年女人，提着一個菜籃，推着一輛半新自行車，到西單商場採購蔬菜，和那些平民百姓一起排隊買豆腐。那年輕的售貨員，大概永遠不會想到面前這個未老先衰的女人，就是共和國領袖的千金，他們過去聲威顯赫的女市委書記。

一九七六年，對李納來說是一生中最痛苦和最倒霉的年度，首先是父親魂歸西天，屍骨未寒，母親又鋸鑄入獄，使她改變了整個個人生。隨着政治上剝奪一切權力，她失去了往日的一切。李納一度精神失常，除了每月去秦城監獄探視江青外，一直沒再上班。人們只有偶爾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生日那天的電視新聞中看到那張麻木的臉和半脫的背。

在毛澤東的一些老部下關心下，八五年中旬，李納與軍隊師級幹部再婚，開始了平民生活。李納現掛名在中共中央檔案館，但基本上不上班，只是當有人對文革中毛澤東一些講話和流傳廣泛的語錄進行核實時，李納才會去檔案館會客室去見見來人，當然這種事情一年也不會幾次，特別是這幾年，毛澤東的語錄早已被人們忘記。平時的她最愛逛商場，體會着凡人的生活。已經過去的往事常常折磨着她，使她有時會莫名其妙地發怒。好在她比她大七、八歲的丈夫頗願意受委屈，每當此時便好言相哄，直到平息為止。和前夫徐某生的兒子已長大，穿戴頗為時髦，就讀於重點高中北京四中，據說十分聰明，大有毛澤東的基因，古詩歷史皆優，對政治有濃厚興趣。此次學潮期間，

他帶領四中幾百名同學加入天安門廣場絕食團，大罵老鄧，以報小鄧詆毀外公之仇。

近日聽說李納已看破共產黨和鄧小平，正托人聯繫，幫助兒子出國留學，讓毛澤東的外孫接受西方教育。天知道最恨西方文化的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會作何感想呢？

此人就是林豆豆



二、反其父而生，因其父而毀的林豆豆

當周恩來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接到林豆豆從北戴河打來的電話時，毫不猶豫地下達了發射導彈的命令，他不失時機地除掉了晚年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對手，並利用林彪的唯一千金林立衡（林豆豆）之口作為向七億人民交待的砒碼，用完之後，便拋到了大山之中。

被飛彈擊落墜機慘死的  
忘記加油，最新情報他是  
舊說一般認為林彪逃亡時

文化大革命中的林豆豆，有着與李納相似的經歷和感受，只是這位「帥府千金」一直生活在由其父控制的軍隊中，從一個正連職記者一躍成為副帥職的「空軍日報」副主編，以林立的筆名撰寫了大量文章，成為空軍第一筆。

中國孔孟之道的最根本之處就是孝道，而林豆豆恰恰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舉動，用親生父親、母親和哥哥葬身溫都爾汗的代價，換來了自己的生存。但共產黨並沒有因此而善

待她，使她在良心和痛苦失望中成爲空軍總醫院精神病房的病人，一住就是三年。歷史嘲弄了她。久經沙場，深具城府的周恩來給她上了人生最難忘的一課。林豆豆七三年出院後，立即被周恩來下令押送內蒙軍馬場勞改，解除軍職。據林的丈夫張清林回憶，他們兩人住在一間四處漏風的帳篷裡，被強迫養雞喂豬，還要種十五畝地。春耕時節，夫妻倆早起晚睡，在刺骨寒風中，林豆豆在前面牽牛，張清林在後面扶犁，簡直是一幅刀耕火種的慘烈景象。

張清林每當談到此處，總是淚流滿面。張清林原是廣州軍區某部軍醫，出身貧寒。後因在湖南醫學院學習期間，因外科手術技術高超而聞名全軍。由於張個子高大，人又英俊漂亮，一表人才，被邱會作老婆挑上，做爲林家女婿幾百名後備隊員之一。林彪出走那夜，正輪張清林陪林公主在北戴河療養。林彪事件後，所有女婿後備隊員一哄而散，唯恐沾身。張清林一往情深，以醫生之職責精心護理左右，終成眷屬。

八十年代初，林豆豆和張清林被安置在晉南山城中的一家軍工廠，過起了凡人生活。也許出於中國平民的質樸和善良，工廠的工人對他們二人十分友好，也因為張清林是醫生的緣故，家中經常客人不斷，人來人往。二口子工資加起來有二百元左右，這幾年買了彩電、錄音機和洗衣機，平平淡淡在那個小城裡一年又一年地過着。但這一切並不能使林豆豆忘記過去，惡夢和痛苦的回憶使其患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和全身性關節炎，喪失了工作的能力，每天躺在「特製床」上看書讀報消磨時光。「再不會有往日的歡樂……」這首蘇聯民歌常常哼在嘴邊，消瘦的面孔使人想起在毛澤東身邊搖語錄木的林彪。也許是前世冤緣，統帥千軍萬馬，被共產黨譽爲常勝將軍的林彪，竟死在他最寵愛的女兒手裡，真是開歷史的玩笑。

聽說林豆豆在悄悄寫一本有關林彪事件真相的書，但願我們能早日看到這段真實的歷史。

三、向歷史開砲的聶元梓

聶元梓，這個中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響徹雲霄的名字，一代亂世狂女，在當時曾經引起多少人猜忌、企羨。幾千萬紅衛兵的偶像，文

聶元梓一九八三年在被告席上



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篇評論」。

毛澤東所讚賞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就是聶元梓。這在當時瘋狂崇拜毛澤東每一句聖旨的年代，無疑奠定了聶元梓日後在中國政壇上的基礎，使其一夜之間成爲中國七億人家喻戶曉的名女人，幾億雙眼睛常常可以看到這身材不高，戴一副無色眼鏡的半老徐娘和年輕人一樣，身穿洗得發白的舊軍裝，手揮毛澤東紅語錄本，常常出現在新聞紀錄片中的毛澤東身旁，一張洩私憤的大字報將她推上中國政壇的頂端。

當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聶元梓，鬼使神差地被康生所看中，幾個熬夜之後和幾位同仁，在康夫人曹佚歐的指點下，以六人聯名名義將題爲「宋碩陸平在北大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貼在了北大大飯廳裡，頓時引起一片沸騰和喧嘩，繼而使全中國爲之喧鬧。她畢竟向歷史開了一砲，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許該佩服她當時的勇氣和膽量，無論她當時的心境是什麼，後來所發生的一切已不能由她所左右，歷史也對她開了一個大玩笑。

化大革命戰火的點燃者，歷史永遠不會忘記這個不甘寂寞的女強人。

毛澤東曾在標註着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動員令「砲打司令部」中說過：「全國第一張馬列

一九八八年夏天，北大人久別重逢地發現聶元梓回來了，在燕南園裡，聶元梓上着麻織豆青色短袖衫，下穿黑色西裝裙，戴一副茶色眼鏡，儼然一副北大教授的模樣，只是再沒有英姿煥發的身影，緩慢的步子邁得那麼沉重。她失去了一切，文化大革命她曾是紅極一時的人物，是毛澤東砲聲裡的第一顆砲彈，但毛並沒有給她安排好仕途。只撈了九大中央候補委員。當毛澤東覺得再不需要她時，就把她下放到一個偏遠的農場，進行思想改造，使她成了文革的犧牲品，但歷史却總忘記不了她。四人幫被抓起來後，隨着對文化大革命的聲討，聶元梓又被人們想起，很快被逮捕判刑，關在一間專押刑事犯的監獄中，開始了漫長的牢獄生活。八七年初由於聶患腿疾，被假釋，在位於沙灘北的公安醫院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投

靠在北大的任教的女兒家暫居。

聶元梓至今也搞不清她錯在哪裡，甚至為自己叫屈。也許事實確實如此，她的命運是上帝安排的。

她慘兮兮地告訴好友，現在她已被北大開除公職，沒有房子、工資和醫療保健。對以後的生活感到茫然。她甚至羨慕林希翎，希望國外哪家學校或基金會能請她出去，去研究文化大革命史。

歷史是無情的。在抗日戰爭時期，聶元梓是個熱血奔放的文化青年，毅然背離家庭投奔延安，全身心為共產黨工作了二十多年。一場文化大革命毀了幾百萬人的生命和幾千萬人的前途，也毀了她自己。

今年，聶元梓已六十八歲，老矣！

#### 四、重新生活的蒯大富

一九八七年十月，曾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煽動罪、殺人罪、誣陷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的蒯大富，走出了北京市第一監獄的大門，被安置在寧夏青銅峽鋁廠勞動和工作。

要不是去年七月他的婚事轟動北京，人們也許不會再想起這個當年響噓噓的人物。

做為清華大學造反派首領的蒯大富，是文「革」初期中國政治舞台上名噪中華，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他與北大的聶元梓、北大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師大的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橫霸天下，被稱為五大學生領袖，是八百萬紅衛兵的旗幟。蒯一九四五年生於江蘇海州縣振東鄉一農家家庭，父母均本分守己。一九六三年聰明過人的蒯大富以六門功課平均八十分的分數，考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時年十八歲。他的政治生涯是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聶元梓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開始。一次激昂的飯廳講演後，被推為學生領袖，開始造反。蒯以勇敢善鬪著稱清華園，從校長到化工系教授均受過他的拳頭。清華大學兩

派武鬥時，蒯佩雙槍身先士卒，在血肉橫飛中成為清華大學的主宰人物。至今一幫高幹子弟提起蒯某還有些心驚不已。也許蒯大富拳下對手太多，不免遭人告御狀。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見五大領袖時，當面開罵蒯大富打擊面太大。從此，這位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總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開始退出政治舞台，消聲匿跡。

離開學校後，他當過電解工，又作為「五一六」份子被關起來審查三年，後被安排到北京石油化工廠勞動。一九七六年底，蒯大富突然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被關進中國巴士底獄——秦城監獄。

公審「四人幫」時，九億中國人從電視上看到了這位身穿囚服，吐沫橫飛地咒罵江青的樑上君子，令人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酸楚和憐憫。也就是因為他有那種出人意料的表现，一九八三年三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考慮他立功贖罪的積極態度，寬大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刑期從開押之日的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算起。

在感情和兩性的問題上，蒯大富至今仍頗有自豪地宣稱文革期間沒有學其他造反派領袖一樣，染指過任何一位女紅衛兵戰士。今年已四十五歲的蒯氏有二十幾年的戀愛經歷，但沒有一個成功，機緣總和政治有扯不清的聯繫。從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刑滿釋放後到八八年四月的工廠勞動生活中，好事之人給他介紹過五十多個「對象」，有工人、記者和工程師，但都由於種種原因沒能「對上」。當一位小報記者採訪他問及擇偶標準時，這位落難者不失當年豪壯之氣勢，定下標準如下：(1)全部接受我的歷史狀況(不得因我坐牢而有絲毫蔑視，也不得以憐憫的姿態看待我)；(2)需要長期忍受貧窮；(3)對於由於客觀和主觀原因可能造成的未來惡運，要有充份的思想準備；(4)必須調到寧東來工作，不能兩地分居。在大齡男女擇偶難的中國大陸，這個標準高得有些令人難以相信，恐

怕一個部長公子以此標準都難以找到女朋友，何況歷史「不清白」的蒯氏。

但樹林大了，什麼鳥都有，中國大陸常有奇人奇事。小報將蒯大富之擇偶標準見報不到兩個月，北京新聞界就爆出一大冷門消息：蒯大富當年七月在北京結婚。新娘竟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七八級的廿六歲的才女羅小朋，舉家震動，家喻戶曉。使蒯氏滿面生輝，特帶嬌小貌美之新娘回清華兜了一圈，給那些研究大齡男女婚姻的專家們留下一道難解之題。

去年八月筆者來美之時，聽說蒯大富已攜妻飛往南京某電子研究所辦理羅小朋調往寧夏之手續。

人生之路乃天定也。

#### 五、昔日女總理，今日賢內助——吳桂賢

提起吳桂賢，凡從文革中過來的人都不會忘記那個時常拖一條長辮子，和陳永貴、倪志福幾個工農中央委員，拘束而恭敬地站在毛澤東身後的中年女人。一九七三年的「十大」使她和陳永貴等一躍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進入中共最高領導階層，舉世矚目。特別是一九七五年吳桂賢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後，使她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副總理。吳桂賢，這個名字成為僅次於江青之下的共和國第二號女公民。西方中國問題專家開始尋找有關她的背景材料，對於當時封閉的中國社會，這個女人無疑是一個迷一樣的人物。

其實，在中共「九大」之前，吳桂賢只是位於陝西的西北國棉一廠一個普通紡織女工，最高的榮譽和職務是一個以已故全國勞動模範趙夢桃的名字命名的小組長。她九大期間的直線上升應該歸功於天命。那年陝西省商定九大代表，根據當時的政治條件把她推上去，接着在臨議中央委員會工農候選人時，她即是婦女又是工人劳模，而且年僅三十歲出頭。正好符



過去吳桂賢以一位紡織女工  
躍升為副總理，却不見有李瑞環今日的風光

合選拔條件，成為中共中央委員。那時，年近八十的毛澤東由於林彪事件的刺激，又恐懼周恩來手中越來越大的權力，善於搞平衡的毛開始在工農兵中尋找效忠者。首批進入核心階層的就是王洪文、陳永貴和本文主人吳桂賢。她就是這樣在文革那個奇特的潮流席捲着，夢幻般地由一個普通紡織女工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從黃土瀾漫的渭河之濱，走進仿如仙境的中海海。

隨着華國鋒的政變成功，鄧小平奪得大權之後，吳桂賢和陳永貴一樣被清洗出領導核心。命運恩賜了她，同時又戲弄了她。七九年底，她被隔離審查一年多之後，又重新回到生她養她的渭河畔，回到了她那個「趙孟桃小姐」，當一名擋車工。

也許西部人太落後太封閉了，面對她這樣一個落難者，西北國棉一廠的二萬名職工似乎無動於衷。質樸的西北民情使吳桂賢又返樸歸真，像十年前一樣投入到這家工廠的生活社會中。特別在家裡，她好像想彌補過去當副總理時的過失，每天只要一回家就收拾屋子、買菜

做飯、洗衣服。她丈夫是咸陽電子工業部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都是品學兼優的中學生，給吳氏的後半生多少帶來一點欣慰。

應該說，在文革期間紅過的人，吳桂賢的歸宿是一種幸運，她本人特有的勤勞和純樸，使她贏得了工廠工人的同情。前不久，筆者一位在西安當記者的朋友打電話來說，吳桂賢又成為陝西省政治人物之一，再次出席陝西省黨代會，並升任西北國棉一廠黨委副書記。

從一個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到一個地方工廠的黨委副書記，這之間的跨距有多大？熟悉中國大陸政情的人都清楚這一點。不知吳某的內心是什麼樣的感觸，是喜？是悲？大概這只有吳桂賢自己才能回答。

### 六、從副委員長到副處長的李素文

李素文，稍大一點年紀的人都熟悉。文化大革命前，她不僅是大陸商業戰綫上的一名勞動模範，而且還是著名學毛澤東小紅書的積極份子。當時，全國還會掀起一個學習李素文熱潮。

一九七五年，在四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名單中，人們突然看到了李素文這三個字。遼寧人真不敢相信他們這位瀋陽一個菜市場的售貨員，一躍成為人大副委員長。但白紙黑字，照片上就是那個齊耳短髮，經常在電台介紹學毛著經驗的中年婦女。

作為陪襯作用的人大常委會，在共產黨一黨專政下，實際上是一只花瓶。而身為花瓶的副委員長，李素文基本上沒有參予當時的權力角逐。但為裝門面還不得不被老毛派出來接見外賓和出訪國外。於是這位小學水平的菜大姐給臣民們留下了許多笑柄。據傳，一次李副委員長接見一日本醫學代表團，日本人恭維時順便說出很崇拜著名醫學家李時珍，聲稱李氏名著「本草綱目」乃偽世之本。李素文立即回首對手下交待安排李時珍明天和日本客人座談。

舉座茫然不知所措。此軼聞在大陸家喻戶曉。現在十多年過去了，李素文今在何方？

前不久，筆者的朋友在瀋陽見到了她。現年五十五歲的李素文任瀋陽輕工業管理局供銷處副處長，音容笑貌依然如故，真是能上能下的好幹部。

她是一九七八年四月被鄧小平清洗回到遼寧的。一直到一九七九年都在瀋陽糖果廠勞動檢查，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待業賦閒。一九八六年十月調任現職。

李素文毫無傷感地回憶了一下過去的歲月，彷彿是一次很平常的經歷。反而對現在的工作興趣十足，告訴記者她分管產品銷售、信息收集、籌措外匯等工作，工作異常繁忙，一年有二百天在外地出差。並不無得意地說，由於她過去的職位，使她熟人很多，全國各地許多地方官從縣委書記到省長，見到她都特別客氣，使她在工作上有很多方便之處，特別是搞外匯方面，主管部門常常看她過去的面子多批一些，使她為公司受益不淺。

李素文的丈夫在瀋陽自動控制研究所搞行政工作，二十六歲的女兒在瀋陽印刷研究所。一家生活愉快。

對於過去的認識，李素文覺得十分委屈。特別是對某些人說她是「假勞模」不滿。她說，自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十年中，她確實實實地當選過勞動模範，而且現在仍然是勞模。

李素文的住房還是她七十年代初到瀋陽時，組織上給她安排的普通民房，只有二十八平方米。談到生活時，李素文告訴記者：盡管物價比過去高了，但全家生活水平也確實提高了。從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八二年，我整整拿了二十年的每月六十元工資，連當人大副委員長時也是這個數，只是每天多六毛錢補助而已。可現在我收入都加起來有二百元。冰箱、彩電是回瀋陽才買的。現在這個副處長比副委員長實惠多了……

與我朋友告別時，李素文希望人們不要責怪她，因為她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

## 農民副總理陳永貴如今已瞑目黃土



大陸報導

### 七、姚連蔚的昨天與今天

文化大革命中，在陝西除了前面談到的中國第一位女副總理吳桂賢外，還有一個工人出身的四屆人大副委員長姚連蔚。當時，在陝西省來說，是一種政治上的榮耀，就像德克薩斯州人對國會山莊和白宮中德州佬多而感到驕然一樣。

雖然，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的十八個副委員長中，姚連蔚排名最後，但他是最年輕的，只有四十歲，又是工人出身，名字仍然令人矚目。

但人們却很少見他出席公眾活動，幾乎在報紙上找不到他的照片。筆者在北大讀書時，一瑞典留學生做博士論文研究文革衆星，翻遍北京圖書館，才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一張人民日報上找到姚副委員長的光輝形象。那是他和華國鋒一起率團到拉薩參加西藏自治區慶祝活動的照片，頭戴一頂呢製鴨舌帽，一付不知所措的樣子。

他能當上人大副委員長，連他自己都覺得是個誤會。年輕時的姚連蔚讀過初中，種過田，做過小買賣。後來又當過兵。轉業後當過工廠車間支部書記，廠工會幹部。按理說，這樣的經歷在大陸千千萬萬，很平常。問題在於「文革」的亂世給他一個嶄露頭角的機會。文化大革命的衝鋒陷陣，使他在六九年意外地被推為九大代表，又意外地當上中央候補委員，成為老毛填空的一個棋子。一九七五年，他從陝西省總工會副主席一躍成為人大副委員長。他的出現甚至比王洪文當黨中央副主席還令人吃驚。因為王洪文畢竟救過毛澤東的命，名聲也早已響徹黃埔江兩岸。而姚連蔚在陝西只是一個小人物。

副委員長的職位只讓他坐了二年半。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二日，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紀登奎、陳永貴三人找到他，神情嚴肅地說：「陝西省有人告你的狀，如果再讓你繼續工作，中央不好解釋。」這樣，一九七九

年二月姚連蔚又糊裡糊塗地成了潛下囚——被關進了西安北郊監獄。

等問題搞清楚時已經到了一九八一年十月，對什麼都失去信心的姚氏不再對政治感興趣。甚至也不想申訴為自己「平反」。他覺得這一切都是命中註定。所以他出獄後，不再工作，不再對國情政況感興趣，只是在家燒魚做飯。成為 HAUSE HUSBAND，熱衷於採購、烹調。偶爾和鄰居下幾盤象棋。對於今天的現狀，他說：「艱難時期已經過去，我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了。但今天在台上的人則不然，他們也許要用上斷頭台的方式離開政治舞台。如此相比，我感到欣慰。」

### 八、恍惚迷離的馬天水

馬老，上海人心中的「聖者」。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唯獨留下了原市委書記馬天水，成為老幹部中的不倒翁。

文化大革命前，馬天水是與張春橋平起平坐的上海市委書記，再早則是張的上級。上海「一月風暴」後，馬天水敏銳地嗅到政治空氣的變化，一把抱住了原來看不起的張春橋。當張春橋榮升中央後，馬天水從當時的上海市第七位革委會副主任，一躍升為主持上海黨政大權的一把手。連四人幫見到馬天水，都一口一聲「馬老」，江青甚至建議毛澤東升馬天水為國家計委主任，可見馬天水之人緣。在歧離扁平的上海人中，來自河北的馬天水居然穩穩當當地坐鎮上海十幾年，足見馬老之功力。一九七六年十月，馬天水一步錯失前途，把北京的政變看得過於簡單，竟安排手下徐景賢、王秀珍準備武裝抵抗，終因不遇而鐐鑿入獄。面對高牆鐵窗，馬天水回想一生為共產黨賣命不遺餘力，最後落得這個下場，一根筋沒轉過來，瘋了過去。

一九八二年，由其弟馬登坡作保，把馬天水接回河北唐縣老家養病。但馬天水怨恨離舒，時常犯病，經常從家裡出走，到集市鄉鎮



慨陳詞，痛罵華國鋒、鄧小平為賊臣狗膽，觀者甚眾。由於涉及政治言論，馬登坡要求政府領回，解除對兄長的擔保和照顧。

一九八三年四月，公安部和上海市有關單位派人前往河北唐縣接回馬天水，沒料到，吉普車一進馬家莊，馬天水就像一匹受驚的野馬，飛也似地朝野外狂奔，不一會兒就消失在密密的樹叢中。幾十個武警經過二個多小時的尋找，才在一條水溝裡找到累昏了的馬天水，只見他趴在溝底，腦袋鑽進草叢，一付恐懼的神情。

當囚車在華北平原奔馳時，馬天水環顧這熟悉的原野，喃喃地說：「我們在這個土坡打過小日本，那邊的砲樓，還是我炸飛的……」歷史的回憶對於馬天水是清晰的，但一觸及當前，他仍舊破口大罵鄧小平和趙紫陽。後來聽說由老鄧親筆簽字，將馬天水關進了北京西郊的一家軍隊精神病院，又開始了與世隔絕的生活。

九、他們與我們同代

今天到美國留學的人，大部份在三十歲左右，如果不健忘的話，都會記得當年有兩個知識青年的榜樣：一個是：「誠心務農」的董加耕；一個是堅決與傳統觀念決裂的柴春澤。用「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來形容他兩人的知名度，並不過份。後來，「廣闊天地」的狂熱逐漸變為悲憤後，他們也從新聞界和人們腦海裡消聲匿跡了。

然而，今天他們又怎樣呢？先說董加耕，他於一九六一年高中畢業，由於學習成績、思想、體質都比較優秀，學校決定保送他上北京大學哲學系，而他却在升學志願書上填寫了「回鄉務農，立志耕耘」的豪言壯語。成為報紙頭版人物，但在那個年代的政治風雲中，他時而飛升，時而落下，常常是輝煌的榮譽與嚇人的罪名集於一身。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七年中，回鄉當了五年的

「新型農民」；被打成反革命十九個月；後又被當成五·一六份子關押審查了三年。事後又擔任過團中央十大籌備小組副組長、國務院上山下鄉領導小組成員等職，在北京工作了四年。四人幫垮台後，又被隔離審查十三個月。這期間，毛澤東請他吃過飯，江青也請他和邢燕子在她的小放映廳看過電影。

在花冠和重軛交錯的險道上，他踉踉蹌蹌地走過了十八年後，又回到了最初的起跑綫，回鄉當了一個普通農民，每月二十五元生活費坐的上海市委書記，再早則是張的上級。上海「一月風暴」後，馬天水敏銳地嗅到政治空氣的變化，一把抱住了原來看不起的張春橋。當張春橋榮升中央後，馬天水從當時的上海市第七位革委會副主任，一躍升為主持上海黨政大權的一把手。連四人幫見到馬天水，都一口一聲「馬老」，江青甚至建議毛澤東升馬天水為國家計委主任，可見馬天水之人緣。在最離譜平的上海人中，來自河北的馬天水居然穩穩當當地坐鎮上海十幾年，足見馬老之功力。一九七六年十月，馬天水一步錯失前途，把北京的政變看得過於簡單，竟安排手下徐景賢、王秀珍準備武裝抵抗，終因不週而鋃鐺入獄。面對高牆鐵窗，馬天水回想一生為共產黨賣命不遺餘力，最後落得這個下場，一根筋沒轉過來，瘋了過去。

一九八二年，由其弟馬登坡作保，把馬天水接回河北唐縣老家養病。但馬天水怨恨難舒，時常犯病，經常從家裡出走，到集市鄉鎮慷慨陳詞，痛罵華國鋒、鄧小平為賊臣狗膽，觀者甚眾。由於涉及政治言論，馬登坡要求政府領回，解除對兄長的擔保和照顧。

一九八三年四月，公安部和上海市有關單位派人前往河北唐縣接回馬天水，沒料到，吉普車一進馬家莊，馬天水就像一匹受驚的野馬，飛也似地朝野外狂奔，不一會兒就消失在密密的樹叢中。幾十個武警經過二個多小時的尋找，才在一條水溝裡找到累昏了的馬天水，只見他趴在溝底，腦袋鑽進草叢，一付恐懼的神情。

請。

當囚車在華北平原奔馳時，馬天水環顧這熟悉的原野，喃喃地說：「我們在這個土坡打過小日本，那邊的砲樓，還是我炸飛的……」歷史的回憶對於馬天水是清晰的，但一觸及當。整整四年，他什麼都幹，挖窖、喂豬、挑糞、養雞、種地。直到一九八二年，他被鄉民選為鹽城縣郭孟鄉管委會副主任。八六年，被鹽城市郊區政府任命為鄉鎮企業局副局長。

見到頭髮不整，滿面皺紋的董加耕，完全一付鄉下老農民的樣子，使人感到失望和疑惑。也許這多年的政治生活使他感到懼怕，他堅決拒絕記者採訪，聲稱歷史是虛無的，他還要生存，不想再成為新聞的佐料。

再說柴春澤。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一封拒絕父親為自己走後門回城，表示與傳統觀念決裂的信，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使一個普通知識青年的名字——柴春澤，傳遍大江南北。隨後，數不清的報告會、座談會、講用會，以及大小報刊連續不斷地介紹，使他與邢燕子、侯隽等揚名五湖四海。

這樣，柴春澤夢幻般地參加了全國及省市的有關會議，受到各級領導的接見，並出國訪問，升官入黨。

一九七六年十月後，柴春澤作為知青的「典型」從風口浪尖上躍落下來，輝煌的榮譽變成可怕的罪名。他被關押了二年多，一九七九年才「審查」結束，又回到當年下鄉的內蒙古和原昭烏達盟大草原務農。也許他終於看清了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一九八〇年九月，他做為最後一批知青被招工返城，分配到遼河油田工程局當工人。

現年三十八歲的柴春澤有一個和睦的小家庭，妻子劉麗新是原來一起插隊的「同村」。還有一個挺可愛的八歲女兒。他每天穿一身厚的工作服騎車二十里去上班，風雨無阻，默默地掙錢養家。

這就是二位在人性的險峰中墮落沉浮的我們的同代人。

# 短期行爲

# 綜合症 (下)

丁楚

## 一、海外的短期行爲表現為急功近利

在上期中國之春發表的「短期行爲綜合症」一文中，我論述了中國大陸各階層的「短期行爲」現象，指出了這一現象是信心崩潰的具體表現，也是社會崩潰的前兆。

然而，短期行爲綜合症不但中國大陸有，海外也有。本文想談的是民主運動內部的短期行爲。如果說在國內，人們的短期行爲是出於對共產黨的統治喪失信心的話，那麼海外民運的短期行爲則是出於急功近利的情緒。

而急功近利的背後，還是一個信心問題。民主運動是一項長期的事業，它相當於一個長期的投資。而任何長期的投資都必須建立在對前途的信心上，急功近利的具體表現就是長事短做，把長遠投資的資金花在短期投資上。

## 二、搞民主要坐得起冷板凳

我接觸到很多海外民運的活動份子，他們都異口同聲地問：「我們該做點什麼？」從他們身上你也可以感到那種正義的熱情，但同時也可以隱約覺察出一種焦慮的燥動。這種情緒可以稱為「急功」。

顯然，有些朋友們所說的「做事」是指那些「驚天動地」的事。可惜的是，做這種事的機會在海外並不多。其結果造成大家無事找事，把一些寶貴的錢和精力投在一些無謂的消耗上，其結果無非是造了幾個能轟動一兩天的「新聞」。

在民主運動中，有大量事情是默默無聞的。如打破新聞封鎖，需要發千百封信回大陸，打千百個電傳和電話。這些工作即沒有新聞效果，又費時費力。又如大家都說要救濟死難者家屬，要發動工人農民，而這些工作都只能在暗地裡進行，甚至不能為人知，要物色人，準備錢，等待時機，巧妙聯絡。要知道，每一個真正「驚天動地」的事背後不知要積累多少這種小事、瑣事的能量。這種默默無聞的工作是真正的長遠投資。

「急功」的動機無非是要爭取在海外民主運動中的 CREDIT，以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這種情緒，在現實的角度上是無可非議的。「六四」之後，海外成立了八百多個民運團體，每個團體都希望不斷地叫喚兩聲，鼓舞士氣，以免被社會所遺忘。然而「無可非議」並不一定等於正確和有效果。海外的政治資源是有限的，人力、財力和新聞媒介就這麼多，與其把它們投入在分散的短期效益的項目上，還不如把它投入在具有長期效果，但默默無聞的準備

工作上。

要進行長期韌性的鬭爭，就要做好「坐冷板凳」的準備。而對自己的事業沒有充分的信心是坐不起冷板凳的。對於一些小的民運組織來說，這種要求未免苛刻，如果他們對明天的生存尚無把握，怎麼可能坐得起冷板凳。因此，要想克服這種急功的短期行爲，適當地合併組織是必要的，儘管我個人也並不急於「天下大一統」的大聯合。

## 三、不能花九牛二虎之力拔敵一毛

短期行爲的另一個表現是「近利」。為了眼前的利而損害了長遠的利。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民聯策劃的楊洋事件。

楊洋事件確實搞得新聞十分轟動，一個小小的游泳運動員竟然把中、英、美、港、台五家政府捲在其中，並驚動了美國國會幾乎所有的議員和海外僑界的關注。正如「中國之春」的專題報導所寫：一人牽動萬人心。可是這個新聞最多只有三個星期的效果，而爲了這二十天的新聞效果，我們損害了巨大的長遠利益，打亂了長遠的戰略佈署。

首先，這個事件把香港政府搞得很窘，傷害了民運團體和香港政府的關係。以致後來發



生民癩成員陳軍、汪岷、錢達被驅逐出境的事件，甚至連「全支聯」也為此承受了壓力。如果我們在香港站不穩腳跟，在那裡開展民運又從何談起？在民主事業上，香港政府可以視為朋友而不是敵人，與它的關係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

其次，這個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是後來從大陸逃出來的一些參加民主運動的份子。在他們中間，至今還有幾十人滯留在香港前途茫茫。我會碰到幾位最終有幸離開香港的人，他們對

有的時候你可以花九牛二虎之力拔敵人一根毛。拔敵人一根毛自然是打擊了敵人，可是成本呢？以九牛兩虎之力換敵人一根毛合不合算？留着這九牛二虎之力在適當的時候甚至可以用打垮敵人，而不懂得是得一毛。

克服「近利」短期行為的唯一辦法是在明確的目標的基礎上建立長遠的規劃和通盤戰略，並通過宣傳達到基本的共識。長遠的規劃和通盤戰略只有通過有組織的行動才能實現，因此發揮組織內部和組織之間的協調功能是很重要的。如果各自為政，想到什麼幹什麼，只能

民主運動也好，民主制度也好，信則靈，不信則不靈。在這裡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存在決定意識，而恰恰是意識決定存在。

推翻共產黨的一黨專制說來很難，但也可以很容易，只要十億中國人民在同一時刻說一聲「不」字，共產黨的獨裁傾刻就會倒塌。可是難就難在你怎樣使所有的人有信心說出這個「不」字，怎樣讓他們每一個人相信，其他大多數人心裡想的和他是一樣的「不」字。創建一個理論是很容易的，可是讓人們相信它比創建它難一百倍。哥白尼發現地球圍着太陽轉只

楊洋事件都忿忿不滿，搞得我心裡很難過。因此我覺得從這個事件中總結一下教訓是很有必要的。

「近利」心理的原因是有沒有明確的目標和長遠的通盤戰略。只要能打擊共產黨，抓到什麼事情就幹什麼。毛澤東有句名言，對很多人影響很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句話看起來很有道理，可是實際上很荒謬，從頭到尾是以敵人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為中心。

贏小仗，而贏不了大仗，甚至為了贏小仗而輸了大仗。

#### 四、發明理論比讓人們相信它容易的多

人們對共產黨專制統治的信心崩潰，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然而，現在擺在民主力量面前的任務是：怎樣建立人們對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的信心，怎樣在一個新的基礎上恢復社會的秩序和建立有規則的行為方式。

不過花了幾年的精力和時間，而布魯諾為了讓人們相信它却付出了生命。

在海外，有一部份人相信，民主事業最重要是突破中國人的心理障礙，只要勇敢地喊出「打倒共產黨」，就可以揭杆而起，從者如雲。實際上事情並非那麼簡單。我相信中國人民中大多數人心裡並不反對「打倒共產黨」，這並不存在一個心理障礙問題，而是一個安全問題，勇氣問題。每個人都有家有小，瞻前顧後是必然的，搞民主運動的人必須考慮大多數人的顧慮和安全。我對那些敢於喊「打倒共產

黨」的人的勇氣是非常敬佩的。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只要勇於表達自己的觀點就夠了。他們只要對自己的良心負責。可是作為搞運動的政治家，就必須對他們的行動後果負責，也必須對捲入運動的群眾的安危負責。因此，我們才需要設計出諸如「政治活動非政治化」、「組織活動非組織化」、「聚孤體為群體，化整體為個體」、「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強調要什麼，不要強調不要什麼」……等等戰略原則。民主運動是一個廣泛的群眾運動。我們不能把民主運動建立在孤膽英雄的基礎上，而必須把它建立在常人都能承擔的基礎上。

有人說，在這次「八九」民運中，工人和農民沒有捲入是因為運動提出的口號沒有涉及到他們的利益。所以要提出符合工農具體利益的口號和綱領，來吸引他們參加民主運動。這個說法從表面上看是很合理的，但實際上只要你具體運作就會發現其中的可行性並非那麼誘人。如果用小恩小惠來收買工農，政府手中比反對派有更多的資本，它有權、有錢、有可以兌現的支票，而我們有什麼？只有空頭支票，即使控制通貨膨脹，操縱桿也在它手裡不在你手裡。但如果只是泛泛地提保障私有產權、土地私有、自由擇業、保障人權、反對官倒等原則性的口號，也存在一個信心問題，工農大眾怎麼能相信你辦得到？

因此，在民主運動中，不能輕視「道義」的力量，在天安門廣場上，北京市民忍受着交通不便，小販們破費供應，敢死隊以生命相許來支援學生，以其為了利益還不如說是出於道義。

民主事業無疑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但是為了這個長遠利益甚至有可能犧牲個人的眼前利益，但這是必要的。讓廣大人民相信這一點需要作艱苦細致的工作，想通過「短期行為」的捷徑繞開是行不通的，也會自食其果，設想一下，萬一哪一天共產黨專制真垮了，而你期許的支票又無法兌現怎麼辦？那時候今天走捷徑的短期行為將會引致走馬燈的短期政府，那些利用人民的不滿推翻前任政府的人同樣也會被人民的不滿推翻。

五、如何從流氓政治過度到君子政治

如果說結束共產黨專制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事業的話，那麼在共產黨專制結束後，建立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則是一個更加艱巨百倍的任務。

在上一篇「短期行為綜合症」中，我把中國社會的現狀比喻為一條大船，船上的人信心動搖，都以為這條船要沉了，每個人都想拆一塊板以便船沉之後可以逃生，於是這條船本來可以不沉也要沉了。

現在民主運動的任務就是要在遠處樹起一支帆，讓沉船上的人看見希望，重建信心。而這個事業的困難是可以想像的。

現在中國大陸，由於人們的信心崩潰，整個社會都失去了行為規則。各個階層都是短期行為，人們之間很難建立起信任。正如我們前面所言，民主制信則靈，不信則不靈。如果我們不能建立起人們的信心和信任，民主制、民主秩序就是一句空話。

有一次蘇曉康感慨萬分地對我說：現在中國人之間是流氓政治，從流氓政治過渡到君子政治還有很長的路。

所謂流氓政治就是不講規則，不擇手段。經過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人，每個人都懂得一點「厚黑學」，不擇手段，不講規則的風氣盛行，一方面這是被險惡的社會環境逼出來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這個土壤上建立民主制非常不易。

為了樹立起中國人對規則和程序的信心，作為民主組織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在自己的內部建立民主的規則和程序，並嚴守規則和程序。要用自己的榜樣來建立人們對民主的信心。英國的貴族之所以保存到現在，是因為他們在社

會中起着公民行為的楷模作用，他們的行為方式維持了社會的價值標準和安定。搞民主運動的團體，也應在社會中扮演這種角色。

中國大陸人向來佩服「烏龜」。他們崇尚功利主義文化，佩服靠陰謀、陽謀和強力取勝的贏家，於是很多人都不自覺地學習扮演這種角色，這一方面體現了大陸人的奴性，另一體現了其勇氣。要知道，若是人人都「厚黑」的話，誰也佔不了便宜，你黑，有更黑的人去治你，最後是黑吃黑，誰也不相信誰，兩敗俱傷，大家團圓得精疲力盡。最後人們回頭發現還是那些講規則的老實人值得信任。在一百個人的遊戲中，若有九十九個白，只有一個人黑，那麼那個黑的會佔便宜；可是若一百人中有九十九個黑，只有一個人白的話，那麼那個白的最終會贏。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古語曰：服人者，以德服為上，才服為中，力服為下。有信譽者為德服。不擇手段的短期行為儘管有可能得到眼前的效果，可是這種行為方式却有可能毀掉民主制度的基礎，同時也會毀掉執行者個人的信譽。在一個組織內，如果一個人可以因意見分歧就「凍結」公款，那麼其後果將是沒有任何一個組織願意他加入，選民也不會選舉他去執政，儘管他可以在短期內借此力使自己的意見佔上風。遵守規前的人似乎有點書生氣，但從長遠的角度看，這是符合民主運動的根本利益的。儘管有時候他們並不得勢，但當所有的人被不講規則搞得心灰意冷之後，書呆子會得到人們信任的。

一個舊世界的倒塌以人們的信心崩潰為前提，而一個新世界的建立同樣要以人們信心的恢復為前提。為了民主的事業，任何短期行為都是不可取的。民主運動也需要批判功利主義的文化，樹立講規則為榮，不講規則為恥的價值觀，和「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的心態。

民主制信則靈，不信則不靈，要想讓別人信，自己首先要信。\*

# 發動農民 支持民運

田焜

農民佔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如果沒有廣大農民的參與，任何民主運動最終都難以成功。然而，在當前對民主運動的探討中，農民運動很少被民運人士重視，即使有人提到，也是把農民作為一股極為保守的力量甚至作為中共的支持者。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農民是受中共壓迫最深的階級，是民主運動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之一。

## 農民在中共統治下的地位

在國民黨時代與中共統治初期，中國雖然不是民主社會，人民還享有遷居與選擇職業的自由。自一九五四年以來，中共為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對農副產品實行統購統銷，逐步強化戶口制度，剝奪人民的遷居自由與選擇職業自由，工農差別與城鄉差別不斷擴大。中共比其他獨裁者更懂得將人民分類，區別對待，以便於統治。佔人口比例最高，受教育程度較低，分散而不容易組織起來的農民被理所當然地

放到了「賤民」的位置，受盡剝削與凌辱。受教育程度較高，集中而較有組織的城市居民因滿足於高於農民的生活而不易於反抗。中共主要是依靠農民的支持在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的，它的許多高級領導人出身農民，但這並不妨礙它一旦掌權就變成封建貴族而把廣大農民打入十八層地獄。在中共的戶口制度下，不同地區、不同城市與不同行業的人們處境都不一樣，但以城鄉差別與工農差別為最大；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都受到了中共的壓迫，但農民受到的壓迫與剝削更深。

(1) 農民在經濟上受到中共的殘酷剝削。國家物價局提高工業品價格，壓低農產品價格，使中國工業品的平均牌價高於國際市場價格，而農產品平均牌價則不到美國農產品平均價格的三分之一，不到西歐與日本的五分之一。當農民沒有生產足夠的產品時，他們就必須從自由市場高價買進，然後以低價「賣」給政府，以完成政府規定的交售指標，否則會受到嚴厲懲罰。據一九八九年七月「農民日報」報導，八八年七月十一日河南省民權縣程莊鄉農民

左邊那位中共幹部當眾將一名農民打翻在地



蔡發旺因天旱無法「賣」給政府足夠的糧食，竟被幹警拘捕毒打致死。

一九五九年到六一年餓死的三千萬人中主要是生產糧食的農民，真正是「餓死種田人」，由此可見中共剝奪之殘酷。雖然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為免於經濟崩潰而放鬆控制，農民生活已有改善，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地區進步尤為顯著，有的地方還出現了「萬元戶」，但一般說來農民還是很窮，許多地方的農民仍舊食不裹腹，衣不蔽體。根據國家統計局所編「一九八八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一九八八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一千一百一十九元，而農民只有五百四十五元，不到城鎮居民的一半。

除了收入上的差別之外，農民還被剝奪了享有各種社會福利的權利。根據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食物、住房、醫療、交通等方面，一九八八年每個北京居民享受政府補貼五百三十元，每個天津居民享受五百元。中小城市的居民享受政府只會有所得而不會有所失，所以他所積極支持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在城市遠比農村困難，原因之一是非每個人都情願放棄「鐵飯碗」。一九八七年日本國營鐵路公司新日鐵因巨額虧損改為私營，新日鐵雇員就會罷工反對。

有些知識份子去農村調查，往往得出農民支持中共的錯誤結論，原因在於這些知識份子大多來自官方機構，或者因為在農民眼裡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多自然支持中共，加之這些知識份子因為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敢公開批評中共，農民當然只敢說中共的好話。實際上，四十年來農民從來沒有真正支持過中共的共產運動。從筆者多年在農村的經歷所知，多數農民從未相信過中共報紙與電台的欺騙宣傳，也不信仰共產主義烏托邦，因此中共一直把農民看成「落後」力量，經常需要在農村「狠抓階級鬥爭」，批判「小農意識」，「鏟除資本主義發勢力」。中共發動的文革給農村帶來的災難遠小於城市，原因之一農民不相信共產主義

烏托邦的宣傳。在今天反對中共暴政的民主運動中，農民不僅不是民主運動的反對者，而且是潛在的一支最大的支持力量，關鍵在於我們需要普及民主教育，把廣大農民組織起來。

如何開展農民運動

民主運動需要學運、工運、農運與兵運的密切配合，農民運動是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八九民運中學生運動極其熱烈，但工運、農運與兵運都未開展起來，最後被血腥鎮壓。農民運動是當前亟待開展的工作。筆者認為，民運中的不同力量，例如改良派與革命派，應該相互支持而不應相互排斥，漸進妥協求民主與激進革命求民主各有其長處。在目前情況下，農民運動沒有必要糾纏在是否要「打倒共產黨」的爭論中，而應該從下述幾方面着手，進行啓蒙教育與組織起來。

(1)開展新的啓蒙運動。在農村，啓蒙運動的內容是民主思想與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重點是後者。西方經過十七與十八世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內容的啓蒙運動之後才逐步進入民主社會。自由、平等、博愛，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今天的中國並未生根。許多農民只是夢想自己成為城市居民，而沒有認識到中共製造城鄉隔離的罪惡。目前農民連溫飽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僅僅用空洞的民主大道理是難於發動農民的，民運組織必須有與農民經濟利益直接相關的綱領。在三十與四十年代，中共用「打土豪分田地」贏得了農民的支持。今天，我們可以用「取消戶口制度」或者用「遷居自由」與「選擇職業自由」來號召農民。

啓蒙運動不僅需要在農村開展，在城市同樣是必須的。部份城市居民與知識份子並沒有認識到人人而平等，而是認為自己生來就比農民高一等，甚至以「取消戶口制度中國會亂」為理由反對實行遷居與選擇職業自由。有些民運人士對黑暗的戶口制度無動於衷。由此可見在城市進行啓蒙運動的必要性。目前許多

人不備得或者不敢維護個人的權益。在一個人民不能保護自己權益的社會裡，即使獨裁者被推翻了，民主制度也難於生根。啓蒙運動可以用和平方式在中共統治的框架下逐步展開。當然，中共不會輕易同意讓它的愚民政策失敗，啓蒙運動將是一場艱巨的鬥爭。在與中共官方打交道時，聯合國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公佈的「世界人權宣言」是我們的武器，這個宣言提出了各個國家應該遵守的有關人權的原則，例如人人而平等，保障遷居與選擇職業自由等等。

(2)組織農民拒交苛捐雜稅。中共在農村採取各種手段盤剝農民，搜刮民脂民膏，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農民不堪重負。據筆者所知，目前全國各地已有不少地方發生農民拒交苛捐雜稅的事件，但並非是有組織而是自發的行動。假如只有少數農民拒交，是會受到嚴厲懲罰的。但因為太多的農民拒交，而這些農民也確實一無所有，中共因此無可奈何。民運人士所需要做的是把這種抗租抗稅行動向全國推廣。第一步可以在在貧困地區集體拖欠，使中共難以下手鎮壓。

中共對人民的壓迫與剝削有兩種極限，達到這種極限後就會放鬆一下壓迫。第一種極限是像一九六〇年那樣，反抗的人很少，但有大批人餓死。中共在一九六一年以後不再搞「大躍進」，並降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公有化程度，實行「三級所有為基礎」，把基本經濟核算單位從人民公社降低到生產隊，就是因為在此之前的壓迫超過了第一種極限；第二種極限是人民群起反抗。今天的中國人不再像過去那樣愚昧，一九六〇年那樣的極限再也不可能達到，因此中共的壓迫會到第二種極限為止。這裡試舉一例。中共不僅強迫農民以超低價把糧食「賣」給政府，一九八八年還連現款也不付，對「買」到的糧食開「白條子」。八九民運之後，即使在銀根緊縮的情況下，中共也不敢在收糧時開「白條子」，原因就是害怕達到第二種極限導致農民反抗。民主運動的初

期目標應是組織人民反抗，以提高第二種極限，減輕中共的壓迫，長遠目標是推翻專制獨裁政權。

(3)使農民的零星反抗向有組織發展。目前全國各地農民的小規模反抗經常發生，但因為中共封鎖消息，外界知道的不多。民運組織可以使這種自發反抗向組織化發展，使之星火燎原。中國八億多農民，可耕地比只有七百萬農民的美國還少。因為人多地少，農村失業率極高，只是官方沒有統計。一九八九年春節前後，數十萬農民去廣東尋找工作機會，官方稱之為「盲流」。在廣東希望落空後，「盲流」又轉向東北。這些人只是中國農村失業大軍中的一小部份。如果能組織起來，他們將是推翻極權專制政權的一支巨大力量。

縮小城鄉差別的可行途徑

城鄉差別的縮小不能通過降低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來實現，因為城鎮居民也不富裕。可行的途徑只能是取消戶口制度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大力發展私營經濟。繁榮的私營工商業需要吸收大量勞動力，使農村人口大幅度減少。較少的農業人口使農業機械化為可能，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與農民的生活水平，使城鄉共同富裕。

許多國家與地區的人口密度比中國大陸高（一九八九年每平方公里人口：中國大陸一百一十六人；日本三百二十六人；南韓四百四十二人；台灣五百六十二人）。中國大陸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集中在面積僅佔全國三分之一而東南各省，即使僅考慮這一地區，我們的人口密度仍然低於台灣、南韓與日本。因為蓬勃發展的私營工商業吸收了大量人口，減輕了人口壓力，台灣、南韓與日本妥善地解決了農村問題。然而這一切都只有在私營經濟佔主導地位的混合經濟體系中才有可能，頑固地「堅守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共是永遠無法解決農民問題的。

# 哲學十年風雲

英國劍橋大學

李光程

哲學界為自由化所作的努力 · 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討論的背後 「清污」大案——桂林會議事件」

「北大群」「人大群」「復旦群」「武大群」各領風騷 且看御用學人如何動作

一九八八年夏，我在華東師範大學作過一個同樣題目的演講。也許我過多地從純學術的，也即從哲學本身的觀點看問題的緣故。我說過十年中國根本就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哲學家，也未出現過可以流傳千古或者哪怕百年的作品。我那時對哲學始終無法擺脫政治的陰影頗感絕望，每週機會，便發表「哲學就是哲學」之類的言論，企圖讓哲學獨立。最後我却絕望地發現，連我自己已宣稱哲學就是哲學，哲學應擺脫政治的時候，我同樣有着強烈的政治意圖，哲學首先得獨立，然後才有可能做它想做的事情。

從中國的這一既定事實出發，對這十年來的哲學的評價就不能局限於純學術本身了。一旦接受這樣的評價標準，這十年的哲學又顯得光彩起來，這不光是和過去三十年（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相比的結論，而且由一九八九年震撼世界的中國民運得到印證。無論是官方還是學術界都承認，這場學運是多年來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結果，是多年來所謂知識界精英們煽動的結果。哲學，作為這十年知識界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的確一直在作為自由化的努力，這一點我們勿需掩飾。

三十年鬭爭哲學——一堆恥辱的紀錄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中國的哲學界都幹了一些什麼？在我看來只是一堆恥辱的紀錄。雖然不乏有個別人埋頭做了一點學問，但從總體上講，哲學只充當着政治的奴僕，為歷次政治運動作宣傳論證，作大批判工具。

解放初期，配合社會主義改造，老教授們個個作自我批判，批判哲學中的唯心主義。五四年開始批判胡適，進而批判實用主義，五五年一月文藝界批判胡風，哲學界也聞風而動，批判胡風的唯心主義，隨後批判梁漱溟。五八年配合大躍進，哲學界的某些權威們也發表文章證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這句話辨證又唯物。六四年八月，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十一月，又批判楊的綜合經濟基礎論。至於文革中，這種鬭爭哲學更是發展到頂峰，以後又弄了一場批孔運動，整個中國哲學史成了儒法鬭爭史。

指望哲學界有人能在這樣的氣候中成為哲學大家是不現實的。中國當時最著名的哲學家艾思奇、李達等人充其量也只是斯大林教科書的改寫者和毛澤東兩論的解說者。在他們的構造下，我國的正統哲學體系只是斯大林教科書和毛的兩論再加上階級鬭爭理論。縱觀幾十年來哲學界爭論的問題，無非是哲學有幾個對子，思維和存在有無同一性，一分為二還是合二

而一，內因作用大還是外因作用大，真理有無階級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是怎樣的，如此等等，無聊又淺薄。所有的爭論都是在互引馬恩原著，然後宣稱自己符合馬恩原義。哲學的創造性品格在三十年間幾乎全被遺忘。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一個重要的，又誤用了命題

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的思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真理標準的討論，與其說是哲學討論，不如說是借哲學搞政治的運動。儘管當時哲學界上下一起寫文章，可實在講來所有觀點只是老生常談，沒有任何新的理論探討意味，只是在檢查各自的政治態度而已。只要贊同了這個命題，過去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某些東西，比如毛澤東的某些指示也可以用實踐已證明不合時宜等等，不必照辦。這對於當時被無數禁區包圍的中共某一派領導人和寸步難行的理論界來說，無疑相當於鬆了緊箍咒，一時間學術界充分享受思想解放之樂。

這場討論過後的某一天，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這個如此重要的，有關中國前

途命運的命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居然是一個有着語義混淆的，或者說語言的誤用的命題，我這裡不妨證明一下。

首先，如果我們可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同樣我們可以說實踐是檢驗謬誤的標準，因為檢驗任何理論或命題，永遠會有真或假兩種結果。這樣我們得接受「實踐是檢驗謬誤的唯一標準」這一提法。這聽起來有點怪，但邏輯上無懈可擊。

其次，如果我們把它改成「實踐是檢驗真與假的唯一標準」，這「標準」一詞仍有問題。因為標準通常是指尺度或定義，說「檢驗真理的標準」是說檢驗真理的尺度，說「真理的標準」是說真理的可接受的定義。實踐也顯然

不是一個定義，因為真的定義是和事實相符或其他什麼說法；實踐顯然不是一個尺度，而是一個步驟或過程。即是說，要檢驗一個命題的正確與否，必須有一個實際的檢驗步驟或實踐過程。以沸水為例，沸水的標準是一百度，怎樣知道水到一百度即沸騰？這就要靠加熱（實踐）這個過程。加熱只是個實踐過程，並非標準或尺度，不是說一加熱就必有沸騰，因為加熱可以使水開，也可以使水不開。實踐不應當是尺度本身，而是一個步驟，所以嚴格講，這命題應該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和謬誤的唯一標準」。

這種改動並未使實踐的重要性減低，也並非反對原來這命題所想像表達的意思，而是使

人們想說的和他們寫下的保持一致。

言歸正傳，這個誤用了的命題所帶來的震蕩是前所未有的。理論界首先打破的禁忌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討論。七八年夏，當時還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的盧新華發表了「傷痕」，引起了一場對文革的痛苦的反思。因為直到七八年十一月，正統的說法還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是對的，一切錯誤都是四人幫的破壞造成的。四人幫是萬惡之源。對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大浩劫，人們只敢私下議論。

# 思想家

## 跨世紀探險

IDEOLOGIST IDEOLOGIST

- 新羅非斯特的幽靈
- 海瑞與柯克
- 自由、民主與經濟制度的關係
- 學術作為一種職業

思想家編輯委員會編



「思想家」是上海復旦群創辦的刊物

陳奎德為主編

在學生宿舍裡，我們關心的問題是：文革為什麼會發動起來？四人幫到底是誰？文革的禍根。官方顯然不能自圓其說，實際上，文革的發動有群眾基礎。一是學生們狂熱崇拜領袖的心理；二是群眾對十七年（一九四七到一九六六）的官僚主義和極左路線的痛恨。毛澤東利用群眾運動，把積累起來的問題都推到了劉鄧等人身上，運動的火一點即燃。因此，對文革的反省，會觸及到中國解放以來的整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方面的問題，如果繼續討論下去，對中國的前途是大有裨益的。

遺憾的是，老幹部平反之後，便從個人受文革迫害這一恩怨出發，徹底否定文革，恢復十七年的路線。

無論如何，對文革禁區的突破，還是帶來了一系列突破，七八、七九年整個地忙著平反冤假錯案，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肯定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時間思想解放成了時髦用語。

西單民主牆那時達到頂點，各種自辦刊物，如「探索」、「北京之春」、「民主之聲」等等紛紛出籠。民辦的文學刊物「今天」也在那時出現。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中國解放以來最富有生氣，也最有希望的一個時期。

復旦大學的「大學生」雜誌，全國第一份大學生自辦刊物，也在這一時期問世。這是一份只有兩期的短命刊物，主編是哲學系的景曉東，一位四五詩人。現在的民聯聯委主席徐邦泰也是當時的編委之一。正在籌辦的過程中，



鄧小平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又關閉了民主牆，逮捕了魏京生。一時形勢驟變，景曉東和我一商量，讓我借題發揮，寫一篇文章，強調在社會主義時期，國家的主要職能應是實行民主而非專政。徐邦泰也撰文談新聞自由和新聞改革，還首開在大陸進行民意測驗之風。另有許多尖銳的短文，抨擊時弊。於是，在出了第二期後，雜誌終於停刊。

十年之後再回想解放的那些日子，總是感慨萬千。那是一個探險的年代，每天都有新的禁區在打破。倘若沒有四項基本原則，中國或許早已變成另一個樣子了。鄧小平的這四句話，便決定了中國這十年來思想界，在籠子裡掙扎的命運。

### 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向傳統馬克思主義挑戰

十年哲學界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件是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思想解放之後，必然會遇到如何突破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是一個最佳突破口。這是東歐和蘇聯在五十年代已經走過的道路。

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所以會在這些國家引起連鎖反應，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差不多都受到過列寧斯大林崇尚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大搞階級鬥爭之苦，尤其是，蘇聯的三十年代大清洗，中國六七十年代文革，對人的摧殘超過戰爭帶來的災難。因此擺在這些國家理論家面前的一個問題永遠是，如果馬克思主義一時丟不掉，能不能有一個更溫和更人道一點的馬克思主義？

一九三二年發現的馬克思一八四四年哲學經濟學手稿，被西方學者看成是新發現的一個人道主義的馬克思。於是圍繞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論戰在五十年代便開始了。

中國由於在那時正在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加上十年文革的影響，對這些問題幾乎全無所知。這樣做的後果便是，蘇聯理論界和官方

在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上到六十年代後期已達到相當明智的結論，這些非但沒有被中國理論界和官方接受，反而成了斥責其為修正主義的證據，這便不難想像為什麼中國理論界，尤其是官方對這個問題始終沒有達到一個明智的程度。

畢竟，經過思想解放的理論界還是接過了這場討論。嚴格說來，中國的這場討論在理論上毫無建樹，差不多一切觀點都能從前人那裡得到。有些學者以討論這一問題聞名，如張奎良等，但查其文章，幾乎是蘇聯保守哲學家們的翻版，有些幾乎一字不漏地照抄。

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一樣，這個問題的現實政治意義超過理論意義，所以儘管沒有翻出什麼理論的新花樣，還是一次非常值得做的事。我當時憤憤不平的只是，如果不需要提出獨到的見解，只需要在現成的答案中去作點選擇，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連選擇一個稍稍合理一些答案的起碼的敏感都沒有？

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中最關鍵的問題有三個：一是異化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傳統的或保守的馬克思主義者大都認為異化理論是不成熟的，成熟的馬克思拋棄了異化理論。換言之，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馬克思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以北大黃楠森為代表。反對的意見以王若水、高爾泰為代表。他們認為異化理論在馬克思那裡前後一致地堅持着，儘管異化一詞用得少了，這亦說明馬克思將異化理論現實化了，找到了消除異化的途徑。

第二個問題是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黃楠森為代表的觀點認為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能改造成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王若水八三年在文匯報上發表「為人道主義辯護」一文，認為人道主義不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馬克思沒有拋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需要人道主義。還有個別人更為極端一些，他們不贊成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人道主義，但並不反對人道主義。他們認為如果要堅持人道主義，

為什麼一定要把馬克思主義拖出來作大旗？難道馬克思主義不是人道主義，我們就該反對人道主義？

第三個問題是社會主義有無異化。幾乎所有保守的學者都否認社會主義有異化現象。相反的意思認為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社會主義都有異化現象存在。從理論上講馬克思認為異化是階級社會的一個現象：人成為非人，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才有從非人到人的復舊，高爾泰在八〇年初的「未定稿」上發表了「異化現象近觀」一文。這篇文章是中國學術界最早，也最直接用異化理論來批判中國的僵死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現實的作品。它並沒有學究氣地討論什麼是異化，而是聯繫文革說明中國的現實實際上是一個異化的社會。如權力的異化、領袖的異化、國家的異化、勞動的異化、人民的異化，等等。高爾泰的這篇文章，我相信是一個經歷了最痛苦的人生之後對中國社會的反省。作為藝術家、美學家的高爾泰是十年中少有的正直的，有良心和勇氣

的學者。

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討論，最終導致了一場反精神污染運動。雖然這次運動只搞了很短一段時間便收了場，但對思想界的傷害極大。一切近年來的理論探索都成了精神污染。以紅旗雜誌為首，一篇篇文章對學術界進行了大圍剿。如文學界徐敬亞寫了一篇「崛起的詩群」，遭到批判。哲學上，西方現代哲學的教學與研究也是精神污染。連現代派文藝也成了精神污染。

為什麼鄧小平要挑起這場反精神污染運動？因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討論遠比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更為深刻。人的問題可以說是打開三十年中國問題的鑰匙。從人的問題，可以反省中國三十年的歷史，檢查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癥結所在。一旦在馬克思學說中什麼不立人的地位，那麼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什麼不能理直氣壯地提出人的尊嚴、自由、人權等等？為什麼不能義正辭嚴地批評既成的社會主義

制度的錯誤呢？顯然，這是一次真正的較量，雙方都知道藏在後面的是什麼？

在反精神污染過程中，哲學界還有一件「桂林事件」的大案，這件事發生在八三年六月，哲學界在桂林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現代自然科學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討論會。會上復旦大學的幾位研究生作了題為「關於現代認識論的提綱」的聯合發言，一共十條。對哲學的沉悶現狀提出了尖銳批評，明確反對機械的直觀的反映論，主張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認識論。提綱還提出了多元真理論，反對抽象唯物主義諸問題。

提綱的華麗措詞和在理論力量，觸怒了當時在座的中國人大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權威蕭前教授，還有中央黨校的崔之錢他們回到北京便向中宣部匯報，說復旦的研究生們太狂，居然提出真理多元論向馬克思主義挑戰。待反精神污染運動一開始，「桂林事件」便成了上海市兩大要案之一。（另一件是上海「社會科學」發表了批評「資本論」的文章）。

哲學新一代的崛起

八四年底胡啓立代表中央書記處到作協第四次會議上致辭，強調作家在選擇題材、主題和方法上有充分自由。學術界抓住時機爭自由。談自由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來。參加了桂林會議的周義澄、吳曉明、俞吾金在「解放日報」、「人民日報」上連續發表「論學術自由」、「真理存在於各派學說之中」、「學術爭論要遵循對等原則」。蘇紹智也發表了「學術自由與學術繁榮」一文，那時人們都以學術界的春天又到來了。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內，一個明顯的現象出現了。那就是恢復高考後入學的大學生研究生們，經過幾年的操練，這時已經在各自的領域內露了頭角，成了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引人注目的一支力量。他們所到之處，總要引起一陣騷動和震蕩，在以後的幾年裡，也是由他

吳牟人  
倪培華  
鮑明輝  
倪培民  
王晴佳  
編  
一九八九年八月  
紐約



八九中國民運紀實

DAILY REPORTS ON 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APRIL 15 — JUNE 24, 1989

們在學術裡挑起了個又一個話題，掀起了個又一個「熱」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對八六學潮、八九學運的「小氣候」的形成方面，學術界新一代知識份子起着關鍵的作用。這次政府所通緝的知識界人士中，這些人佔了絕大多數。

在哲學界新一代中，北大群、復旦群、人大群、武大群等都曾各領風騷。以我熟悉的復旦群來說，在上海學術界時有驚人的動作。八四年底到八五年初，復旦哲學系的研究員們以「人·科學·歷史和現實」為題，在校內搞了一次後來在全國極有影響的哲學系列講座。十五位研究生一人一講，在整整兩個月裡，把復旦人的話題幾乎都引向了哲學。哲學講座在那段時間裡成了復旦人的主要節目，以致演講結

束後，有位大學生說他的夜晚便沒有什麼盼頭了。隨着文匯報、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的報導，我們又到上海各高校和外省市走了一遭，盛況一如從前。如今我的這些師兄和同學差不多都在海外求學，如吳牟人、陳軍、陳奎德、丁學良、倪培民、周義澄、黃勇等人美國；俞吾金、張汝倫在德國；歐陽光偉等在加拿大；吳震在日本。原以為在天涯海角，不料海外民運一起，我們中許多人又不謀而合走到了一起。自由化的思潮在八五、八六年達到一個高潮。在武漢出版的「青年論壇」雜誌，以發表探索性的理論文章著稱。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八六年發表在該刊，反響極大。這份青年論壇最終也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停刊。由青年論壇出來的作者，許多都成為民運中堅份子。



「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金觀濤

以甘陽為主編，以北大社科院為主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也是近十年來哲學界的一個令人矚目的成就。這支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的群體在介紹西方哲學方面為中國哲學界帶來了新的氣氛。和金觀濤在早些時候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一道，這些叢書為中國學術界的自由化氣派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他較有影響的叢書還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個面向叢書」、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紀學術名著。遼寧出版社的三個面向叢書、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博士叢書，等等。這些叢書的主力大都是近年來畢業的碩士博士研究生。

十年來哲學界值得慶幸的是出了許多具有理論水平，又有反叛精神的自由化知識份子。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理論上的根基還未達到老一輩大學者的水平，但比起五六十年代出來的知識份子，他們有較多的長處。五六十年代出來的，被作為中堅力量的知識份子通常古不如上一輩，洋不如下一輩，加上幾十年的政治運動的折磨和沉重的家庭負擔，許多已稜角磨盡，不求創新，但求無過。在大學裡就就業業，規規矩矩教書過日子。相反，這十年出來的青年知識份子，大多銳意進取，野心勃勃，故在這動蕩的年代裡能施展身手。如今他們中許多已和政府離心離德，投身民運。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新一代知識份子本質上是離心的知識份子，這一點政府看出來了也無可奈何。他們說，我們不能花錢培養大學生來反對我們自己。但政府能停止招生嗎？

文化熱

八五年興起的文化討論熱目前人們還記憶猶新。這既是歷史上已中斷了的文化討論的繼續，又是對八十年代現代化挑戰的應戰。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又是，這次參加討論的主力仍然是在各自專業領域裡已有所建樹的青年知識份子。參加文化討論，一方面是為其社會責任感所驅，另一方面也是這些人試圖從專業圈子打入整個學術界的一個機會。而且文化討論為新生代知識份子提供了一次讀點古書的機會，這是十年來的知識份子原本薄弱的一環。

文化討論中一直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文化本位論和五四以來全盤西化論的傳統。五四以來，大凡熱血青年總傾向於西化論。在八十年代的中國，由於官方對西化可能帶來的政治變化極為敏感，致使官方與論大力抨擊西化論。

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一個新戰略是，澆開中西之爭，從古今入手，即不再把現代化與西化混為一談，而致力於如何把中國傳統文化引

向現代化。這樣，問題就成了，究竟怎樣看待「傳統」文化？

一種新的方法是運用近年來在國外盛行的解釋學的方法來詮釋傳統。張汝倫在「文化三題議」一文中提出，不能簡單地繼承傳統。對傳統一味繼承意味著傳統死去，因此要批判重建，重釋傳統。

甘陽在「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得更詳細。傳統不是已經存在的東西，而是永遠向未來敞開着無窮的可能世界，傳統永遠在製作之中，因而繼承傳統等於創造，而不是在已存在的東西中挑挑揀揀。繼承傳統的最佳手段就是反傳統，或消解傳統。

從這點出發，甘陽對海外學者所熱衷的期待儒學文化的復興這一願望提出了批評，陳奎德則說這是新儒學相思病，這些人生活在海外，想到中國尋根，樂於看到中國像個古董市場，這是不知中國人自己的苦痛。只有中國人才知道中國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新文化。

我無意對十年來的每一重大哲學事件做出評價，我也不想再對八七年反自由化以來的哲學界作過多回顧。我的一個印象是：反自由化運動完全沒有官方想像的那麼有效，這種放放收收的把戲玩多了人們也就知道如何對付了。比方說不少單位都在查有無自由化文章，可很快就有了結論：沒有自由化。

其實，我心裡明白，這十年來哲學界的理論探索都是在朝着自由化前進，或許可以說，近十年哲學是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不斷交鋒的十年。自由是人類所嚮往的最高價值之一，為什麼不能化之。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離開上海赴劍橋。但我一直關注着國內哲學界，我也注意到六四之後哲學界黃楠森、鄭杭生、羅國杰、李鵬程等人緊跟官方的實力表演，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都知道，在這個時候，對不能說明的，就保持沉默。

\*

# 再評新權威主義

華一夫

新權威主義並非全是政治謀略 政治浪漫主義的兩大類型  
開明的權威統治的謬誤 分權制衡在中國必然導致失範？

北京學運爆發前，中國知識界正進行着一場著名的論戰，圍繞的中心是：新權威主義。不久，八九民運驟然而起，每日如電視連續劇般令人眼花繚亂，並以「六四」的血腥休止符嘎然而止。於是，關於新權威主義的論爭被人遺忘，變成了歷史的絕響。如今，倘若有人提及這樁公案，可能被人們不屑地回應說，八九民運業已判決了新權威主義的死刑，蓋棺論定，毋須贅述了。

但是，事情恐怕不那麼簡單。誠然，如果把新權威主義純粹視爲一個實用色彩很強的政治謀略（如爲趙紫陽真正掌權提供輿論準備或爲鄧小平的政治實踐鋪墊理論地基），它或許是失敗了或變得無意義了。同時，它的乖謬詭秘的命運（中共對之時捧時批，即在六四後也如此），也使人望而怯步，避之不及，很難把它認真對待。但是，這僅是它的一方面，對此，本文暫不擬考察。

然而，它畢竟有其理論層面。並且，據筆者所知，的確也有個別新權威主義者有其理論興趣，並非政治謀略。鑒於此，作爲學術問題，我們理應還它以公正、客觀論衡。

此外，據筆者觀察，從這場論戰中也可從側面透視出中國知識界近年來的心路歷程。從總結民運的角度，回溯這場論戰，也大



略可以理解知識界在整個民運期間猶豫遲鈍的行爲方式的原因的基本脈絡。

更重要的是，上述論戰所涉及的中國的基本問題，六四之後並未解決，且變本加厲。況且，即使風雲突變，六四的罪魁禍首，仍不意味著這些基本問題的迅速消散。我們很可能還需重新面臨新權威主義爭論的那些根本問題。因此，重評這樁公案，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

所謂新權威主義，這裡是指少數知識份子提出的解決當時中國社會危機的理論方案，曾得到官方的默許。它主要流行於京、滬兩地理論界，贊成者不多，但仍有一定代表性。北京有吳稼祥、張炳九、戴晴等；上海有蕭功秦、王滬寧（本人不承認）等。各人所述不同，背景有別。學運爆發後，其代表人物迅速分化，命運各異：或仕途順暢，或身繫囹圄，或消聲匿跡，或亡命天涯。

筆者當時正動手寫一篇批評文章，主要針對蕭的觀點（因其提得較早且理論色彩稍重），未及一半，民運突發，就此擱筆。現再審讀，覺得大部份仍未過時，故略作補充修改，以就教於現仍潛在或顯在的新權威主義者們。

在對中國現代危機的分析上，新權威主義認為，近代以來，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在舊的傳統權威尚未崩潰之前，鑒於人口、糧食、外患等基本問題的巨大壓力，鑒於經濟、政治、精神文化所面臨的峻峻態勢，中國的危機局面早就已經出現了。對此，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先知先覺和仁人志士，採取自上而下的全盤改革的行政手段或自下而上的激烈革命手段，試圖把現代工業化社會中只有中產階級作為載體存在才產生作用的市場商品經濟制度及其配套的政治制度全面引入中國。這種思潮，曾在五四之後佔居優勢，後來一度中斷。他們認為，該思潮目前又重新抬頭。但是，由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葉經

歷的那次斷裂，因此，社會上已經不存在在獨立的中產階級了，因而，就根本沒有了與商品市場制度配套的載體，於是，該制度無法在真正的意義上建立、成活並發揮整合經濟秩序的功能。如此，社會成員和企業的經濟行為既不受舊制度和規範的約束，也不受市場制度和規範的約束。這種「舊者已亡，新者未立」的現象造成了人們社會行為、信仰和價值的無序化狀態，即社會學上所謂的「失範」狀態。在新權威主義者看來，當前，由制度的改革導致的「失範」已露端倪，其觸目驚心之處顯現於通貨膨脹、經濟滑坡、賄賂成風、官倒盛行、貪污腐敗，世風日下。新權威主義分析道，上述危機的出現，進一步被人們普遍誤解為是由於沒有進行與經濟改革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因而就沒有防止權力腐化的分權制衡制度所致。於是，政治改革的浪潮在民衆特別是在知識界中日益高漲。上述政治思潮被新權威主義者稱之為「政治浪漫主義」。新權威主義斷言，由於不具備必要的社會條件，特別是由於中產階級的缺失，推行民主制度必定造成舊權威的迅速流失，而新權威的資源缺乏補充或補充太慢，於是，政府對社會的統治能力被極大削弱，失去了對腐敗官員的控制，進而必定造成政治無序以及失範，從而爆發經濟、政治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全面危機。以上就是新權威主義對中國當代危機原因的基本分析。

他們的藥方是，為防止政府權威的流失，現在必須加強政府權力，通過這種被強化的權威來推進後進的、需幾代人才才能完成的改良過程，並力倡目前中國這兩代人為民族未來的繁榮昌盛和開明，作出現世的犧牲。

首先應說明，對上述新權威主義的論述，有兩點筆者大體上不持異議，其餘則不敢苟同。這兩點之一是認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現代化的自然發展歷程，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期，出現了一個歷史性的斷層，它使得當今中國社會的商品生產及交換結構的發展程度，即社會結構的現代性程度還不及二十世紀二

十年代後期。（見蕭功秦「論當代中國的浪漫主義改革觀」、「上海理論」一九八八年四期）。實質上，該斷層即指共產主義入主中國大陸，剝奪私有財產，全面實行國有化，消滅中產階級，從而阻斷了市場發育。這一點是筆者完全贊成的對事實的描述。上述第二點是主張當前中國必須提倡漸進式的改革戰略，反對政治浪漫主義，反對烏托邦主義。對此，筆者在原則上並無異議，不過，對於政治浪漫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涵義，筆者與新權威主義者理解略有不同。簡言之，筆者的理解或許可用兩樁歷史事件大略比喻，我們更傾向於英國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式的不流血變革方式，希望竭力避免法國一七八九年式的流血專政式的變革方式。事實上，暴民政治是有傳染性的，暴力奪得的政權將用暴力維持，這是歷史的邏輯。但是，除上述手段外，在根本目標方面，與新權威主義不同，筆者鄭重主張，那些人類的基本價值（如人權、自由、民主、多元化……）是不可讓渡的，是不可由純粹經濟目標取代的。

此外，筆者主張，應當更進一步釐清政治浪漫主義的兩大類型。第一類的行為主體是執政者，如一九五六年之後的毛澤東式政治浪漫主義，在伊朗掌權後的霍梅尼的政治浪漫主義等。這類型浪漫主義的主體一般是集權的克里斯瑪（CHARISMA）型的領袖；另一類，其主體是民衆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如一九六八年法國與美國的學生風暴、南朝鮮的學生運動、中國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等。顯然，這兩類政治浪漫主義是很不相同的。筆者所主要反對的政治浪漫主義，是指前一類型，因為它所造成的惡果更加長久和恐怖。誠然，不可否認，這兩類浪漫主義有時會結合在一起，但該結合常常是前一類型佔居主導地位，文革初期就是其典型例子，它可能使任何秩序蕩然無存。但大多數情況下，這兩種類型是分離的，甚至是對立的，如文革後期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中國與東歐的民主運動，就是

這類多數情況的例子。

同時還應指出，本文所指的「烏托邦主義」，系這樣一種社會理想，類似「基督再臨」。它堅信社會必能達到盡善盡美，毫無弊病的狀況，它認定這種完美的終極天國是可以通過找出歷史規律、預言歷史的前景，預先設計好一個周密的社會藍圖來實現的。以往的歷史表明，烏托邦主義是一條導致狂熱迷信之路，是現代專制最常見的形式。它的二十世紀形態就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筆者從根本上拒斥這種烏托邦主義，認為，並不存在這種完美的不可挑剔的社會。任何社會都是不完滿的，我們的永恒任務，就是不斷地對社會進行批判，進行糾錯，進行淨化，從而避免更大的禍害。但是，這種反烏托邦主義並不否認某些終極價值（如人權、自由）的存在。事實上，對現存社會的批判，正是導源於這些終極價值的。並且，在制度建構上具備了這種糾錯機制的社會，筆者以為，正是較符合終極價值的社會，而這種法治社會的狀況是可能達到的，它並非烏托邦主義。新權威主義這裡的問題主要在於，他們把對人權、自由、民主的渴求界定為烏托邦主義之一，這就混淆了自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的界限，導致某種理論失誤。

二

現在，讓我們進入主題，考察新權威主義的核心論點。

首先，是關於中產階級的問題。對該問題的論述，正是新權威主義得出自己的一系列結論的最基本的依據。

應當承認，在成熟的社會集團的意義上，當今中國尚不存在完整的和獨立的中產階級。（這裡的中產階級涵義是，那些在市場法則的鐵律驅使下追求其自身利益的獨立經營者或自由職業者。獨立謀生、自主經營、公平交易、自由競爭是其行為準則。他們是作為社會秩序

和主流倫理道德的主要支撐者而立於於世的）。但是，這是否同時意味着，當今中國根本不存在任何胚胎狀態的中產階級？是否中國不存在在某些方面可以替代實業家中產階級的社會力量？我們必須仔細探究這兩個基本問題。首先我們考察新權威主義者實際上主張的某種「中產階級預成論」。

誠然，當代中國的個體經營者和私人股份企業經營者在文化素質、道德水準、競爭行為規範等諸方面尚不盡如人意。但是，這些基本素養狀況是否凝固不變、永遠如此呢？在市場法則和逐步成長的法治環境的長期驅迫下，他們是否絕對不可能向現代意義的實業家進化呢？這是根本的問題。其實，訴諸西方歷史，人們發現，在歐美的現代化歷程中，也並非一開始就存在現代意義的成熟的實業家中產階級的。與之相反，正如歷史學家亨利·布耶在其經典著作中所指出的：「（公元）九世紀之後，西歐在本質上是一個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交易與商品流通已經降到最低限度。商人階級消失了」。（「中世紀歐洲經濟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當時，根本談不上任何實業家中產階級。即使到文藝復興時期，這種成熟獨立的中產階級仍付闕如。只是在工業革命之後，他們才戰戰兢兢地從歷史的帷幕後面逐步站出來。原始積累時期，作為當今中產階級先驅的「暴發戶」們，與其文質彬彬奉公守法的後輩在素質上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正如當代眾多歷史學家 and 社會學家所指出的，中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好幾個階段。平心而論，當年那些被貴族們鄙夷的粗俗的「暴發戶」們，並不比當代中國的「個體戶」高明到哪裡去。因此，可以斷言，實業家中產階級是在歷史長河中誕生、發育和逐漸成長起來的，根本不存在一個天生的、預成的、成熟的獨立的中產階級貫穿在整個歐美歷史中，並隨時等待着突然降臨的市場經濟制度和配套的民主憲政制度。新權威主義者認為，如果把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看作奕棋規則，那麼，作為市場經濟的

載體的中產階級，就是必不可少的奕棋者。倘若沒有規則奕棋者，棋規是無法自行運作的。這誠然不錯。但是，新權威主義忘記了，這種具有某種資格、素質和才能（即遵守棋規，又會下棋）的奕棋者，正是在對奕的過程中逐步學會並成熟起來的，並非天生預成的。正是市場法則和法治條件，催化成熟了一個獨立的實業家中產階級。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

要言之，成熟的中產階級是歷史運動的結果，而不是歷史運動的先決條件。

當然，更深一步分析表明，即使是「奕棋規則」，也是在歷史上逐步完善的。無論是實業家中產階級，還是市場經濟的秩序，都處於相互促進的互動過程中，沒有一方是絕對的原因，另一方是絕對的結果。因而，沒有理由斷定一方為另一方的先決條件。特別不能片面地斷言只有市場經濟秩序需要歷史過程漸進地形成，而實業家中產階級就是先在地預存於歷史中等待「秩序」降臨而不需要歷史過程的。很顯然，這種論述在邏輯上存在嚴重漏洞。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當代中國是否沒有可部份地替代實業家中產階級的社會力量？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S. P. HUNTINGTON）指出：「中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可能會經歷好幾個階段，一般地說，最初登上社會舞台的中產階級份子，是兼具傳統遺產和現代價值觀念的知識份子。」（「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第二〇八三頁），證諸事實，的確如此。特別是對於非原發性現代化運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就更為典型。這些國家極其重視教育的功能，因而知識階層承擔的現代化推動者和社會秩序和倫理的支撐者的作用就更為顯著。原因很清楚，只有靠知識階級去吸納消化現代化先驅國家的經驗教訓，本國才能少走彎路，從而在世界性的競爭中迎頭趕上。因此，這些後發性現代化國家內的知識階層與原發性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的實業家中產階級，在社會角色的承擔方面是頗有類似之處的。

當然，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和群

## Political Change in



## SOUTH KOREA

中國能走上南朝鮮的政改道路嗎？

的獨立人格。當然，就一身而二任（以知識份子出身而從事獨立企業經營）的社會階層而言，他們之過度到成熟而獨立的中產階級就會愈加迅速。如此，上述幾種社會力量將能夠發育成現代中國社會的先驅利益集團和健康有力的獨立制衡力量，創生和擴展出非政權能支配的「民間社會」，從而，在變動中的中國社會這一大棋盤上，逐步成長出一批有相應資格、素質和水準的「奕棋者」。

這是變革中國的長期社會需求。

### 三

新權威主義的一個基本假定是：現實的統治權威都具有某種爭取國家現代化的善意。這一假定倘若忽略了這種善意必須是在不危及統治者的權力的前提下方可成立的話，將十分危險。鄧小平之處理「六四」事件就是顯例。現在讓我們在添加了上述前提下姑且先行認可新權威主義的假定。即使如此，仍將產生如下重大的困難：如何保證權威的施政效果與其善意相符呢？

因為，倘若實行新權威主義，民衆必定無權批評，更談不上制度化的監督批評的機構和陣地。這是由於，若用高度集權的方式來保證現代化藍圖的「施工」，必定用權威來統一思想、統一步伐、統一行動，因此，壓制批評言論和剝奪反對意見就必然成爲常規工作的一部分，這就使得輿論一律、封鎖新聞、精神貧乏和文化單調成爲制度化的特徵。所以，即使是仁慈開明的統治者，也很難聽到對自己大政方針的不滿和批評。而倘若缺乏這種輿論反饋的檢驗，同時更沒有公民秘密投票反饋的檢驗，統治權威就總是身處「鶯歌燕舞」的環境和狀態中，自我感覺總是極佳了。於是，他們根本不可能發現其政策是否達成了預定的目標。並且，這類統治權威一般都是終身執政，正如中國的毛澤東、伊朗的霍梅尼、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中國的鄧小平一樣

體人格還沒有西方中產階級那樣獨立和強有力，也不像日本及四小龍的知識階層成爲現代化運動的中堅力量。然而，盡管如此，同其他社會集團相比較，無論就其基本利益還是觀念形態而論，他們仍是中國社會裡推進現代化的先鋒力量；無論就其文化素質還是覺醒程度而論，他們也是各社會利益集團中的優異群體。誠如亨廷頓早就指出的：「最早出現的中產階級份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同上書第二百八十四頁）。倘若能逐步開掘這部份動力資源，倘若知識份子能強化自身的角色意識，則當代中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可能由這些經濟實力尚弱的知識階層部份承擔的。

誠然，實際情況並不很妙。由於中國知識份子傳統包袱和現代高壓下的精神環境，特別是在公有制下經濟和政治上未能獨立，導致中

國知識份子在社會地位和觀念形態上的孱弱，實際上未能發揮歷史所期許於他們的作用。這表明「知識份子充當革命角色的能力，取決於他們與其他社會集團的關係。」同上書，第二百八十四頁。在當代，特別取決於他們與有經濟力量的非官方階層的關係，自然，也取決於他們與城市工人的關係。倘若在歷史的召喚下，自然演變萌生出知識階層與私人股份企業和個體企業經營者聯盟的情勢，則其意義將十分深遠，在如此的態勢下，雙方將產生某種「互補」的關係：在文化素質、倫理規範和法律意識等方面，個體股份企業經營者將會從知識階層那裡獲得某種補充；而知識份子則從可供選舉（並非國家壟斷式的）的個體或股份企業經營者那裡獲得自己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擺脫無可選擇式的人身依附關係，逐步確立自己

，既不受輿論的監督制衡，也不受選舉的選擇制衡，不存在任何自動糾錯機制。在這種體制下，開初的戰略決策倘若「差之毫厘」，若干年後，就將「謬以千里」，最後，只有走到「天怒人怨，瀕臨崩潰」的局面時，或許才幡然醒悟，然而，恐怕已無力補天而大廈傾塌了。歷史已為上述推論提供了驚人相似的衆多證據，茲不贅述。

對於開明的權威統治，還存在另一個根本難題，就是權位的傳承問題，即，如何保證同樣開明的繼位人掌權？經驗表明，這類權威主義政權的繼承，作為歷史事件的一種類型，本身是無規律可循的；並且，它往往是一場政治動亂的導因；同時，繼任者的素質又常常低於其前任，導國家入深重的災難中。這是該權威主義體制無法繞過的「政治陷阱」。

上述兩點都涉及一個根本問題：是否應該以及如何創建權威的合法性基礎？這正是新權威主義的要害之一。如所周知，權威不僅有量的差異，也有質的區別，後者即指政治權威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礎的問題，也即是否受到多數選民的委托和認可問題。新權威主義故意迴避這一點，似有難言苦衷。其實，它既是一個基本原則問題，同時也是解決上述兩個難題的現實方案。應當看到，具有合法性基礎的政治權威對於推進現代化，匡正可能發生的重大災難，實現具有政策連續性的權力轉移，都是極其有利的。因此，廢止一黨的權力壟斷，創建政治多元化的局面，奠立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基礎，重新配置各類獨立權威的相對關係，達成其相互間分立制衡的格局，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四、

新權威主義強調權力的集中與統一，斷言分權制衡在目前中國的形勢下必將導致「失範」，這一判定，過於武斷，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亨廷頓曾在比較中日兩國現代化歷程後指出如下事實：「在十九世紀中葉，權威和權力

在中國比在日本遠為集中：一個是官僚帝國（中國）；另一個基本上仍然是封建制國家（日本，這裡「封建」的涵義與國內不同）……；然而，使日本的德川幕府看起來比中國滿清更為落後的一種封建體系，却為擴大政治參與和把傳統部族與較新型的商業集團融合於政治體系中提供了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儒家的價值觀和態度阻礙了政治精英轉向改革事業，而一旦他們願意時，權威的集中化又會妨礙和平地同化因現代化而產生的社會集團。」（同上書第一百六十六頁）。

這就表明，高度集權的政治體系，盡管在很多方面現代性更強，最終却不易實現現代化。相反的，「傳統政治體系的結構越多樣化，權力越分散，則其政治現代化將越不具有暴力性，也越容易適應政治參與的擴大。這些條件使一個現代的和參與的政治體系的出現成為可能，而且更有可能出現民主的而不是專制的政體。」（同上書第一百七十一頁）當然，不應忘記，日本當時的幕府與天皇的二元結構也對日本邁向現代化提供了有互相制衡性質的有利條件。

綜上所述，無論統治者喜歡與否，分權制衡之道是現代化進程中必經的「獨木橋」。新權威主義的根本問題之一，就是因獨佔權力而無法吸納其他社會集團進入政治體系，從而孕育着某種緊張的態勢，蘊含着有流血衝突和動亂的因素，於是必定造成周期性的（不同形式的）集權政治的循環。「擴大政治權力的能力和把集團同化到政治體系之中的能力是呈反比例關係的。」一九八九年中國民運為這一論點提供了最新的論據。中國大陸出現的血腥屠殺和歷史倒退，固然是使權威者的垂直政治權力擴大了，然而全國的政治參與却日益萎縮，政權已無力把社會集團同化進政治體系之中了，最後形成的態勢是：幾個孤家寡人式的權威者同整個社會的對峙。這顯然是最不穩定而不能持久的態勢。

一百多年來我國政治演化的歷史向我們昭

示，中國若不過度到某種形式的分權制，就永遠只能在原地循環兜圈，不得其門而出。因此，分權制衡，這是當代中國政治的焦點。

亞洲四小龍是被新權威主義者所常援引的例子，以論證像中國這樣的後發展國家必須以集權方式才能贏得經濟發展。有人甚至擬定了一個數量臨界值，即所謂國民人均收入在四百美元以下的國家必須實行集權方能推進現代化。這種似是而非的論點值得專文認真考察，本文限於篇幅，不擬深論。這裡只想請讀者考慮如下兩點：(1) 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實情究竟



漢城學生在街頭暴力衝突中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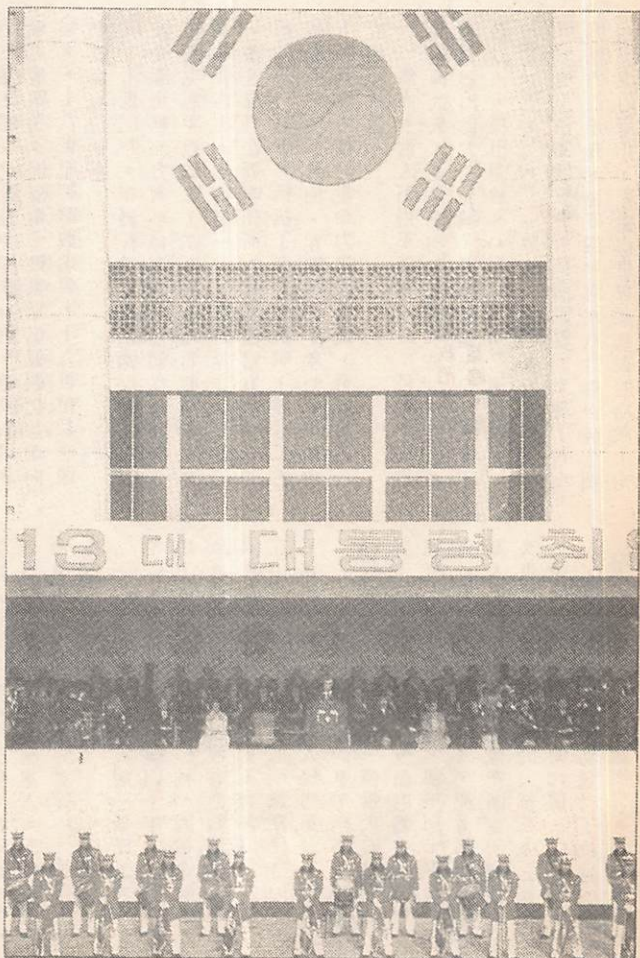


如何？(2)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與四小龍有無根本差異？若有，差異何在？為何不能把中國國情向它們作類推？

首先，對四小龍一概名之曰非民主的集權，已模糊乃至抹煞了其間的重要差別。人們謂香港為非民主社會，原因是它不存在民主選舉而由總督任命官員。但是，切不可忘記，香港政制存在一個大背景：英國的民主政制。同時，香港也存在獨立報刊的輿論監督。作為法治社會，作為自由港的地位，總督的選任、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所有這些，都與英國的民主憲政息息相關，受到憲法的保障。要言之，香港並非一塊獨立的非民主政制區域，而是在民主政制體系中的一塊特殊區域。至於台灣，現在已日益清楚，它的經濟發展是同集權體制的逐步鬆動、社會的逐步開放相伴隨的，雖然這一過程充滿痛苦，但目前畢竟已走上反對黨合法的民主選舉的階段。南韓與台灣亦有類似之處。事實上，這些地區和國家至今尚感受到前一段非民主歷史的包袱對當下政治、經濟發展的牽制作用，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它們若及早推行民主會延緩其經濟發展。新加坡是個異數，仍在抵抗民主潮流，但不應忘記，它的法制是相當健全的。當然，尤為關鍵處是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四小龍與中國大陸的最根本差異並不在上述各點，而在下面要論及的意識形態導致的鴻溝。

中國號稱社會主義國家，是國有制經濟主導，四小龍則是私有經濟主導，這才是二者最根本的差異，前者產權不明，抹煞了基本人權——財產權，抹煞了個人的創造性與主動性；後者產權界定清楚，個人的創造性得到了極大限度的發揮。前者是政治、經濟、文化一元壟斷的政治全能主義，社會中不存在政治權力不能侵入的領域，從而政治權力的變動將波及經濟文化等整個社會；後者則是政治、經濟二元分離的，政治權力的震蕩不會波及經濟領域。

更深一步分析，上述的差異實質上在於：



是否存在「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現在已越來越清楚，有沒有獨立於政權的由私營企業、私立大學、教會、社團……等組成的民間社會，是能否實現現代化並過度到民主的關鍵。中共式的全能主義政治推絕了任何民間社會，從而也就決定性地推絕了現代化之道。而四小龍則是存在這種現代化及民主制的潛在土壤的，一俟時機成熟，它將結出歷史求索之果。新權威主義企圖在中國大陸這種缺乏民間社會的國家內通過加強政府權能而實現現代化，無異是南其轍而北其轍，結局是不問可知的。

作為一樁歷史公案，新權威主義基本上已消聲匿跡。其代表人物已天各一方，雖於重振旗鼓了。它的理論誤區在去年的大事變之後也

愈益彰顯。中國的八九民運、六四血案和東歐革命想來將對新權威主義者們產生強烈的震撼和令其進行反思。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所誕出的基本問題仍是值得我們認真思索的，他們的部份論點，也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展望將來中國可能產生的變局，也許類似的爭論還將再度出現。當然，筆者認為，鑒於東歐等世界格局的巨大轉變，中國要在共產主義的框架中謀求現代化是越來越不可能了。因此，中國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放棄「四個堅持」。只有卸下了這個沉重的歷史包袱，中國人才有可能從容不迫地選擇自己的基本生存方式，並在同包括新權威主義在內各家的爭鳴中，穩健而縝密地規劃我們的未來。

這一天不會太遠了。

米

# 俄羅斯再造新紀元

楊漫克

一九九〇年二月七日，在舉世的緊張注目下，全世界第一個共產黨國家，也是共產主義世界的盟主——蘇聯，宣佈放棄一黨專政，行將建立一個民主、多元政治的社會制度。

在剛剛結束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在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的強力推動下，與會代表幾乎一致投票，斷然放棄了行之七十年的共產制度。大會決議廢除蘇聯憲法第六條：「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與指導力量，是政治制度、國家與社會所有組織的核心」。『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決定蘇聯社會發展的總方向及內政與外交路線』。

一九一七年俄曆十月，由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在俄羅斯大地建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從而開放了本世紀人類兩大制度的競爭與實驗。共產主義以它強有力的方式和魅力，一度風靡世界，在東歐、在東亞、在非洲，一個個效法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政權相繼建立，形成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兩大陣營對峙的格局。

四十年下來，在後工業社會科技與資訊革命的衝擊下，兩大制度的公平競爭和充分實驗的結果忽然彰顯：以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為特徵的資本主義被證明比計劃經濟和集權制度的共產主義，更適合於人類文明的發展，而後者，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所拋棄。

在歷史現實中，每個民族都不可避免地接受挑戰，做出某種回應。五百年前，處在東、

西方文明邊緣的俄羅斯民族，相應之下，還處在蒙昧的未開化階段，不斷受到來自東西兩個文明的挑戰和壓迫。

十七、十八世紀之交，俄羅斯產生了一個偉人——彼得大帝。他一改民族對外來文明的排斥心態，強迫俄羅斯接受西化。他在貴族中推行法語，諸侯們前往克里姆林宮，都要剃掉顯示高貴與勇武的鬍鬚。俄羅斯迅速開化並走向強大，十八世紀初擊敗瑞典，十九世紀初擊敗拿破崙的遠征軍。

本世紀初，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開始了第二波企圖超越西方的革命運動。他們從西方引入了馬克思主義信念，試圖以這種新的精神武器去戰勝西方。然而這一次，俄羅斯走入了歧途。儘管蘇聯在列寧和斯大林兩位富有創造性的領袖的引導下，抵抗了西方的挑戰，擊敗了希特勒的征伐。然而，在戰後四十年的和平競爭下，共產主義的生命力迅速萎蘼。俄羅斯再一次面臨挑戰。

然而，世人不得不驚嘆的是：俄羅斯民族的雄渾大氣，總是能夠在危機中產生一代偉人，創造出偉大的史績。戈爾巴喬夫自八五年上台以來，提出開放（GLASNOST）與改革（PERESTROKA）政策，大刀闊斧，通力革弊。他不僅使俄羅斯最終擺脫政治束縛，再度開始向前奔跑，也使得東歐在八九年中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更使得世界徹底擺脫冷戰，走向新的「後歷史主義」世紀。

故然，我們不能將歷史歸結為一個偉人的創造性與偶然性。俄羅斯第三次成功地應付了挑戰，除了戈爾巴喬夫和其他蘇聯改革者的努力外，尚有許多必要的條件在起作用。在此，值得我們總結、借鑒。

——從斯大林逝世以後，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已經從它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輝煌頂峰，開始走下坡路。人們不應忘記的是，蘇聯第二代共產黨人的代表赫魯曉夫，曾經第一個在共產主義世界進行修正主義的改革，否定斯大林主義。修正主義之風，當時曾強烈地衝擊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共產黨國家。今天，赫氏的歷史功績值得提記。

——儘管在赫魯曉夫之後，在國際冷戰大局下，蘇聯在六十年代，又出現了強硬路線的反彈。六四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團上台後，使赫魯曉夫的修正止步二十年。儘管如此，蘇共權力結構的素質，已發生在本質的變化。勃列日涅夫等第三代共產黨人，已經不是經歷革命戰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工程師出身的技術官僚。

——斯大林時代結束後（斯氏逝於一九五三年），蘇共歷史已延續四十年。此後，和平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蘇共領袖，對革命奪取的政權和此政權的性質，已沒有血的情緣，不同於中共的鄧小平之流，他們不再奉守「打江山者坐江山」的革命邏輯，而俄羅斯民族的生存能力，逐步成為當權者與人民的第一考慮。

——人們一直奇怪的是，已有七十多年歷史的蘇聯，為什麼沒有一個強大的保守派，而讓五十幾歲的「少壯」戈爾巴喬夫輕易成功？這裡有一個歷史的僥倖，即不到十年的時間，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三位老共產黨人相繼而亡。這好像普朗克所發現的：達爾文進化論是在反對它的人都死去之後才確立的。時間是進步最沉重的代價。

俄羅斯再一次成功應付了挑戰。對於曾效法俄國十月革命的中國而言，還能慶幸的是，我們又有了學習的楷模。

# 莫斯科：埋葬列寧

盡管神的信念仍然為人類的絕大部份所接受，但在世界經過六十五年的巨大變遷後，做為神的列寧，開始受到挑戰，那具神體的尊嚴正在衰朽。



揮手之際，這位巨人的陰影將被抹去。

馬心陽

在莫斯科紅場那座如同聖殿般的陵墓中，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創始人，國際共產主義革命領袖——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在此安眠已經六十五年。他的遺體仍然未朽，而且數十年來，受成千上萬的蘇聯人民，以及世界各國前往朝聖的列寧信徒們瞻仰、膜拜。無疑，他沒有死，而是做為一種偉大信仰的神明而活着。

然而，盡管神的存在信念仍然為人類的絕大部份所接受，但在世界經過六十五年的巨大變遷後，做為神的列寧，開始受到挑戰，那具神體的尊嚴正在衰朽。在神的誕生國家蘇聯，神的信徒們正在大膽地背叛列寧。

在克里姆林宮裡，蘇共正在爭辯，要不要像普通人那樣，將列寧的遺體埋葬，黨內強硬路線和自由改革派就此問題，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鬭爭……。

俄羅斯民族是這樣的民族：它可以創造偉大的巨人，也可以自己把他們打碎。在列寧之前，有沙皇尼古拉，被革命的政權逮捕槍決，在列寧之後，有暴君斯大林，甫一過世就被繼承人掘墓。因此，無論向前看還是向後看，列寧都可能在不遠的將來，面臨同樣的命運。



學校教室裡到處掛着列寧像。

除了「真理報」，蘇聯廣播電台也製作了一個有關節目。結果，電台負責人被開除職務。至於扎卡羅夫，據說蘇共領袖戈巴喬夫曾對他說：「你給我們增加了新的問題。」

但如何處理列寧遺體的問題却向遺體一樣沒有被結束。六月份，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個大膽的委員卡魯亞金，再度發表埋葬列寧的言論：「坦克每年開過紅場，震動了列寧的遺體，然後由科學家和藝術家去修理列寧的面部表情——這是夢魘。這麼做其實毫無意義。所以，讓我們像列寧同志本人希望的那樣，把他安葬到他所希望的地方去吧！」

卡魯亞金還說：「如果我們相信列寧的靈魂是不朽的，我相信列寧會說：謝謝你們這麼做。」但是，列寧的姪女烏里亞諾娃迅速對此做出反駁。她在接受一家保守的日報訪問時警告說：「有一群狂妄的人，正在企圖破壞我們民族的聖靈。」她認為現在應該做的是如何

想盡辦法保護列寧的遺體和陵墓，因為那是「共產黨的革命象徵。」

已經有幾代人瞻仰列寧的遺體，那具穿着普通制服、繫領帶、留着一點紅色山羊鬍子的屍體。排着長龍的朝聖者們，在克里姆林宮牆外等候兩三個小時，去看一眼水晶玻璃裡面的蘇聯的締造者。

蘇聯共青團組織機關報在七月間發表文章質問：「為什麼人們從全國各地湧來，他們旅遊的目的地之一，是列寧墓？我們如何面對這樣一個舉國範圍對列寧的懷念熱情？這種缺少思考的崇拜之情給我們什麼樣的傷害？」該報並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外乎是嚴格限制的參觀時間和國家保存着遺體的事實。

作為革命領袖的列寧是否得以保存在現在的地方，還是安置到地下去，短期內不會獲得結論。更何況，以列寧主義者的名義，打算把黨內保守勢力清除出去的戈巴喬夫，目前尚難於合適的理由把列寧抬出他的陵墓。像對以前的歷任黨領袖一樣，聰明的戈巴喬夫亦發現，「以列寧的名義」這個用俗了的政治老套，今天對他和對他的改革，仍不失其使用價值。

但蘇聯領導人保持着一種微妙的平衡，那是所謂用「辯證方法」才可以解釋的現象。一

方面，戈巴喬夫利用列寧主義去為他的政策正名，另一方面他亦要去除一些列寧主義的教條。許多變化，發生在東歐的和發生在蘇聯本土的，那是違背列寧主義原則的。

——列寧平板地拒絕黨內可以存在不同派系的可能性，他的改黨理論是金字塔的，精英和權威的。

——列寧直言否認任何做為共產黨的反對政黨之存在的可能性。而這兩個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原則，現今似乎無法繼續下去了。

戈巴喬夫目前做的事，是尋找把一個失敗的政治經濟制度，扭轉到一個正常軌道上的途徑。他以列寧的名義，破壞着列寧建立的制度。

現在美國羅德島海軍學院任教的前蘇共中央官員諾維可夫認為，列寧遺體之爭反映了蘇共黨內對立的公開趨勢；對立雙方一方是官僚體系中人數眾多的強硬派；另一方是人數雖少，但影響力更大的自由改革派。

「如果你要批評和反省整個過去，你不可能避開列寧」。從蘇共改革派的邏輯看，這已經是非常清楚不過的事情了：你要從過去中獲得新生，除了擺脫那過去的幽靈，你別無選擇。



在紅場舉行婚禮的新郎新娘  
向列寧墓獻花

有人問，安詳在紅色大理石和花崗岩築成的陵墓中的列寧，如果知道他的信徒們為他的聖體爭論不休，他會做何感想？

列寧死於一九二四年。在他的遺囑中，這位革命家表示希望將他的遺體，安葬在他母親的墓邊。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列寧，亦曾請求當時的蘇共領導人埋葬她的丈夫。她說：「不要讓你們的悲傷轉化為對伊里奇的公開的崇拜，不要以列寧的名字建築紀念物或宮殿，不要搞侈華的紀念儀式。」

但共產黨歷來對死去的領袖和其未亡人不再聽命。列寧的繼承人約瑟夫·斯大林，曾經是格魯吉亞一所神學院的學生，却有計劃地掀起列寧崇拜，按照俄國正教習俗，將這種崇拜推廣全國。與自己的意願相違，列寧成為官方奉無神論的國家中的國家之神。

在蘇聯流行的一句口號是：「列寧比一切活着的人更有生命力。」鑲着兒童時代列寧小天使般的照片的紅五星領針，在蘇聯境內任何一個小舖中，都可以買到。太空人升空之前要去陵墓朝拜，返回地球後，要去向列寧謝恩。而新郎新娘在婚禮舉行後，要把所有的鮮花送到列寧的墓旁。列寧的肖像，掛在每一間學校的教室中。無論「機場、體育場，還是地鐵車站，到處都以「列寧」命名。

在戈巴喬夫的開放政策下，所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戒規皆受到公開的衝擊。列寧也不在是最後一個例外。八九年的下半年中，蘇聯新聞界以令人吃驚的坦率，談論列寧的問題。有人說，因為列寧在世時曾經提醒不要搞個人崇拜，那麼他的遺體，應當像普通人一樣被埋葬。是否要埋葬列寧的辯論，使沉默的蘇聯人情緒激動。美國國會蘇聯研究機構專家戈德曼評論道：「列寧墓、列寧遺體是蘇聯國家教義的最高偶像，留遺力量使它繼續產生巨大的象徵性影響力。因此，蘇聯上了年輪的人和打過仗的退役軍人們，對埋葬列寧的想法不可忍受。」

自一九五〇年起便負責保養列寧遺體的科

學家德波夫接受共產黨官方「真理報」訪問時表示，想要埋葬列寧的人是要埋葬列寧主義。德波夫並透露列寧墓從十一月十五日到一月的十日關閉，是對遺體進行常規的保養。一個專家組成的小組定期鑑定遺體的狀態。德波夫



列寧墓前，漫長的朝聖隊伍望不見首尾。

稱，幾十年來，遺體的情況良好，保養十分成功，但需要不斷地施以嚴格的調整和檢查。但科學界對此有所懷疑，芝加哥防腐專家約翰遜稱，如果不直接檢查遺體，很難證明保存是完好的。但蘇聯方面一直不許任何外國人這麼做。約翰遜認為，列寧的遺體已經被屍檢、解剖。他說，蘇聯會公佈過列寧的大腦容量、大小的數據。這樣，屍檢後循環系統被破壞的遺體，不可能將防腐劑注入其內部。

因此，約翰遜提出一個大膽的懷疑：列寧的遺體已經不完整。現今保存的，或許只是頭部和手部這兩個暴露於衣着之外的部份。但約翰遜承認，也許蘇聯同行使用着他所不知道的技術。在「真理報」的訪問中，德波夫將保養列寧遺體的技術稱為「國家機密」拒絕透露。約翰遜的疑問將埋葬列寧的問題更形複雜。人們可以據此而假設，無論要不要埋葬列寧，它已經不是一個政治或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科學的現實問題。列寧遺體的大部份，也許已經不存在了。

由於問題的敏感性，對待列寧遺體的態度，使得蘇共黨中央陣綫分明。八九年四月在紀念列寧誕辰一一九週年時，莫斯科列寧·克姆索摩爾大劇院藝術指導馬克·扎卡羅夫在當晚的演說秀中直陳應該埋葬列寧遺體，從而引起了一場長期的騷動。

他指出斯大林創造對列寧的個人崇拜是一個「罪惡的行為，人為地創造遺骸是不道德的行為。」扎卡羅夫精彩地揭露了斯大林保存列寧遺體的心態：「你能夠愛一個人達到恨他的程度，也可以恨一個人達到愛他的程度，那是一種精神的錯亂。但誰也沒有權力剝奪一個人死後被埋葬的權利。」

這次演說秀的主持人馬庫謝夫補充這一論點說：「那些繼列寧之後取得權力的人，將列寧變成偶像，是出於利用列寧的動機。以列寧的名義，他們便可以犯下最恐怖的罪惡而不受指責。」

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委員會一週後就扎卡羅夫的演說展開討論，有人指責這是瀆神行為。中央委員，礦工出身的麥斯尼可夫說：「有關列寧，我們最神聖的領袖的評論，惡毒得令人難於理解。」

之後，另一家莫斯科日報與「真理報」打起擂台。該報建議「將列寧遺體進行防腐處理，在玻璃棺裡放上幾百年」；「真理報」隨即社論中反駁：「為了列寧同志的緣故，我們必須對他的遺體解除崇拜。」

# 中共在非洲的賭注

中國按人口平均收入排名於世界最窮的國家之列。儘管如此，中共每年都援助非洲國家成億的人民幣。

楊海文

多年以來，中共的對非外交經歷了不少變化。從六十年代鼓吹「世界革命」，插手非洲國家內戰，到七十年代的「經濟外交」，籠絡扶植親中共的代理人，直至八十年代的所謂「總體外交」，經援承包合營一齊上，中共對非洲國家的外交手法不斷花樣翻新，但其宗旨是一脈相承的。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共對非外交都是以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代價，並竭力維持和擴充其在非洲的勢力範圍，以謀求所謂「第三世界」的霸主地位。筆者長期在外經部門工作，曾出訪多個非洲國家。本文僅就筆者親身見聞揭露中共外交的卑劣目的和醜惡行徑。

## 經濟援助的政治條件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遠未解決，中國按人口平均收入排名於世界最窮國家之列，低於不少發展中國家。儘管如此，中共每年都拿出大批外匯、物資、藥品、設備用以援助一些非洲國家。像坦桑尼亞、毛里塔尼亞和幾內亞等國，每個國家都援助幾億人民幣以上。

中共口口聲聲說經濟援助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事實果真如此嗎？只要看下面這個例子就很清楚了。最近十幾年來在亞洲、非洲出現

了幾十個由中國無償援助修建的大型體育場，每個體育場都耗資幾十萬元，有的修得富麗堂皇，在中國國內也只有兩個體育場可與之媲美。中國按人口平均擁有體育場數和這些受援國比起來差得很遠。中共為什麼不惜工本為別人修建這一大批體育場呢？原來這是一筆交易，一個體育場可以換取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上表決時投一張支持中國的票。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後極力籠絡亞非國家，企圖拼湊一個唯中共馬首是瞻的所謂「第三世界集團」，左右聯合國的表決機器。至於一張支持票凝聚了中國人民的多少血汗，中共的當權者則是從來沒有介意過的。

近幾年來由於中共經濟改革陷入困境，國內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債台高築、民怨鼎沸。中共當局仍然繼續拿出每年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支持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中共駐非洲國家的大使總是千方百計安排非洲國家元首訪華。來訪者與中共當權派一見面，總會大談經濟上嘗到一點甜頭。這樣，駐這些國家的大使也就好當，因為這些來訪者（吃了人家嘴短），常違心地說一些奉承中共的話。比如說有些接受中國經援的國家屈從於中共的壓力，不敢報導去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震撼世界的民主運動。個別非洲國家領袖還發表了支持中共當局鎮壓民運的言論，有的受援國稍有轉播外電

報導，中共大使館就橫加抗議，說是「干涉中國內政」。其實這正是中共以勢壓人，粗暴地干涉非洲國家的內政。

## 中共在非洲的寵兒

中共為了實現其控制非洲、稱霸「第三世界」的野心，極力扶植在非洲的代理人。已故幾內亞前總統塞古·杜爾就是這樣一個最受中共青睞的非洲國家領袖。

杜爾總統是一個一心構構西非的獨裁者，他當政時處處效法中共的內外政策，在幾內亞國內「杜爾語錄」和「毛澤東語錄」處處可見，兩國政府換文的開頭和結尾也是杜、毛二人的語錄。至今在幾內亞一些人的家裡仍然供奉着毛澤東的半身石膏像。

對這樣一個亦步亦趨的僕從，中共當然不會虧待。中國給幾內亞援助了幾十個成套設備和工廠，經援總額近四億人民幣，在中共給所有非洲國家的經援中名列第三。杜爾以此為資本，當上了非洲國家統一組織的首腦。可是由於他在國內搞計劃經濟，走所謂社會主義道路，結果弄得工廠倒閉，農田荒蕪，民不聊生。與此相反，鄰近一些國家如象牙海岸和塞內加爾，儘管和幾內亞起點差不多，但由於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並且比較傾向民主，經濟得以逐步發展，修建了不少現代化建築，人民生活遠非幾內亞可比。面對這一鮮明對比，杜爾竟厚顏無恥地說「寧要社會主義的平房也不要資本主義的高樓大廈」和「四人幫」的謬論如出一轍。

杜爾對外搞「輸出革命」，派兵去「解放」尚未獨立的鄰國，結果遭到了外國雇傭軍入侵。中共唯恐在西非苦心經營的據點垮掉，當即慷慨解囊，無償援助二百萬美元現款，以示支持杜爾政權。儘管杜爾打敗了入侵的雇傭軍，但是獨裁者終究沒有好下場。杜爾死後屍骨未寒，他欽定的接班人就被軍事政變所推翻。政變第二天杜爾的官邸就被憤怒的群眾夷為平

中共的援外政策，好心沒有好報



衆所周知的坦贊鐵路是中國援非的最大項目，花了近十億人民幣。許多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犧牲了他們寶貴的生命，長眠在鐵路沿線。但是由於技術上和管理上的多方面原因，鐵路修成或出現問題，無法使用等於報廢。十億人民幣付諸流水，沒有給受援的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兩國帶來任何經濟效益。

坦贊鐵路並不是絕無僅有的例子，到目前為止中國援非的老項目有百分之八十已經停產關閉。勉強維持運行的項目需要中國不斷供應零件和提供技術力量，否則受援國就以全部折毀另請西方國家重建來要挾，中共害怕斷交，只得滿足受援國的一切要求。結果，當年的經援項目至今仍成爲中國人民肩上的沉重負擔。當前中國國內通貨膨脹、國民經濟入不敷出、外匯短缺，但還得拿出大批資金設備去履行所謂「國際主義義務」。無怪乎連中共外交官也承認這是中共「打腫臉充胖子」，「花錢買虛榮心」。

現在，中共強調對外政治經濟一體化，搞所謂「總體外交」，經援、承包、合營一齊上，似乎比較講求經濟效益了。但是由於中共政治經濟體制上的癥結，在國外企業的管理上和國內一樣矛盾重重，步履維艱。儘管中共說什麼「把競爭機制引入企業」，但由於沒有觸動所有制的根本問題，人爲地「引入」競爭只能是徒勞無益。國外企業及駐外專家組的管理和國內吃大鍋飯一樣，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壓抑，結果不少公司經營下來沒有利潤或者反而賠錢。中共在非洲某個一百四十萬美元的項目去年一年就賠了五十萬美元。

筆者曾和中央某大公司投標組組長交談。他說在國外投標，最好投三標、四標，不要投中一標或第五、六標。我問他爲什麼。他回答說第一標投中就中，風險太大，說不定要賠錢，中第五、六標回國不好交待，國內說你沒本事，算得不準。三標四標最好，不中標沒風險，回國也說得過去，反正也能一樣出國玩玩，帶回「幾大件」。

援外人員的淚與怨

中共爲了推行「經濟外交」，派出大批「專家組」、「醫療隊」到非洲國家。這些援外工作人員長年在非洲風餐露宿沐雨栉風，對非外交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在大陸沒有出過國的人看來，出國，哪怕是到非洲，也是個好機會，至少可以掙些外匯，搬回「幾大件」。只有曾在非洲工作過的人才真正體會到在這裡工作的艱苦。非洲國家多處熱帶，酷暑難耐蚊蟲肆虐，自然條件不必說了。由於中國設備陳舊技術落後，援外人員主要得靠拚體力、拚時間，經常是每週工作七天，基本上沒有娛樂生活。他們多是兩、三個人合住一間簡易木板房，用包裝箱當辦公桌，爲了從每月二百美元左右的生活費中多省一點，伙食標準大都很低。工作之餘一般不準外出，即便批准外出也要兩人同行。中國援外專家的生活條件和工資收入不僮和西德、法國等歐洲國家在非洲的工作人員無法相比，就是比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的生活條件也差得太多。駐非洲某公司的經理對我說在國外工作等於是「判刑二年、監外執行」（一般規定工作兩年後可准回國探親）。

單調壓抑的生活給援外人員心理上造成的創傷尤其嚴重。在毛里塔尼亞一個三十多人的項目組，一年之中就有一名工作人員可精神失常，一名工程師自殺身亡，一名總工程師心臟病發作死在崗位上。

根據中國政府規定，駐外企業、專家組邀請國內人員出訪並提供費用，政府就會批准。於是國內主管部門的廳長局長們，以「視察工作」、「調查研究」等各種名目大批出國。其實他們來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只是遊山玩水，抱回「一大件」。援外經貿人員辛辛苦苦爲駐外企業掙得一點微薄利潤就這樣被中共官僚們揮霍了，對此種腐敗現象，援外人員十分氣憤。

經濟外交的失敗

地。現在這片廢墟仍在供人民參觀。無獨有偶，東非的埃塞俄比亞是另一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也是全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由於天災加人禍，埃塞俄比亞餓殍遍野慘絕人寰。筆者曾在埃國首都亞得斯亞貝巴工作，該城破爛不堪，商品奇缺，道路塵土飛揚，一片淒涼。但是街頭處處矗立着高大的「馬列語錄」牌和列寧的塑像，讓人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中國文革時代的「紅海洋」。

中共對非洲的經濟援助，給非洲國家和人民帶來多少好處呢？

# 人血不是胭脂

程 鐵 軍

——評聞迪先生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六四之後，「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可讀性越來越差，不僅常常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地製造某些新聞，同時又別有用心地掩蓋另外一些新聞。其評論部份，更充滿文章大批判式的語言和空洞無物的說教，使人覺得時光倒流，似乎又回到了四人幫控制新聞媒介的時代。

不久前，一篇洋洋數萬言的重頭文章又刊將出來，題目居然是「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主編大人像撈到救命稻草一樣，特配編輯部文章，大加吹捧和推薦，其「求賢若渴」之急可想而知。此文不僅分四次連載於顯著版面，據說還要出單行本，其重要意義似乎已和「中共中央決議」以及「鄧小平文選」不相上下了。「人民日報」說，筆名叫聞迪的該文作者，是一位留美博士生。他寫該文的目的，原本只想給海外讀者看看，沒想到高官決定國內版也同時發表，一下子成為億萬人民的必讀學習材料，此時聞迪先生的感想，是受寵若驚，還是大喜過望，想必外人是無法猜測的。

我原以為此文一定水平很高，但讀了一半，便覺得它八股味很濃。好不容易耐着性子讀完全文，終於斷定它是一篇概念不清，邏輯混亂，又臭又長的裹腳布。它貌似公允、客觀、又帶點學術味道，其實虛偽、片面、通篇陳詞濫調。對於這樣的文章，本來不值得理睬。但由於它被免費報紙送上幾乎每一個留學生的書

桌，而部份缺乏理論修養或者不瞭解中國國情的留學生們，雖然憑直覺感到該文是胡說八道，但要親自反駁又不知道從何下手。為此，筆者建議所有民運人士都花點耐心，用上幾個鐘頭好好讀它一遍，然而試着想或者寫寫，看是否能回答聞迪先生的挑戰。如果回答不了或者回答得不能令人心服口服，那我們最好向聞迪先生交械投降，跟着他一塊回國去搞社會主義算了。

筆者做了這麼一番「嚐試」之後，不由得浮想連翩。首先躍入我腦海的，是劉賓雁先生一篇報告文學的題目「人血不是胭脂」。他那篇作品是寫西安一個建築設計院的黨政幹部如何一手遮天，拒絕為四人幫時期製造的冤假錯案平反。我借此題目想要說的則是，聞迪先生的文章如何掩蓋社會主義失敗的真相，用勞苦大眾的生命和鮮血為醜陋的獨裁暴政塗脂抹粉。

聞迪先生的首要錯誤，或者說不可原諒的錯誤，是他的「社會主義」根本沒有明確的定義。既然題目叫「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在談話之前，照例應該先界定一下，你要談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早在十年前，當鄧小平剛剛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改革派的理論家李洪林就曾寫過四篇相應的文章，其一便是「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

義」，因為當今世界上各種字號的社會主義實在太多。從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波爾布特滅絕人性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四人幫「和一切帝修反對著幹」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一直到北歐等地的民主社會主義等等，這個光譜廣得很，就連在許多所謂純粹資本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團體和社會福利措施也在逐漸擴大中。聞迪先生談的是哪一種社會主義呢？從行文來看，他一直籠統地說四十年，而且多次為「大躍進」和十年文革期間的所謂成就而誇耀，反倒對十年改革和開放顯得不大欣賞。果如此，那他所說的社會主義一定是指鄧小平也認為非改不行的斯大林毛澤東體制了。這樣的論調，明顯地把作者的政治賭博押在陳雲和姚依林一派身上了。如果這派得勝，聞先生一定宏圖大展。可萬一他們失敗了呢？那時聞先生會急忙修正自己的「理論」呢？還是乾脆留美不歸，繼續在資本主義的安樂窩裡高唱社會主義的救世歌？

本來，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原本就是一筆說不清的爛帳，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目認為他們完成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做為一種政治學說成假說，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的確也曾受到過不少學者的尊重和認真研究，但做為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不但從一開始便問題多多，而且經過半個多世



紀的實踐檢驗，已被徹底證明了一場人間慘劇。當全世界生活在這一制度下的人民都在忍無可忍中起而抗爭的情況下，開迪先生却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為這種無人性的制度高聲辯護，我除了佩服此君的勇氣之外，也不得不懷疑他的智商或動機。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便是缺乏起碼的良心。

他大言不慚地寫道：「一旦明白社會主義首先是在比較貧窮的國家，或者如列寧所說在帝國主義鏈條比較薄弱的環節建立起來，這個問題就沒有爭論的必要。」不對！這個問題恰恰有爭論的必要。因為這個「一旦明白」的大前提並不能使人明白。除非你在論證之前便預先聲明，「本篇所引馬恩列斯毛的論述都是終極真理，金科玉律，不許有絲毫的懷疑和反駁。」否則，我還是要禁不住問那些偽科學的論點說出質疑，不管它的提出者是人是還是神。

列寧的「薄弱環節」論便是一例。盡人皆知，薄弱環節論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即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才能產生社會主義（或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入口）背道而馳。後來斯大林毛澤東一幫機會主義者為了替自己的新政權尋找合法性的藉口，硬是強拉硬扯地把列寧的謬誤說成是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於是，強權便成了真理。

然而，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畢竟不是強權，而是實踐。經過幾十年的酸甜苦辣之後，尤其經過二次大戰後長期的和平競賽和競爭，以商品市場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和以產品計劃為導向的社會主義二者之間，究竟誰優誰劣，誰勝誰敗，連傻瓜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看看一旦鐵幕鬆動之後，哪邊的人往哪邊跑，哪一方羨慕哪一方，一切便都清清楚楚，根本用不着繁瑣的論證和學究式的辯白。正像大批東德人繞道匈牙利逃往西德時，一位抱着孩子的婦女對前來勸阻的東德官員所說的那樣：「一切好聽的話都不要說了。我們這代人被你們騙了一輩子，如今兩手空空，再也不指望什麼。只請求你們准許我離開，為了孩子的希望，我要讓她



大躍進是騙人的神話，小孩可以站在豐收的稻子上，歡喜雀躍。

到另一個世界去生活。——如果開迪先生是那位東德官員，不知他會如何作答？

當然，開先生會不甘示弱，他一定要列出一大堆統計數字，既有世界銀行的，也有美國中情局的，以此來說明蘇聯和中國始終保持着遠遠超過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好像只要諸位勒緊腰帶耐心等待，趙英趕美的那一天終於可以到來。為了揭穿開先生「高速度」執着偏好所掩蓋的騙局，筆者不得不在所謂統計數字上也下一點功夫。

恰好手邊有中山大學教授何博博先生的一本新著，書名是「山坳上的中國」（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其中第五章有一節專

門談到中國經濟建設的高速度問題，標題叫做「速度的陷阱」。在筆者看來，中共經濟史上的「高速度」不僅是個陷阱，簡直可以說是騙局和罪過，不但不值得誇耀和稱贊，反而應該受到聲討和清算。對於那些極力製造禍國殃民高速度的高官，有必要以「速度罪」起訴他們。

從一九五八年一平二調的高速度，到華國鋒在七〇年代末搞的「洋躍進」，再到八五年前後的引進風潮和八七年以後靠通貨膨脹支撐的基建膨脹，幾乎所有的「高速度」都是以高積累和低效益為代價的，也就是以低效投資和無效投資為交換條件的。虧本買賣不但百做不

貽，而且越做越大。只有實在丟人現眼到說不過去的時候，才有領導人出來輕描淡寫地說幾句「交學費」或者「沒按經濟規律辦事」的屁話，然後官照當，速度照上。訣竅何在？無非是在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使官僚們有恃無恐，可以任意地，不必負責任地支配老百姓的血汗錢罷了。

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任何經濟活動的基本出發點都是為了效益（或收益或利潤等等），只有傻瓜和瘋子才會不問收入只管速度。而聞迪先生所擁護的正是這麼一批傻瓜和瘋子。其實說到底，官僚們並不是真傻，因為共產黨的邏輯是，速度——政績——官運，其中的奧妙便不言而喻。根據統計，中國按國民生產總值計算的增長速度，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三年平均高達百分之九點五，高過日本，低於羅馬尼亞，居世界第二！可謂享盡了統計數字之福。

然而畫餅不能充飢。首先中國統計數字的真實性一直是個大問題。它可以騙世界銀行和美國中情局，却騙不了中國自己的經濟學家，更騙不了親自參與統計工作的那些職工。本人就曾經手過從基層到部局級上報的統計材料，任意編造和浮誇虛報的比比皆是，所謂統計法的嚴肅性蕩然無存。真正按實際數字上報的統計員往往受到領導的批評和打擊。說假話已是中共社會無可醫治的通病，統計工作亦不例外。

其次是統計指標體系的欺騙性。所謂國民生產總值的概念是從斯大林經濟模式抄來的，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重復計算，很難客觀反映實際發展程度。更重要的是，它只計算生產出來的價值（即產值），而不理會實際上實現的價值，即通過交換而被最終消費掉的價值。所以在中國有很多怪現象，一方面鋼鐵產值高速增长，過量的庫存堆積如山，在報廢，另一方面價格的鋼材又奇缺，不得不依賴進口。五金、機械、輕工等大量次品、廢品根本沒人要，但仍然被統計成產值，繼續為「高速度」發光發熱。

國家體改委的楊啓先先生在一九八七年指出，從一九五三至一九七八年間，全國固定資產總值增加了四十倍，而國民總收入只增長了三點五倍，人民生活水平只提高了百分之十。全國企業有百分之二十左右長期處於虧損狀態，整個生產增長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靠擴大投入支撐的。如果我們考慮到固定資產的形成率只有投入資金的三分之一，那麼近三十年內，實際投入的資金增長了一百三十多倍。以一百三十多倍的投資，僅僅換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零點一左右，這便是聞迪先生所吹噓的高速度的本質所在。

這樣的高速度，完全建立在勞動人民的血汗和白骨身上。現在我們才知道，人民的錢被弄到哪裡去了，為什麼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只有三點六方米，連一九五二年的標準都沒達到。聞迪先生所嚮往的社會主義，更通過強迫合作化和低價徵購對農民實行超經濟掠奪。據「社會學研究」披露，在合作化年代，國家以剪刀差形式從農民身上剝削了六千億人民幣。以八億農民計，平均每人無償進貢七百五十元。若以三億整勞力計，則每人平均進貢兩千元。再以合作化年代的平均工分值五角錢算，相當於每個勞動者要白幹四千多天，合十年以上！其剝削率之高，不但超過地主資本家，甚至超過奴隸主。另外，三年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超過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死亡人數的總和。對這樣巨大的人命代價的責任，連鄧小平也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於部份承認大躍進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天堂計劃離離罪責。偏偏是聞迪先生不以為然，仍然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並且鼓吹這樣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若真按聞迪的理想去幹，我看不但超英趕美是泡影，恐怕亡國滅種的危險；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也會加速來臨。「人血不是胭脂」，請不要再粉飾那個「社會主義」天堂了。  
孔夫子說：「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災必及夫身。」望聞迪先生三思。  
米

## 徵訂啓示

# 「八九」中國民運紀實

最全面最詳實紀錄一九八九年北京民運史實的大型實錄。全書約一百萬字一千頁（上、下二冊），另配有四十幅珍貴圖片。

歐家其、吾爾開希分別為本書作序和題字。

本書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逐日紀錄了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廿四日趙紫陽下台的全部重大事件。

本書由吳牟人等編著，現已出版。訂價 \$ 12.00，另加郵費 \$ 2.00。

支票抬頭請寫： CONTACT OFFICE 聯繫地址：

CONTACT OFFICE 44-22 Ketcham ST #3A, Elmhurst, NY 11373  
Tel: (718) 639-7483

# 評丁楚

師 秦

## 〈民主先是瀉藥後是補藥〉

我的朋友兼對頭丁楚君的大作「民主先是瀉藥後是補藥」(刊於「中春」八十期)，堪稱奇談怪論。在這篇文章裡，丁楚君使用粗魯明快的數學計算法將神州古今進行剖析，其高論雖然才氣縱橫，却如同用冰雪堆出的瓊樓玉宇，根本敵不住真理的陽光。

丁君認為歷代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官僚貴族的生存空間過於狹窄，而之所以如此，則由於貴族階層繁衍得太厲害(丁楚君以熟練的乘法口訣為我們演算道：一個貴族生三個兒子，每個兒子再生三個孫子，……三三得九，三九二十七……)，造成了狼多肉少的嚴酷局面。

這一觀點令人忍俊不禁。看來，如果秦始皇能夠聰明地執行「官僚一胎化」政策，委任一位陳慕華或錢信忠式的大臣總管其事，他的帝國便可以長治久安，傳之萬世了。

然而，秦王朝以及其他暴亡的短命王朝，恰恰說明丁楚君的簡單化的觀點是荒謬的。王朝的興滅，時代的更迭，牽扯着極其複雜的、多方面的、顯性及隱性的、近期及遠期的原因，絕非一兩個淺近公式所能概括。

丁楚君在剖析中共王朝時，其草率態度幾不能令人容忍。在他看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和一羣草寇、一個強盜集團並無兩樣，皆以魚肉百姓為能事。

走筆至此，筆者想到中共新總書記江澤民

的一系列笨拙表演：上井崗山、下延安，與普通工人同桌進餐……儼然是一個艱苦樸素，平易近人的老紅軍、老八路。

在這裡，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共產黨人江澤民和持不同政見者(或曰反共份子)丁楚基於各自的巨測用心而殊途同歸，即蓄意將今日之中共混同於四十年前的中共。誰不知，斗轉星移四十年，中共已從人民的解放者墮落為人民的壓迫者！江澤民、丁楚兩位先生的異曲同工的詭辯術皆可休矣！公道，自在億萬人民心間。

丁楚君的二度演算是這樣的：「只要看一今天共產黨官僚的生存空間，就足以為這個王朝的命運捏一把汗了。四十年間，中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可是共產黨的官僚却增加了十倍。」——狼多肉少的嚴酷局面！

丁楚君的這一看法同樣站不住腳。須知，四十年間，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提高了×倍(各方統計數字不一)，共產黨官僚階層及普通百姓階層的生活水準均有大幅度提高。十一億民眾供養四千萬中共黨員游刃有餘。況且，若論物質基礎，今日之中國遠較六十年代大飢荒為好，而黨群關係則有天壤之別。請問丁楚君如何解釋？

筆者提供的解釋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不患寡只患不均」的國度，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乃

是引起統治集團內哄及官民關係緊張的主因。六十年代大飢荒時，普通百姓餓肚皮，中共官僚也強不到那裡去。其時，高官赴國宴尚要自付糧票，他們袋中依革命資產配給的甲、乙、丙種供給證只能平價買幾斤白糖、幾斤豬肉；因此，苦難苦矣，官民倒也能相安無事。中國的老百姓從來就不認為官民地位平等，視官僚領一份厚祿(按照官場常例取錢)為理所當然之事。然而，當一個新王朝最終為絕對權力所腐蝕，整個官僚階層都忙於用違反官場常例的不法手段聚斂錢財時，民眾便要揭竿而起。今日之中國即是這種情況。改革開放使得各級官僚及其親屬如虎添翼，放手撈錢，急速擴大了官民生活水準的差距，造成民怨沸騰的局面。看看天安門絕食現場上民眾捐贈的食品衣物吧，說他們飢寒交迫，誰能相信？然而，正是這些不穿衣，不少食的普通百姓，在六四之夜用血肉築起了新的長城，向中共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吼聲！

丁楚君的奇談怪論，在其大作的後半部份推至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公然稱讚斯大林的大開殺戒為蘇聯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同時抱怨中國的殺人魔王毛澤東尚不夠心黑手辣，沒有利用文化革命的良機屠刀創造一次中興機會(丁楚文中指的是中共的中興，然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黨與國的命運是無法分開來談)。

在丁楚君筆下，殺人乃是挽救我們這個民族的不二法門。

這種論調同樣站不住腳。

首先，用毛澤東、斯大林的個人性格來解釋其清洗官僚的不同做法，是膚淺之見。須知，斯大林是在蘇共之教父列寧早逝後接掌最高權力的，他並非同儕中最有威望者，故不借助殺人如麻的恐怖手段不足以安居此位。而毛澤東的情況則不然。這位起自湖南的農民領袖目遵義會議後便成為中共的教父，其權威不容挑戰。因此，毛澤東對清洗對象並不斬盡殺絕。當然，那些有實力威脅其教父寶座的對手如劉少奇、林彪不在此例。

其次，毛澤東、斯大林清洗官僚的不同做法並非今日中國落後、蘇聯先進的直接原因。有目共睹的事實是：斯大林的屠刀固然為學院派官僚的崛起掃清了道路，然而從勃列日涅夫（他是蘇聯第一代毫無革命資歷的最高領袖）敗下來，歷經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國運皆無起色。直至歷史母親以政治奇人戈巴契夫惠賜

#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此次聯席會議，六四之聲將由主編王輝雲出席。對於民陣、民聯聯合一事我有以下一些看法。

一、聯合起來，如能使原來積極作事之人保持幹勁則是好事，否則徒有其名，實際操作反會受到負面影響。要保持大家的積極性，就要幹事的人有一定職務、權力和經費。如果經費有限，則總部開支的比例應先壓低點兒。大家都幹起來了，不相互「打橫砲」，聲勢出去了，則經費來源會大大增加，總部的工作能擴大，協調作用也起得更好。

二、從組織路線上說應該走「精英路線」，將真正做事的人團結在一起大幹。那些反正不會怎麼參與、奉獻，只是看看熱鬧，起起哄的人，你如何照顧他們的認識水平、觀點他們都不會做太多。

絕大多數的留學生多只考慮個人利益，什麼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那是要等在發達國家立腳謀生之後的事。少數人，大概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要現在就做些事來改變中國的前途的。我們（即民陣、民聯）現在先要團結，使之運作的是那些最積極份子，至於一般群眾，盡量少得罪就可以了。積極份子的作用是運作起來，參與中國政治，改變中國命運；一般群眾的作用在於中國發生變革之後，他們回去講學，做做買賣。

蘇俄人民，國家面貌才發生了良性改變。而鄧小平在徹底清洗了毛澤東晚期得勢的政治新血（文革派）之後，又打出一年輕化、知識化」的旗號提拔了一大批學院派官僚（其中許多人具有紅色貴族血統）。然這些人已經進入中共官僚機制，便成為這架殘民機器上的標準元件。世人皆曰可殺的李鵬，即是最典型的一例。

一個是現在進行時，是重點；一個是有條件的將來進行時，條件是積極份子有效地幹起來，中國的環境改變了。

如情況不改變，一般群眾只是發點牢騷，自己過自己的小日子而已。至於這些人是否登過一個記，成為了民陣、民聯成員是無關緊要的。

在六四屠殺之後，共產黨已成了中國人民的公敵，它那一套曾經行之有效的思想意識、文化獨裁，它曾經享有的民心已基本瓦解了。中國政治的前途，在於一個或幾個（最好是「一個」）強大的反對政黨的出現和發展。強大的標準是運作得是否得力，報紙、電台、策略研究、組織系統是官辦得好，發展的好，而不在于你的組織路線多麼溫和，有多少人表面上能與這溫和的路綫附和。

民陣的錯誤在於過於看重幾個看起來很聰明的口號，什麼「不倒共產黨，而是結束一黨專政」、什麼「要成立聯邦，或邦聯共和國」啊，這都是些聰明但虛幻的詞句、請問，沒有反對黨哪來的多元政治？要組織反對黨民陣不應該去幹嗎？

嚴家其扭扭捏捏地接受了主席的職位，然後繼續其獨善其身，修身養性的策略；萬潤南在組織結構和經費花銷上借得秘書處一枝獨秀，到現在民陣沒有電台、刊物，沒有公開的研

如果他仍是一名電機工程師的話，相信他能夠為民衆做一點有益的事情，但身為國務院總理，他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狂徒。  
中共官場的絕症並非由於狼多肉少不敷調配，而在於絕對權力造成的變羊為狼的腐蝕性。吾爾開希曾經說：「如果我當總理，也會搞獨裁。」這倒是一句童言無忌的大實話。

## 致嚴家其、萬潤南

究機構。基本上只是一個將舌頭捲起來喊一些溫和的空頭口號的有名無實的架子。

所以說今天民陣的組織結構、運作形式，是對人才資源的一種浪費。一方面它不能使那些鼎鼎大名的國內流亡出來的民運人士團結運作，另外它對真正積極的海外留學生沒有吸引力。現在留學生中少數參加了民陣的積極份子也是抱着去改造民陣的目的，但他們沒有名氣、人微言輕，改造民陣的設想怕是要在名人們即定的方針下落空。一旦他們認為改造民陣不可能了，希望變成了失望，這些已參加的積極份子也可能會恨恨地退出民陣。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不進則退。民陣從剛剛籌劃，到現在可能已退了不止一在聲勢上，在對海外民運積極份子的吸引力上，現在是民陣進行反省和調整的時候了。

我的建議是與民聯聯合起來，丟掉口號遊戲、虛空策略，多發展職能機構，幹出些事實來。打出新政黨的旗幟，將真正能參與、有奉獻精神的積極份子聚集起來，只有這樣的組織結構和路線，才能使目前的民陣有所作為。

冒昧之處，請多原諒。  
祝  
新春愉快！

李三元

# 改良主義對大陸民運的誤導

——在芝加哥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

倪育賢

## 一、改良主義思潮影響下的八九民運

一個不能從劫難中吸取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同樣，一個不能從挫敗中總結經驗的運動也必定是沒有成功希望的運動。

在八九民運中，本來理應義不容辭地擔負起引導運動方向任務的民主知識份子，在實踐鬥爭中却扮演了旁觀者，調節人及和事佬的滑稽角色。一部份向來以民主科學倡導者相標榜的所謂知識精英在民主高潮突然洶湧而來時表現出驚惶失措，前顧後盼，茫無頭緒的葉公之態，對群眾運動的恐懼和秋後算帳的噩夢使他們失去了冷靜判斷形勢的能力，更遑論去因勢利導爭取勝利。中國知識份子的軟弱、怯懦，和耽於幻想在這場運動中淋漓盡致地暴露無遺，具有十足諷刺意味的是，儘管他們一再申明他們並不反對共產黨，也不想推翻其政權，而只不過要求作中共憲法允許的改革，儘管他們一再聲稱堅持和平與非暴力的「神聖」原則，但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統治集團還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們一概打成反革命暴亂份子，務必通緝追捕斬盡殺絕而後快。

中共集團的殘暴與知識份子的幼稚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直到今天，還有人因為當初想幫共產黨排難解危而被打成反黨份子而憤憤不已。

值得指出的是，在八九民運中，廣大青年學生和市民確實表現出了渴求民主自由，敢於

創造歷史的大無畏精神，他們以自己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和卓有成效的鬥爭造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有利形勢。中共政權在卒然襲擊下，其中樞一度陷於癱瘓，甚至連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當時中共專制統治曾陷入生死存亡的危局。令人扼腕的是，在改良主義思潮籠罩下，當時沒能行成一個具有明確政治訴求的組織來凝聚已經迸發出來的反專制力量，予中共暴政毀滅性的一擊，反而用乞求恩賜合法地位的方式來表白自己的「理性」和「善意」。這樣就給被擊昏的中共以甦醒喘息和重新集結的時機，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束手待擒，坐以待斃！

極為荒唐的是，在中共悍然用血腥手段屠殺和平請願的人民時，我們的民運「領袖」們還一再號召「和平」、「理性」、「非暴力」，高唱什麼「和平的最高原則是犧牲」的口號，這種書呆子式的近乎自殺的方針，使民主運動失去反擊暴政的精神依托，讓中共創子手不遭任何反抗地屠殺了大批手無寸鐵的和平人民。

「八九」天安門運動悲劇性的結局給我們的一個特別沉重而又深刻的啟示是：

迄今為止的中國民主運動基本上是一個被體制內改良主義路線誤導的運動，這個運動如果不及時從改良主義的羈絆下徹底掙脫出來，它就無法避免再次被引入歧途以致慘遭鎮壓、無力自救的厄運。

## 二、民主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原則分歧

怎樣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專制制度的本質，是民主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路線分歧的焦點。民主主義者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鞏固和擴張一小撮特權階級世襲私利為根本目標的法西斯政黨，中共頑固堅持的專制制度是造成中國經濟落後，政治黑暗的極終根源，中國人民要擺脫貧困與痛苦，除了徹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法西斯統治以建立一個人民享有政治選擇權的民主共和國之外，不可能有別的路。

改良主義的主要鼓吹者是一批靠依附於中共特權制度才立世揚名的官僚知識份子和藉追隨中共改革派才青雲直上的「改革精英」。他們不少人曾是中共特權制度的實際受益者，其中有些人本身即屬於中共統治階層中失勢了的一翼。他們與中共特權階層有着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他們至今仍仍以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自居，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對中共政權及其專制體制採取與民主主義者截然不同的立場也就不為奇了。

改良主義路線的主旨是反對從整體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反對從根本上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他們強調現行體制作改良性的修補，他們寄希望於中共黨內保守派的失勢和改良派的重新上台。在策略上他們一味鼓吹合法與非暴力手段，反對人民行使抗暴自衛的權力。一有可能，這條路線的實踐者決不會放棄進

入中共體制作幕僚的機會。

### 三、恐懼是改良主義的思想根源

改良主義思潮是中共極權專制制度造成的畸形社會形態下的畸形精神產物。這是被扭曲基本人性的一批知識份子試圖改變現狀但又不敢徹底沖決專制制度的精神羅網的一種掙扎。

中共用從肉體消滅到精神灌輸的嚴酷統治使全社會都籠罩在無所不在的恐懼之中，這種恐懼使每一個有求生欲望的普通人都從幼年時代起被培養成決不敢對共產黨統治的合理性進行任何質疑的馴服工具。人們從被共產黨宣佈為階級敵人的人的可怕下場中得到的最刻骨銘心的教訓是，反抗這個政權的任何企圖不但是極其危險的，而且必定是徒勞無果的。共產黨所宣揚的那種理想社會的教條又使這個政權帶上了正義化身的虛幻花環。於是，凡是被這個黨指控為反革命的人常常被大多數不明真相的群眾所敵視與虐待，而這個政權所推行的階級路線與株連政策又使每個「反革命份子」的家屬和親友蒙上世代難洗的屈辱和永難解脫的厄運。所以，一旦被黨指為「反革命」，在人格上、精神上遭到的侮辱和踐踏是難以想像的。這種前所未有的對人性和人的尊嚴的摧殘使每個有求生本能的人自然產生一種對「反動」思想的精神抗體。恐懼在他們大腦裡築起一條無法逾越的精神防線，這就是只想黨所允許他們想的東西。萬一思想隨着其本身的自然邏輯沿伸到可能對黨產生不利結論的邊緣時，這種大腦管制系統就會自動亮起紅燈。於是，一種自我認罪，自我反省和自我懺悔的意識就會緊急動員起來，驅走危險的思想「毒素」，這就是共產黨所謂思想改造的全部秘訣。

### 四、人變成非人的四個階段

一個長久處於中共極權統治下的普通人會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無法抗拒的病變。人對環境的自然適應能力會讓人逐漸把一個畸形的社會誤認為本應如此的正常社會，長時期置於險境的結果是使人形成自動不去冒險犯難的條件反射。這就造成了一種相對安全的假像。這時，人格就會產生變態，人性和人的尊嚴就會遭到扭曲，人們就會對統治者的殘暴行為熟視無睹，就會對社會不公無動於衷。

共產黨極權專制把人改造成非人有這樣四個階段，即：不准想、不敢想、不會想、排斥他人想。(1)不准想——這就是黨用暴力來迫害一切敢正常思維的人；(2)不敢想——由於人們看到那些不按黨的要求「胡思亂想」的人的可怕下場，就不敢再按自己的思路進行思維了，因為思想的必然結果是表達，而表達就意味着危險。為了保險，最安全的辦法當然是不去想；(3)不會想——長時間的不敢想的结果就造成社會性思維的功能急劇衰退。從不善於想變成不會想；(4)排斥他人想——長久不會想的结果是排斥別的還能進行正常思維的人，並把那些敢於「胡思亂想」的人視為非我族類的害群之馬加以敵視。人到了這一步再想回復到一個普通人的思維方式就相當困難了。這就是為什麼一些接受共產黨幾十年教育的黨員幹部會心安理得地接受黨的種種反人性惡行而毫無良知反應的心路變化歷程。

### 五、改良主義對人類良知的漠視

在中國，每個成年人肯定都熟悉這樣的故事。一個年輕人，出於正義，寫信表示對黨的政策的不滿，寫信人被公安機關查獲後按例被押赴刑場槍決示眾。這種事在一個正常思維的人看來是殘忍和喪失人性的行為。因為公民對執政黨的行為提出質疑是基本天賦人權，但共產黨却把大批這樣敢於思想的青年人殺掉了。這樣慘無人道的事不但現在繼續發生，而且中共把這種屠殺從刑場上搬到廣場上來執行了！

對一個人的不公正就是對整個社會的不公正，對部份人的殘忍就是對整個個人的殘忍。奇怪的是，我們的改良主義者朋友們直到今天仍不同意從根本上推翻這惡貫滿盈的法西斯政權。

八九年春國內三十多位知名知識份子發起簽名要求為魏京生申請特赦。當然這是件好事，但從根本上說是對共產黨反人性行為的姑息。因為魏京生要求民主，這本是天經地義的正義行為，何罪之有？魏京生本人始終沒有認罪，證明他是有原則立場的。我們聲援他，正當的方式應該挺身而出，為他作無罪辯護，大概為了不刺激共產黨，我們的一些朋友採取了要求為其特赦的辦法，特赦的前提是首先承認這個對像是有罪的，然後再有赦罪的可能，所以，如果我是魏京生，我也許並不希望那些社會名流來為自己向共產黨申請特赦。

### 六、改良主義泛濫的社會條件

人的思維要形成有意義的思想必須經由表達和交流。共產黨把人改造成機器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切斷人們思想表達和交流的渠道。事實證明，渠道一經切斷，社會就極難形成成熟的反抗意識。這就是我國大多數人民為什麼至今還處在民主蒙昧狀態的原因。

在中共極權制度下，一切思想傳播媒介都被牢牢掌握在黨的官僚手中。在這樣嚴密的控制下，任何人的思想要被社會認知的唯一方法就是要獲得黨的批准，知識份子的任活動需要之外絕無他途可循。而由於社會矛盾的空前激化，人民對中共的特權階級的強烈不滿無法獲得正常渲洩的渠道，在這種情況下，極少數比較有正義感而同時又由於某一機緣而有機會公開表達對黨的某種批評意見的人，就會得到社會特別的歡迎，使這些人成為名不符實的所謂「人民的代言人」，其實，在黨所控制的官方的報刊或出版物中，任何聲音都必須在根本

上符合黨的總體利益或者被黨認為符合它的利益的條件下才可能得到傳播的機會。因此中國的知識份子最多只能在黨所劃定的那條警戒線上玩打擦邊球的遊戲。他們根本不可能涉及到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性的實質問題。所以，從原則上來說，只有改良主義思潮才可能找到公開表達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一些所謂不同政見者與蘇聯的沙哈洛夫及波蘭的瓦文薩等人在政治立場上截然不同的一個原因。外國的不同政見者對共產黨體制基本上都持明確的否定態度，而中國的那些名重一時的所謂思想領袖大體上都只是一些肯定共產體制的改良主義者。一到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他們就會不由自主的滑到與民主主義相左的立場上去了。

誠然，中國有成千上萬英勇不屈視死如歸的民主主義者，只是他們絕大部份被中共扼殺在監獄和刑場上。只有人民真正解放以後，他們才能被人民所知悉和尊重。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在毫無危險的舞台上作秀的演員，真正的英雄已經長眠在黃土中！

歷史的惡作劇是，由於共產黨文化專制和思想箝制造成的改良主義一家獨尊的畸型狀況，一些歷世不深的年輕人把改良主義思潮誤會成社會先進意識來加以肯定，甚至把缺乏原則的改良主義者當作先知先覺來頂禮膜拜。

### 七、改良主義是不結果實的花朵

在八九民運中，值得引起重視的是，很多大學完全不知道魏京生、王希哲為何人。他們其實也完全不知共產黨在四十年的統治中曾經殘殺了多少像他們一樣的熱血青年。由於改良主義的誤導，他們根本沒有想到共產黨會悍然屠殺自己。一個女青年在天安門被子彈射中而倒下時的最後一句話竟是，「不要緊，那是橡皮子彈，……」這怎麼能怪她，她才十八歲，在她的短暫人生中，她所信賴的每一個師長和前輩給她的教育都說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共產黨是不殺好人的。她再也不可能明白，這

些話是天下最大的謊言，而製造這些謊言的人或散佈這個謊言的人直到今天還沒有感到任何良心上的不安，他們當然更不會想到應該向這些無辜的生命懺悔。

不可否認，在專制黑暗特別猖獗的文革時期，作為對社會法西斯主義的一種反思，改良主義思潮曾經一度起過啟發人民思考的有益作用。歷史上改良主義的盛行常常成爲民主主義復興的先導和前奏。但是，當人民開始覺醒起來用行動爲自己的權利而鬥爭時，改良主義就會走向歷史的反面，成爲干擾民主運動方向的消極因素。

在中國，改良主義從來就是不結果實的花朵。中共對八九民運的血腥鎮壓已經在實際上宣告了體制內改良主義路線的破產。事實證明，體制內改良路線對民主運動誤導而造成的負面影響的巨大的，它使人民在可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關鍵時刻失却決勝的機會，它使人民在可以避免失敗的情況下遭受慘重的犧牲。無論這條路線的推行者們的主觀意願如何。她在客觀上起了麻痹人民鬥志，模糊運動方向和延長專制壽命的消極作用。羅馬尼亞革命的勝利和中共反動集團的倒行逆施，凸顯了體制外民主主義路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而這一條路線的實踐必須以摒棄黨內改良主義路線爲前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鮮明地舉起打倒中國共產黨，推翻中共獨裁政權的旗幟以劃清與改良主義路線的界限是當前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任務。



# 天鵝湖之旅

\* 東歐旅行團：你知道地球上哪裡的變遷最激動人心嗎？東歐！

紐約第一家瞭解東歐的使者，一個月的薪水可讓你遊歷三個國家。春暖花開四月飛翔。

\* 中國大陸遊：絕妙無窮，讓你像本地人一樣知情入俗。

\* 美國國內遊：快捷方便，情人不誤約會，商人不誤戰機。

\* 機場服務：衣食住行路路通，比郭德華還「老紐約」。

國、英、台語 (718)359-0184 JENOIE 小姐

國、英、粵語 (718)463-8064 LUCY 小姐

# 不要給人民公敵做幫手

曉剛

不久前偶在報上讀到夢生「東南西北中的評論」切勿受「民陣」幡竿迷惑」，斥責嚴家其籌建民主中國陣綫，只反鄧楊李，不反共產黨，不是搞革命，內心一定是仍擁護紫陽復辟，「根本就是籠裡編造反」，呼籲大家「不能支持」。夢生不僅要打倒鄧楊李，更要消滅共產黨（如此叫喊，無須在什麼「研討會」上指出，當然更是要被共產黨「追捕殺戮」的了），這自是一種主張。嚴家其只要譴鄧楊李之流下台，却認為依民主精神，無論共產黨有無「存在的價值」，仍有存在的權利，如同反

共政黨也有存在權利一樣，那也是一種主張。另外，還有人主張武裝鬪爭，亦有人高呼「要文圍不要武圍」。不論主張如何，在六四慘案之後，法西斯式的鄧楊李集團毫無疑問是共同之敵，可謂人民公敵，大家大可來個什麼聯合陣綫、統一戰綫之類的，共同對敵。主張革命的革命，主張反革命的革命，主張武裝鬪爭的鬪爭，你的武裝鬪爭，主張文裝鬪爭的鬪爭，你的文裝鬪爭。雖不免有人會「終歸失敗」，但總有同盟者能乘機得手。待有朝一日，鄧楊李之流血腥無恥的那一套走到窮途末路，倒了台，主張趙紫陽那一套的，主張比趙紫陽更進一步或

進萬步那一套的，主張包括共產黨在內人人都有的權存在的，主張「誓滅共產黨」的，以及主張其他這個那個的，再互相爭鬪個狗血淋頭為時未晚。試想，那身為公敵的，見到籠裡雞也造反，屋外貓也起義，裡裡外外眾叛親離，義起攻之，他的日子還能過得下去嗎？可是此時此刻夢生先生不盡全力先去進攻共同之敵，却把大棒打向「籠裡造反的雞」，豈不倒像是給人民公敵做幫手來了！

## 萬潤南先生的「根」在哪裡？

### ——一名海外中國留學生的質疑

胡鳴

「爭鳴」八九年十二期上，萬潤南先生在同楊力字的對談中說：「我們在國內有根，民聯無根，這是很大的區別」。

萬先生所說的國內的根到底在哪裡呢？先不妨借用楊力字教授在對話中的補充：中國民聯大致上是大陸留學生的組織。可是萬先生說民聯在國內無根，可見他所說的根不是扎在大陸人民中間的根。聯想到萬先生本人的經歷和民陣中一大部份人原屬中共高層幹將這一事實，我們不免推斷他所說的根是扎在中共獨裁官僚機器中的。這個機器連同扎在其中的根恰恰是我們民運要鏟除的。

另外，萬先生還說當民陣寫下結束一黨專

政時，就已經是體制外了。筆者不以為然。萬先生是不是共產黨員？是的話還沒有公開聲明退出吧？

以一大批現任共產黨員為骨幹的民陣說自己是體制外的反對共產黨的反對派，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民陣所能代表的只能是共產黨內的改革派。這一點萬先生也下意識地承認了：趙紫陽代表的力量是我們。

我們不反對以萬先生為代表的體制內改革派。相反我們全力支持民陣的體制內改革努力。民陣的體制內改革能從內部加深共產黨內的矛盾，促使其獨裁統治早日覆亡。從這一點上說民陣的作用是其他民運組織所不能替代的。



萬潤南：我們的「根」在大陸。



# 各有一本難念的經

## ——民運人士的苦衷

譚夏

寫作緣起：

本篇的寫作醞釀已久，由一系列採訪組成，旨在能多多少少反映出大家在民運中的真實想法。「六四」以來的局面，套用一句慣用的大陸政治術語，叫「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海外華人也概莫能免。「六四」前後，在強大的新聞媒介的衝擊和激情的席捲下，各界人士都一度置身民運之中，不管是大陸同學之間還是大陸同學與當地的港台僑學各界，都一改以前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一起參加了一些活動。現在隨着民運落潮，大家也都要陸續回到生活的常規之中。當然還有一些人由此改變了生活常規，發願要為爭取中國的民主盡點力。然而天下事並非盡如人願，要做事就要和各界打交道，也要爭取大眾的認同和支持。這些都誠非易事。此外每個人都還有自己的具體的

處境和能力，常有力不從心的時候。即使在一起共事，每個人各有一套，也不會處處情投意合，扯皮在所難免。由此便產生了種種感慨和牢騷，破口大罵也不罕見。當然，這些意見大多是「背對背」時講的，「面對面」時礙於情面，總不能暢言。本文就是想提供個地盤，請大家講講心裡話，背後話，互相瞭解，不打成交。本文無意於報導「張三李四」如是說，只是想使民運中各種不同意見都能有所表達，展現一個對不同意見復蓋完整的「光譜帶」。換句話說，本文着重突出問題，有意淡化人物。可惜一些頗有表現的人士「不立文字」，筆者也無從杜撰，只好暫付闕如。

此外，本文在寫作中的另一點考慮是平衡事實和意見。筆者不願憑空立論，無事生非，所以所有採訪，首重事實，意見也大都是緣事

而生，有感而發的。另一方面，筆者也不願就事論事，人人坐實，這樣徒生是非，無益大局。所以對被採訪人一概以字母代替姓名，以利大家直言無忌，因小見大。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事實，均經兩個以上消息來源多方核對，而凡被訪人要求過目的一些意見報導，也都經過其自審。

輯錄在這裡的意見，有的是發言人多年深思熟慮之見，有的是一時激憤之言；有的是不管你愛聽不愛聽，直抒己見，有的是考慮你的反映和態度，委婉其詞；有的話是發言人深信不疑，旨在說服他人，有的話是發言人自己也半信半疑，意在與人探討；還有的話旨在樹立形象，有的話意圖求得諒解。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裡筆者也無從判斷，只好囫圇端出，對不對胃口，尚乞各位看官海涵。

第一部份：

大陸同學的關注點：留居？民運？

當報刊對民運中各個活躍角色頗有報導之時，不少大陸同學對作為群體的大陸同學也頗有微詞。而出於「法不責眾」的心理及新聞報導注重名人的慣例，大陸同學作為一個群體鮮有被曝光的機會。以下是幾位大陸同學的意見

踏車坐的太多

L 同學是某校負責 LOBBY 的同學，每談

起這個與每個大陸同學命運攸關的事，他都不禁感慨一番。

Q：你一直負責遊說，請問你對此事有何看法？

L：有人認為遊說與民運沒關，我看不然。遊說是個明確的信號，表示同學不容忍你對民主的鎮壓，不喜歡你那個社會，寧願忍受離親朋友，說不成中國話，也不回去。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他們用行動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Q：請問你做遊說工作佔用多少時間，同學對你的支持如何？

L：遊說是一種極費時的工作，每天至少四小時，多的時候十一、二個小時。每天要跟蹤新的進展，打電話分析情況，協調策略，起草新的方案。最重要的是太佔用精力，使你根本沒心思搞本專業的事。半年下來我一點研究都沒做，我看我們老板也快把我開除了。

Q：為什麼別人不能分擔點？

L：這事技術上很麻煩，你必須熟悉通盤情況，聯絡和策略上都要有連續性，所以一旦接手，很難推出去。我做這些完全是義務，一分錢不掙，可這兒的學生連其碼的責任也不願分擔。

Q：從何說起？

L：比如說電話吧。遊說緊張時一個月下來電話費要幾百元，我也不能總到辦公室打。有一次就發了個通訊請大家認捐支付，兩個星期才收到二十塊錢。有次開會現場捐款，上百個人湊不出百十塊錢，最後差四十塊錢還是上一任的學生會主席看不過去墊上的。

Q：看來這大批的踏車的是最讓你有感觸的事了。

L：不是。是中國人的內鬪，真是醜陋。你在這兒遊說，一些人在那兒反遊說。主要是一些F—一的人說這樣不公平，他們也有NEB FLARK，也給國會打電話寫信。還有人在計算機網絡上模擬一個J—一女生的口氣寫一封徵夫廣告信，言外之意是嘲諷J—一不擇手段留下來。中國人是一點不顧大局，在一點利益面前拚個你死我活，自己賺一分，寧可讓別人損失一萬。可他們對共產黨却那麼忍讓。有個美國人跟我說這兒幾百萬猶太人可以左右美國總統選舉，你們上百萬中國人却什麼也做不了。這話雖然不中聽，但的確是那麼回事。

Q：最近布什總統頒佈了對中國學生的法案，同學們也很感謝你們的工作，對此你有什么話要向同學講嗎？

L：我希望如果有同學因此而找到工作留下來，別忘了自己是中國人。

以下是兩名F—一的同學對遊說工作的意見。

O：你不能說所有的F—一學生都反對J—一的利益。而且各地的風氣也不一樣，我們這兒就沒什麼這種事。我是F—一，也捐了錢給遊說工作，相反，我們這兒不少J—一真是「一等二靠，專等着吃現成的」。

O：我想說一點是介紹情況應實事求是。東部一些主持遊說的同學向大家介紹說J—一的兩年回國限制取消對大家都有好處。實際上因為人員大增，移民配額有限會影響F—一的

利益。當然F—一應當從大局出發支持J—一學生的要求。

#### 盛況空前的移民政策傳達會

月 日，本市移民局長擬向同學介紹布什總統有關中國同學法案的情況，後雖因故未到，由本市律師和本校外國學生顧問代為介紹情況，然依然盛況空前。以下是幾位同學對此會的見聞及意見。

A：要問X大學中國留學生最關心什麼，到傳達會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學生會改選，有四十七個人參加，不少還是靠候選人一個個打電話請來的。中國之春主編和全美學自聯副主席來作講演，主辦的是人家台灣的一個學生團體，廣告登上了世界日報頭版，第一場來了不到十個大陸同學，第二場二十多個。這次轉達對大陸學生的移民規定，通知照例應由本校的計算機中心代發至各系，因為我們此前交的錢用完了，服務費不夠，所以按姓名發通知只發到了L起首的姓氏，本以為從通知到開會只有兩天，又有一半同學的通知沒發出去，準有不少人缺席。開會一看，好像伙，足足有三百多，連外校的都聞風而至。

Q：最有趣的是同學間各類問題，我想準讓外國留學生顧問和律師大開眼界，可謂面面俱到，巨細無遺，對各個要點更是反復詢問，不厭其煩。下面是幾則問答。

某中國同學提：布什總統的行政命令旨在保護中國同學避免回國可能受到的迫害。我今年（一九八九）年底打算回家探親，住兩三個月。如果我沒有遭受迫害而又回到美國，請問那時再改在F—一簽證會不會有問題？律師答：不會，只要你在九四年元月一日以前改。但你最好考慮中國對此規定的反映，不要回去後產生問題。

問：我是J—一學生，因此配偶可以工作，如改成F—一，則按目前規定配偶將改成F—二，則工作許可只到明年六月五日以前有效

。請問我目前不改簽證，總統是否會有改變此規定的可能。答：不會，請記住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以前改就可以。總統的行政命令條件禮品，觸手可及，但過期作廢。

問：如果我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或此行政命令到期前還沒畢業，請問此命令對我有何實惠。答：如果你是J—一，可以轉成F—一或其也簽證，豁免回國兩年，但其他各項調整身份的要求並沒改變。

問：我一直領取少量的公費津貼，而不是自費公派，請問這是否影響我改成F—一或H—一？答：不影響。

問：學校或移民局會不會公佈J—一改成其他簽證者的名單？或中國領事館索取時會提供？等：我想不會。但是你不回去，我想他們早晚會知道。

此外還有各種高論。如主張J—一領取或領過公費的應把本錢加利息還給中國政府，再改變身份成居留也心安理得。有的認為領了錢也不必還，因為早讓共產黨剝削夠了。也有講等老婆孩子出來再改，一改老婆孩子就不好出來了。如果家裡人出來，自己遲早還要回去，現在改了一朝回國豈不自找麻煩？

A：總之學生的態度是五花八門。有的顯慮是合情合理；有的問題是自私自利，真是令人恥與為伍。

#### 做不做中國人？

大陸同學最為關切的留居法案在同學的感觸反映上變成一個心理定位問題，而且攪動得一些人頗感到良心不安。反對留居者說不能國內人流血國外佔便宜，與此相反的則聲言不做中國人是其個人自由。介於兩者之間的有主張留居不忘本者，有主張嚇跑了四萬留學生，是共產黨活該者。還有的認為留居就該從事民運，才對得起國內的犧牲。有的認為留居應着眼於發展業務，變成李政道、楊振寧、王安一流，才是曲綫救國的正途。當然大多數人認為理

想和現實是兩回事，十年積累的教育精華滯留海外，當然於國不利，可是此機會千載難逢，作為個人豈有見拒之理？下面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兩種意見。

不做中國人是我的自由

筆者最近遇到兩位朋友，一位堅決主張中國人做不得；一位主張雖然做中國人不舒服，還是非做不可，否則心理上無法安身立命。兩位各呈其說，筆者也莫辨其是。姑妄錄之，就正讀者。

Q：聽說你們兩位對「不做中國人」一事大有爭議，能否略談一二？

T：爭歸爭，大家還是朋友。而且他也是和我在一起才爭論這個題目。我看一是我們都選對中國的事放不下，才有爭論；二是他他想他自己的選擇和行為合理化，要不然講這套沒人聽的道理做什麼？反正在美國只要你違法，誰也不管你。還是先請P講吧。

P：老實說，我是對中國徹底失望了。第二是覺得遵從許多堂皇的理論是做繭自縛，為人所用。

我說自己不願做中國人，是因為做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奴」。當年做紅衛兵，想的、說的都是他毛老人家教的。後來入黨，做幹部，想的、說的都是他鄧老人家教的。後來別人教的理論說不圓現實，又看了些書，有了點自己的思想，就覺得自己簡直不是人，一天到晚在扮演角色。還不是自己喜歡的角色，而是自己厭惡的角色。所以才跑出來讀書。又趕上個六四屠殺，今後若回國，不但「中國人」當不了，「中國奴」也當不好了。

Q：可是如果一個人有了點民主意識就跑去誰去改變中國人的處境？

P：所以我奉勸知識份子先救自己要素，不必以天下為己任來滿足自己傳統的虛榮心。個人自由是一切其他美德，諸如社會公正，乃至個人犧牲的前提，如果一個人被某種傳統概念或社會輿論裹脅着從事某種號稱崇高的事業，而不是真正地出於內心的選擇，到頭來肯定

事與願違。不但於社會不利，恐怕自己也要後悔莫及。

Q：能否舉例說明你的高論？

P：比如說你當了吾爾開希，就西服也不能買了，飯館也不能下了，要節衣縮食地扮演民運領袖的角色，以迎合群眾心理。而大多數批評者是一分一毫也不想犧牲自己的個人自由和隱私，却要剝奪一個民運領袖的個人自由和隱私，請問這種角色誰當得好？你應當在尊重個人自由的前提下設計和要求一個民運領袖的美德，否則沒人能勝任。再比如說我吧，雖然有民主意識，回國去政治上不肯送死，經濟上也不願受窮，這年頭知識份子當在當代社會中早已沒有潔身自好的任何餘地，所以恐怕實際上的所作所為即使不是助紂為虐，也要同流合污。中國眼下的社會環境是官不貪就不能富，民不刁就不能活。政治運動一來恐怕誰都要違心說假話。你要堅持你的政治信仰和道德原則，不僅要準備碰得頭破血流，還要準備妻離子散。我想我根本沒有實踐自己信念的承受能力，所以我說如果讓我自由選擇，我就不當這個中國人。我當然尊重那些自己選擇了回



中國人必須戴上假面具生活嗎？

國去搞民主的人，但那些人也沒權力強迫不願回去的人回去，否則他們的行為就已經是背離民主的獨裁行動了。

Q：Y先生對P先生的見解有何評論？

Y：我不反對任何人選擇自己的去留，但我想說P先生的見解僅是一面之詞。你不想當中國人，總不能去當外星人、月球人吧？所以不是中國留你不留你的問題，是那兒能要你的問題。你如果當初說你決心不當中國人，美國領事館肯定不批准你的簽證。你想留在這兒，肯定不能活得像你現在說得這樣理直氣壯。你這套大道理與其說是講給別人聽的，不如說是講給你自己聽的；第二，你要留在這兒，至少從目前四萬萬留學生集體留居的角度講，是估國內民運流血犧牲的便宜。國內參加民運的人是坐牢的坐牢，下放的下放，換了個留學生在國外安居樂業，你說國內人會怎麼想？你們留在這兒，肯定沒考慮到別人選出得來出不來，也不考慮中美交流會不會中斷，根本和國內人的利益是兩條道上跑的車，所以人家說留學生一踏上登機板就是踩上了變心板。國內現在全靠對外開放這條門縫喘口氣，見點亮兒，總不能因為四萬萬學生鬧留居把國內十億人都封死了吧！第三，民陣、學自聯都以為只有給學生爭取到留居權，學生才能沒有後顧之憂地搞民運，這實在是誤解。現實的狀況是留居只會鼓勵學生找工作、買房子，對大多數人而言，出錢出力搞民運在他們的個人規劃裡根本沒有優先權。現在是中共與民運組織爭相捧學生，領事在「六四」之後一到學校作傳達只好憐巴巴地以傳達免稅規定為藉口，民陣吾爾開希在世界上報上剛說了兩句不滿學生光張羅留居的話就遭到告誡。全美學聯更是以爭取留居權為己任。留學生現在變成了只能順毛胡嚕的貓，樂得在這個領事館、民運組織和美國方面三不管的輿論真空裡坐享其成。其實，民運要有輿論氣氛，要有大陸同學的自我批評，不能像民陣領導那樣不敢「出口傷榮」。捧是捧不出個民運高潮的。

＊

# 同學致敬民運人士 領館官員醜態百出

博華



「我是代表我個人來的」。

會上馬春來只敢坐在最後一排既尷尬又孤單，不敢出來與大多數同學們說話。晚會上，在同學們的建議之下，全體同學及所有美國朋友爲了表示對中共暴政的抗議，當着這位中共領館官員的面，向在去年北京六四大屠殺中犧牲的

衆所週知，近來中共領館官員在美國各大學中，四處活動，利用各種手段尋找其代理人，以達到試圖恢復對各級聯誼會進行控制之目的，芝加哥領館官員馬春來受密西根州立大學（M.S.U.）現任聯誼會主席朱某個人邀請，前來參加該校一月二十七日的春節晚會。消息於一月二十六日中午在該校同學中傳開，立即引起大嘩。不少同學紛紛找朱某要求退票以示抗議。很多同學索性去參加台灣同學當晚的春節晚會。還有的同學直接與中共領館官員馬春來打電話，反對他代表中共暴政前來參加晚會。

由於同學們的公開反對，在二十七日晚



學生向天安門民主人士致敬，  
領館官員向壁

民主鬥士們和目前仍被中共關在監獄之中的民運人士起立致敬半分鐘。這下可苦了馬春來教授，欲站不敢，欲坐也不敢，在這短短地三十秒鐘內，恨不得有天有眼飛出去，地有洞藏進去，度秒如年，不知所措，尷尬地在座位上扭來扭去，把臉轉向牆壁，最後也許撐不住了，半起半坐地來了一個「騎馬蹲檔式」腿雖然快站起來了，可是腰總也直不起來，一付愧對炎黃祖先的摸拜，醜態百出，不在話下。

後來許多同學圍着馬春來質問，問及他對學自聯的態度時，儘管人民日報已多次三令五申公開宣稱學自聯是反革命組織。但是馬春來教授却回答他並不知此事。是對學自聯的招安信號嗎？還是一時嚇忘了上面怎麼說法，是對民主運動委婉地表示同情？還是怕當場挨批？筆者無法猜測。當有同學問他此行是代表政府而來還是代表個人而來的時候，馬教授略一沉吟，皮笑肉不笑地說，他是以個人身份而來，並不代表政府。嗚呼！可惜一堂堂國家命官，居然不敢在自己的子民面前凜然承認自己代表國家，一付上命差遣，身不由己的架式。

當然，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馬春來雖沒有隻身闖鴻門宴的氣度，也沒有單刀赴會的勇氣，但是無論如何，公道而論，馬教授代表個人也好，國家也好，向烈士致敬時半起也好，半坐也好，總算不辱上命，把「年關」放在「白區」過了。可憐馬教授倍受挖苦、飽嘗尷尬，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筆者在此遙祝馬教授從此官運亨通，青雲直上。但是請看馬教授前任劉秀英六四之後，同情學運，已在美尋求政治庇護成功，和中共暴政徹底決裂，回頭是岸，仍不失爲聰明人。馬教授來自中國大陸學府之冠，清華大學，看起來也是幹練有加，聰明過人，不是人中龍，也算得人中傑，何苦爲中共暴政作「一刀筆小吏」枉做笑柄，遺臭萬年。不如早日投奔自由，一起走到和全國人民推翻中共暴政的隊伍中來，今年時值「馬年」。但不知老「馬」識途否？

\*



# 逃跑學

郎 郎

從技術上：要完善「逃跑學」的細節和程序。

### 三

「逃跑學」和李敖的「避禍學」不同。前者是積極的、入世的理想主義實踐者的看家本領。後者是出世、遁世者的消極獨善其身、明哲保身的基礎知識。

然而，在方法上，可以互相借鑒。

### 四

中國古代謀略思想：「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當機立斷」是成功逃跑者的必要心理訓練。

「逃跑學」在盛世的箴言是：「說不清，快跑！」亂世時的箴言是：「打不贏，快跑！」以快為本，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戰略戰術都以跑為本，不但司令要跑，還要帶着兵跑。庫爾佐夫是逃跑專家，能豁得出去挨罵，頂着「賣國賊」罪名，帶着大軍逃跑。把莫斯科都白扔給拿破侖了，結果他贏了。

毛澤東也是逃跑專家。個人逃跑時要過飯，大軍逃跑時長過征，不惜頂着「臨陣逃脫」的罪名，結果他贏了。

蔣介石最後明白了：面子沒命重要，面對現實就是快跑。不逃就沒有今天的台灣。如果，早就放棄江北，主動撤回江南，戰略大逃跑，偏安在江南。和東西德那樣，冷戰而和平競賽呢？難說。總之，「該逃就逃」總是對的。關鍵時刻能主動認輸，甘於捨棄，才是好棋。

### 五

人們歷來知道逃跑的重要，但在姿式上實在難看，在道德上遭人卑視其苟活心理，所以多不肯細研究「逃跑學」。因此「眼前無路想回頭」的逃跑，大多是倉惶出逃。對勝利的準備老是多過失敗的準備。

拚命——為什麼拚？為誰拚？和誰拚？直不值得拚？

復仇——向誰復仇？復仇能帶來良性的後果嗎？

「為了一個偉大、光明的目標，有權使用一切手段。」這個故事聽了多年，事實我們見過。手段本身隱含着目的，手段可以實現或破壞目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成了一個怪圈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我不願死戰，必須改成活戰，主動走出怪圈。

再也不能鼓吹為理想而死，要鼓吹為理想活下去，不但自己要活下去，還要幫助更多的人活下去。

為此，必須研究透徹「逃跑學」。從哲學上：為肯定「逃跑學」的積極意義

「六四」一聲槍響，粉碎了一切幻想。

此後，我們再也不會向這種政權證明：「為了民主與自由，我們願拋頭灑血。」我們再也不用向世界各國證明：這個政權是會屠殺自己的人民的。

此後，我們無需向誰證明什麼，我們無需理會別人的詛咒。我們要盡力盡心，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 二

「逃跑學」，是活下去的哲學。你活着，我更要活下去。我要走出你所設下的「你死我活」的模式。

逃跑環節很多，一環扣一環，可忙中有亂，只要一個偶然差錯，就會半途而廢。今後必須事先像球賽之前一樣，研究好各種方案，包括失敗時的應變方案。

難道我們連一場足球賽的專業精神都比不上，那太單薄了，太脆弱了，必須有詳盡的收效原則，進退的尺度。

安排活命的通道，是對獻身者的生命負責，對理想的目的負責。

六

所有專制的將軍，最討厭想活命的兵。我的逃跑哲學，適用於手無寸鐵的民，也適用於全副武裝的官兵。名將林彪的名言是：「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勇於犧牲，完蛋就完蛋！槍一響，上戰場。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那是說給戰士聽的，他們才不呢！天真的戰士真的那樣做了，結果一將成名萬骨枯。

我鼓吹：「在需要逃跑的時候，要撤退就跑，丟臉就丟臉，槍一響，下戰場。老子下定決心，今天要活在戰場外了！」

如果「崔國政是逃兵」的傳聞屬實，他才

是真正的共和國勇士。

逃兵是真正的英雄！逃兵是對暴力的不合作者。對鎮壓的釜底抽薪。

皇上最喜歡看不逃的兵，去殺不逃的民。拚死的民血流成河，至多殺幾個兵，還不是穿軍裝的民，只是服裝不同。

和古羅馬看角鬥士格鬥一樣刺激，區別只是規模更大，武器更精良，逃跑的角鬥士，他有思想：他不願再做殺人表演，無論是扮演殺人者或被殺者，他都不幹。

角鬥時，只有一方跑了，都沒戲可看。雙方都跑了，皇上就慌了，他也該學「逃跑學」了。齊奧塞斯庫沒好好學，下場如何？

我們是被宰割的一方，必須先會逃跑。要跑得更漂亮，跑的更多，帶更多的人一哄而散。

八

如果你是領袖，你是精英，要清楚大多數善良的群眾，不是戰士，不是英雄，不是先鋒。要讓他們活下去，不要為你們還沒清楚的目的去犧牲。

他們的同情與支持，你們要珍惜。要給他們表達的機會，你們更要珍惜他們的生命，要鼓勵他們逃命，絕不能鼓勵他們拚命。

九

凡是中國人當了皇帝，都不喜歡有腦子的人，麻煩。如果還要「指點江山，說三道四」，那全是禍頭子。所有的獨立知識份子全是欽定的禍頭子。

侯德健在台灣是禍頭子，到大陸還是禍頭子。

林希翎在大陸是禍頭子，到台灣還是禍頭子。

禍頭子其實也不是戰士，沒受過那種紀律性的訓練。更得學好個性逃跑學。

他們即使一片熱誠，往往「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光有一張嘴不行。練好你的雙手，能「平地掘餅，土裡刨食」——餓不死。練好你的雙腿，能「拔山涉水，氣死輪胎」——逮不着，那會兒，再大聲說，再大聲喊——你已經有了保嘴的高着。

十

自覺自願的戰士，一定是想透徹了。

他們應有這樣的品格：他們用不着「鞭子打圈——坐着喊」。他們不必去動員群眾參加「敢死團」，他們更不能沒有把握的許願，要求別人去「死戰」。也不會為響應者寧若晨星而惱怒。

那是一條寂寞的路，是自己的抉擇，用不

着別人讚賞與肯定。

我不是戰士，只是同路人，可我認為：你們更要學習逃跑學。你們是獨膽英雄，是狙擊手。不是大兵團對峙中的機械兵，不會保護自己，不是好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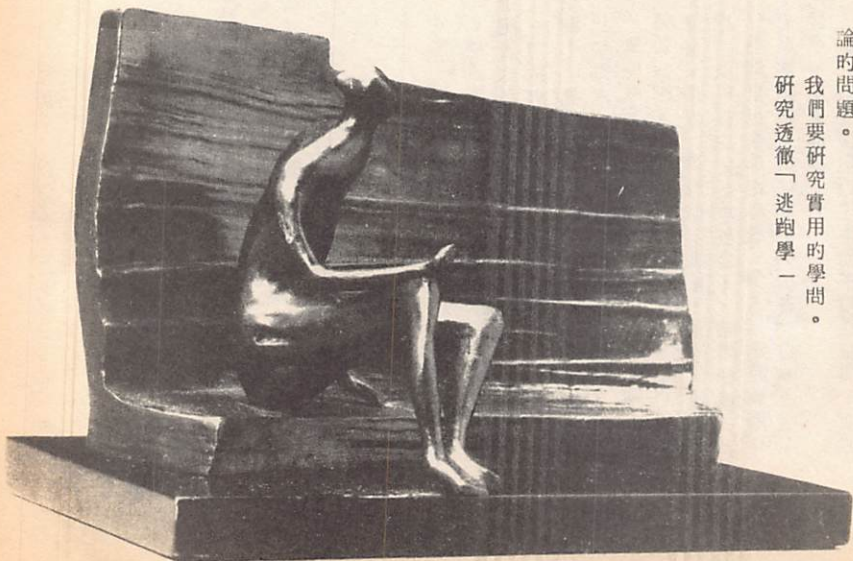
你們也要仔細研究「逃跑學」。

十一

我沒有教給你一種方法，而是告訴你一種思路。

我沒有提供一種結論，而是提出了可以討論的問題。

我們要研究實用的學問。  
研究透徹「逃跑學」





一種感覺是這樣引起的，那天，夜晚寒冷而清冽，我們幾個人聚集在紐約曼哈頓格林威治村演奏布魯斯音樂的酒吧裡，人很多，那些美國年輕的大孩子鬆弛而又富於野性，我可以嗅到人叢中散發的青春氣息，我們喝酒，並且忍受巨大分貝的強節奏音樂對於身心的摧殘。我是一個在人叢中感受孤獨的謬誤者，我承認我的心態早已變異，一個不幸時代的產物。就這樣，我必須捱過這段命定的時光，因為我還具有的這點可憐的對於人的興趣。

我已多次經歷過這種場面，它的極度荒誕，當我單獨坐在散發着沉悶氣息的紐約地下車裡時，我常常發現自己會痛不欲生。我不能確切地解釋它，我在細究，究竟是什麼使我失望，我知道自己本質上是一個乏味的人，儘管我不能由此推論別人也乏味，可有一點，它是確定無疑的，即失望確切地存在着。當然，我對

自己的失望是永恆的，它僅僅由一些具淺的存在構成，例如語言、例如前景未卜的存在、例如我那不斷的陣痛，我無能改變它。可我又確知，我的失望有時是由於和人發生關係構成的，我驗證了這個過程，它刻骨銘心，却又過後又忘。

人是一種存在的受難者，它由智性的敏感構成。卡夫卡足夠幽默，他用智者的苦澀洞穿了它，他說：「受難是這個世界上的積極因素，是的，它是這個世界和積極因素之間唯一的聯繫。」奇跡是，卡夫卡用作品把失望上升到了受難的層次，他簡捷而又堅定地認定他只能寫作與思想，並通過此而淡化了生命中其他的欲望。人是一種具備代價功能的東西，因為我知道自己，思考是弱的，寫作是更弱的。

我是一個具有行動能力的人，儘管它帶有強烈的隨意性個人色彩。迄今為止，我在美國完整地接觸了一批失敗者（因為我是一個早來了一段時間的失敗者），儘管他們身上有着倖倖的英雄氣，這些失敗者包括了大名鼎鼎的民運領袖、著名的異議份子、作深刻狀的大導演，處在地下狀態的前衛作家、自我感覺良好的觀念藝術家、榮不思鄉的先鋒派畫家，目以為世界公民者、街頭遊子、侃爺、獵艷癖公子、患了憂郁症的虛假不幸者，還有，就是那些像永動機般高速運作的職業革命家。

我不是一個天性刻薄之人，我活得頗為抑鬱，可我不幸在前面使用了刻薄的語式，因為我是他們其中之一，而且被認為是一個角色曖昧者。記得我的一位文學朋友曾在歲末之際認真地問我，你到底是一個詩人，還是一個民運份子，當時，我苦笑了一下，我能說什麼呢？這個問題其實是不能問的，當我們聚集在一起，試圖用調侃來打發寂寞時，這個世界就已經足夠荒誕了。

問題發生在這裡，從理念上講，這是一批完整的反對派，它的陣容頗為浩大，而且，除了職業革命者之外，個個都以為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我們不乏世俗的幽默，而且講起方言來維妙維肖，當獨自面對充滿關注的西方媒體時，每一個都能講出足夠豪邁的英雄經歷，還有在西方報刊上隨處可見的關於自由民主導向的數種模式。

當然，這無疑是一種個人的行為，我無力對此加以價值的評價，我所能做的，只是探究這種失落感存在的原因，而這首先只能導向我自己。我必須承認，置身西方社會，我個人充滿了一種沮喪的失敗心態，這種失敗源於我在國內經歷的整個生存環境，專制制度最可惡之處在於它完全剝奪了個人應該受到的起碼人之教育，非人的成長環境使得我喪失了一個正常社會必備的基本手段，即語言能力和生存能

## 選擇，一個宿命的悲劇

——對個人及其存在的反思

貝嶺

力，這兩點應該是密不可分，尤其是一個現代人。我舉個例子，在一定意義上，劉曉波是做為一個在西方社會無法實現價值的失敗者而返回中國參與恰好而來的變革的，從生命意義上，這需要足夠的勇氣，而從存在的角度，這又構成了另一種逃避，我深知劉曉波的苦衷，做為一個崇尚精神和形而上思考的知識份子，曉波渴望和拓展人類精神的哲人對話，而這他曾經作得很精彩。而作為一個曾被專制制度有限默認的反抗者，曉波的天性又充滿了與庸人及專制制度對抗的衝動。曉波曾經對我講過他夫人對他一針見血的評價，曉波的天性裡有着一種血液，即作為社會的對立物的天性，而這個庸俗社會又縱容了他的天性，使他樂此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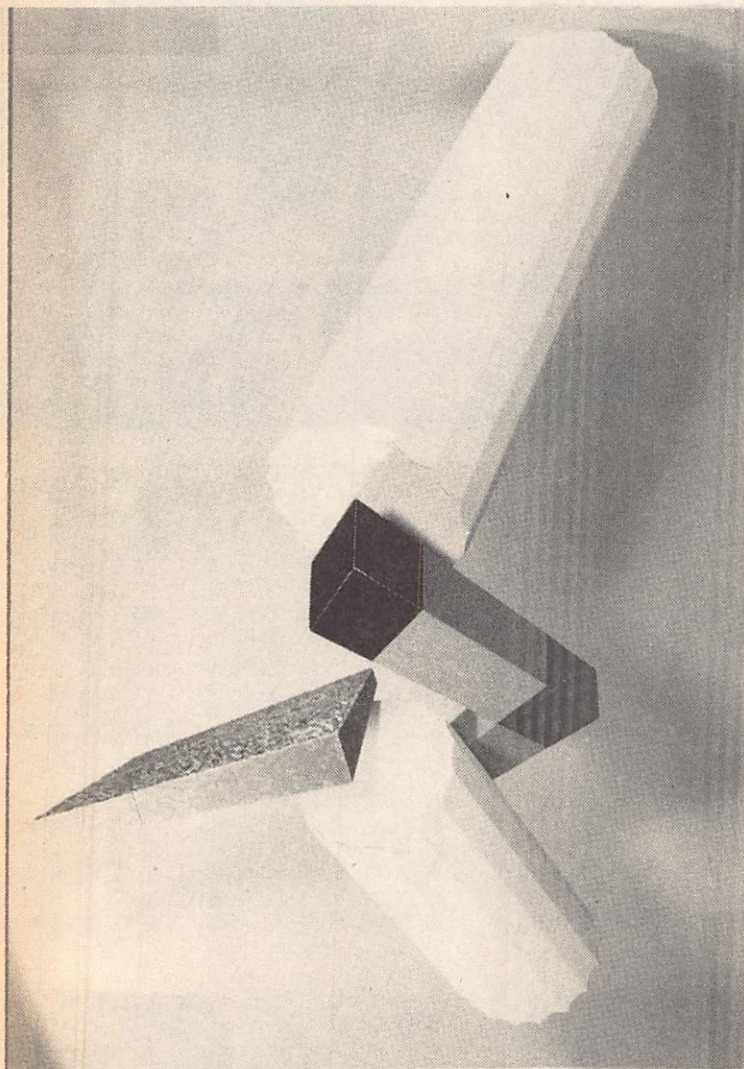
。曉波充滿激情，他的素質使他足以擔當對專制權力的批判性反抗，可由此却中止了他本已開始的在人文領域對人本的探索，人在那種制度下無法同時擔當這兩種角色，這種代價不可謂不大。也許有人由此申辯兩者並不矛盾，可曉波已經意識到了，在足夠私人性的場合，我們曾為此而感到悲哀，可他已無力扭轉這種慣性的改變，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被召喚的，因為我們在那個專制環境下長大，而且厭惡之至。一旦發生可能的變革，人無法逃避。況且我們還不享有思想的空間。

這正是我的弱點，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人有太多被壓抑的衝動，人在喪失個人自由的社會裡形成被壓抑和妄想狂的性格。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大都從根上都具有這種被異化的心態，

懼怕承認自己無知，懼怕被人群拋棄，懼怕對內心黑暗的自我審視與揭示。

我們再返回最初的命題，這種失望感覺究竟是什麼？它的存在從個人身上又能驗證什麼？

作為一個個人，理想的選擇之一是把自己徹底打碎，即徹底地承認自己的價值僅僅是在一群無知者的襯托下顯現的，我們也只是其中的一位，因為專制制度最大的成功恰恰是創造了一個被動選擇的愚昧環境，如果我們還算聰明，就必須首先確定自己精神貧困的現實，而不是像某些知識份子那樣處處以精英和思想家自居，在中國，贏得弱智者的掌聲並非難事，只要你具備足夠的勇氣便可。可目前我們是置身西方，不管今日的西方社會多麼庸俗和商業





# A R T

化，可它在漫長的精神發展中積澱了如此繁多的文化財富，我們無法視若無睹，況且西方的知識界迄今以來放鬆對自身社會的深刻批判與人文的艱巨探索，和西方知識界相比，我們足夠的無知與貧乏，何況我們若進入門檻，連入門的語言還未掌握，對此，當我每每在這塊借栖的土地上躺下時，真是驚恐得日不能安，夜不能寐。我們這群失敗的革命後的倖存者和逃亡者，由於這點可憐的勇氣而在西方獲得的短暫關注與生存資助，套用米蘭·昆德拉的話來講，僅僅是因為西方世界對於不幸的弱小民族的同情而已。我們千萬不能拿着鷄毛當令箭，昏昏然了。把自己徹底打碎，意味著把自己視為一個精神上的無知者，一個徹底的文盲與語盲，從基本的生存開始學起，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學習，為將來可能進行的批判與精神重建而做些巨大的準備，而這都不可樂觀，也許我們耗盡一生，仍不得批判與再建的基本要領，我們已不充裕的生命傾其全部僅僅是設

法獲得一次新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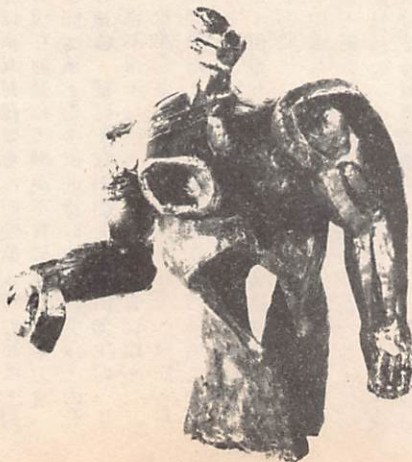
另一種選擇則是徹底地把自己相對封閉起來，我們不走出圈，僅僅做一件事，完成一項命題，用我們在中國這個特定社會獲得的特定經驗，把這些弱的、悲哀的，那些德性，醜惡與失敗的經歷，用個人的洞悉完整地表達出來，以昭後人，以示世界。萬不可不誠，不可矯飾，不要做英雄主義的拔高與誇大，不要像某些布爾喬亞文人那樣總做白日夢，總走不出昔日做群氓頭子時的虛幻感，把真正的現實與內心世界展現出來。或者，延續以往個人理想的努力，不倦地，唐·吉珂德式地往下走，往死裡活，完成自己悲劇性的一生，做一個特定領域精神上的個人英雄主義者，追求生命的悲劇式戲劇性。

揭示存在的嚴峻性，用文字來表述它，也許遠比我們生活上實踐某種選擇要簡單與容易得多，儘管此時我的筆觸已趨於嚴肅。無疑，人是取巧的，是喜好貌似轟轟烈烈的群眾性、聚會性集體行為的。不管這樣行為是革命的，還是生活方式的，作為個人，我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在群眾性、聚會式集體行為中，人們可以彼此溝通，可以相互壯膽，可以取暖，可以汲取對方的唾沫來滿足自己的口渴，甚至可以快速地以與對方的比較中認知自己的價值，這也是人性，除非是超人（它確實有），否則，人對於孤獨從來是葉公好龍式的，孤獨在一般意義意味着孤立與隔絕，對於人，這種社會性動物來講，這是充分可怕的。

所以，我已經基本上大致地表述了這種失望感是什麼，對於個人來講，這意味著什麼。簡單地說，這是一種完整的不幸，是一種無力感，是一個總是置身在群體之中，又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個人時的荒誕與尷尬，這是一個中國式知識份子在世紀末，在被逐出家園之後，心智不夠健全的一種存在。因為我們的人格形成在一個專制社會，作為一個先被綠化，後來又充滿反抗的個人，我們既是這個專制制

度的對立物，又是它的衍生物。一旦我們離開了這塊寄生的土壤之後，當我們被異化在西方社會之中時，和專制制度對抗，也許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再生，是精神上的新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流亡詩人約瑟夫·布羅斯基說得好，當人們忘記了暴君的名字時，我們也就真正地獲得自由了。

再讓我們遠眺，當我每每想到遙遠而又不幸的中國時，我的內心只有一種巨大的不祥，它的苦難看不到止境，革命也好，和平演變也好，它都不是我們所能預知的，也非我們流亡



者所能導致。暴政必須滅亡，對於身受其害的人們，對於我們，無論是以行為，還是以精神上，我們必要加速其滅亡。但中國的苦難絕非僅僅因暴政的滅亡而終止，其後的民族性與文化的糾結將會產生無盡的悲劇，它更本質，也更複雜。對此，我有一種無力感，一種宿命，我無能，對於如此缺乏行為能力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來講，我充滿悲觀，甚至幾近絕望。一個巨大不祥的苦難中國（白痴治國，痞子當道，道德淪喪，人性泯滅，越救亡越亡，民主運動剛剛喚醒的人性與良知又再次被打碎）。將是我們無法逃避，也無力擔當的一個浩大而恒久的命題。

\*

# 改良還是革命

在台北參觀孫中山紀念館有感

老木

八九中國民主運動以數千青年學生、市民和工人、知識份子的生命作為代價，喚醒了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主題，這就是我們面對暴政的時候，面對手提屠刀的劊子手的時候，究竟是改良還是革命。不能說沒有先見之士，但是在八九中國民主運動的慘重失敗之後，我們更多的朋友仍在徬徨與猶豫之間。然而，我們實在很難修談和平、理性、非暴力了！如果我們在極其殘忍、極其虛偽的中共暴政面前，仍然寄望於中共的自動悔改，那多少有些太天真了吧？即便是中共的被迫讓步，那也只是心不甘情不願而已，誰又能保證它不會像「平反」天安門事件一樣呢？轉瞬之間，這邊是笑臉，那邊又舉起屠刀，鎮壓了「北京之春」！

此次去台灣訪問，特地抽空去參觀了中國民主革命之父孫中山先生的紀念館，感觸良深。樸素的建築和樸素的陳列，却蘊含着極為厚重的歷史內容，本世紀以來中國的種種變遷，風雲都深藏在每一條說明文字，每一件歷史舊物和每一幀發黃的圖片之中，而這一切都昭示了一個主題：以革命推翻專制統治。

稍為具備歷史常識的人，便可發現中共開始的十年改革，與當年的洋務運動是何等的相似！中共猶如當年清廷，迫於內外壓力而開始有有限的十年改革，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便如同只可學夷之技，不可移夷之學一樣。改良

的結果當然是死路一條，而八九民運中，中共改革派所做的種種努力、掙扎與自保還不如當年的帝相們，其決心的堅定程度和意志的堅強上都沒有超過當年軟弱的光緒和他的帝黨們，以致他們在這場聲勢浩大的人民的要求改革的示威和抗議運動中態度游移，既高興又擔憂，既想利用又擔心利用不成而火燒自身，矛盾的心理體現了他們並非與這場民主運動立場的不一致，軟弱的本質導致了他們的必然潰敗！他們既不為保守的「后黨」們所不容，又不敢公開站到人民的這一邊。在大難之時遠不如當年的光緒下詔逃亡，也未有譚嗣同們出現，而均採苟活保命之態。因此，我們同意有論者指出的八九中國民主運動導致了一場新的戊戌政變的同時，還要強調歷史畢竟不同於九十年前，康梁當年潛逃海外，繼續主張保皇改良，而我們却不是當年的康梁，我們所代表只是人民。

而且，八九中國民主運動的性質遠非當年百日維新所能比。即便知識份子響應方勵之先生的公開聯署信有類於戊戌之「公車上書」，但三十三名知識份子聯署信之目的並非在於乞求皇帝的恩准，而是以蔑視了「中共中央」（此信致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而體現了其公開挑戰的性質，這樣我們就可在極為複雜的八九民運中發現一條微弱而清晰的主線，即八九民運的一些主要人民自治組織如北高聯、

首都社會各界聯席會議、工人自治聯合會和北京知識界聯合會都多次聲明民主運動並非支持黨內的哪一個人，哪一個派別，而只是表達人民對於一個民主制度的要求。不管是誰上台，誰下台，都將以人民的意志為轉移，都得順應民心，而與人民為敵的鄧李楊必須接受人民的審判！也就是說，八九中國民主運動在一定的意義上不妨看做是人民經過中共四十年暴政統治的一次和平、理性的抗議和起義。

我提到我對八九中國民主運動的認識，其旨意不過在提醒仍寄望中共高層發生變化的人，我們不可歪曲了八九中國民主運動本來的宗旨，這樣我們確立今後中國民主運動的策略、方向就不會發生背離。而正確的確立又離不開我們對中國近百年歷史的認識，離不開對中共成立以來其封建幫會性的殘酷本質的認識，對中共現存的暴政集團決不肯自動放下屠刀這一特性的認識，對中國社會的現實的認識，因此所有種種，都將使我們面對孫中山先生的一生時，都不得不發出萬千感慨，痛省反顧。

我並非主張我們就此拋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但是我們更應注重的原則是「革命」。我並非主張中國實現民主只有武裝鬥爭一途，但是我們切不可放棄武裝推翻中共暴政！這都取決於中共的態度，更取決於人民的意願！中國共產黨肆虐中國大陸四十年了，所作種種，歸其根本是與人民利益相違背的，是與人民為敵的。當我們在中國實現民主之時，決不僅僅是審判幾個劊子手的問題，而是要取締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在這樣的認識的背景上，我們就能在孫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業績中，發現他不與專制妥協的精神，不企求專制勢力讓步之精神！



#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美國紐約總部:

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U.S.A.

港澳聯絡站

香港 九龍 廣東道 501號  
2樓4室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46號信箱

印度聯絡站

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  
DISTRICT KANGRA,  
HIMACHAL PRADESH, INDIA

新加坡聯絡站

P.O. BOX 419  
JALAN PELEPAN  
SINGAPORE 0515

蘇聯聯絡站

СССР МОСКВА 117463  
УЛ. ПЛАТОВСКОГО  
Д. 3. K. 350 USSR

匈牙利聯絡站

1072 BUDAPEST,  
MAJAKOVSKIJ U41  
HUNGARY

羅馬尼亞聯絡站

STR. ALEEA MACARALEI  
NO. 5 D26 ET1 APT. 21  
BUCHAREST, ROMANIA

南斯拉夫聯絡站

11000 Београд  
македонска 29/IV  
BELGRADE, YUGOSLAVIA

土耳其聯絡站

HALASKARGAZI CAD.  
183 PANGALTI-ISTANTUL  
TURKEY

法國聯絡站

3 ALLE G LEBLANC  
9300 AUBERVILLIERS  
PARIS FRANCE

西德聯絡站

PARISER STR 52  
5300 BONN 1  
WEST GERMANY

荷蘭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英國聯絡站

P.O. BOX 58  
MANCHESTER M14 6XL  
UNITED KINGDOM

澳大利亞墨爾本聯絡站

P.O. BOX 376F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澳大利亞悉尼聯絡站

P.O. BOX 3272, ASHFIELD  
NSW. 2131 AUSTRALIA

澳大利亞堪培拉聯絡站

P.O. BOX 2851  
CAMP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南美洲聯絡站

P.O. BOX 10A  
ALBORADA GUAYAQUIE  
ECUADOR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加拿大多倫多聯絡站

55 MCCAWL ST. BOX 182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W7

加拿大阿爾伯特聯絡站

P.O. BOX 2487  
DRUMHELLER AB  
CANADA T0J 0Y0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P.O. BOX 146446  
S.F., CA 94114-6446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 BOX 565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P.O. BOX 4558  
ARLINGTON, VA 22204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 BOX 740787  
HOUSTON, TX 77274-0787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2411 CONCORD DR.  
WOODBIDGE, IL 60517

美國西雅圖聯絡站

P.O. 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

美國麻塞諸塞州聯絡站

47 CENTRAL ST. APT. 5  
WALTHAM, MA 02154

美國肯塔基州聯絡站

3385 OTTEE CREEK DR.  
LEXINGTON, KY 40502

美國印第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2796  
W. LAFAYETTE, IN 47906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站

1404 RASPBERRY CT.  
EDISON, NJ 08817

美國北卡州聯絡站

115 WOODBURN RD.  
RALEIGH, NC 27605

美國俄亥俄州聯絡站

P.O. BOX 10747  
COLUMBUS, OH 43201

美國田納西州聯絡站

P.O. BOX 576  
TULLAHOMA, TN 37388

美國愛荷華州聯絡站

P.O. BOX 3561  
MOSCOW, ID 83843-0477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

美國夏威夷州聯絡站

P.O. BOX 8718  
HONOLULU, HI 96815

美國奧洛岡州聯絡站

2030 W. 16TH WAY  
EUGENE, OR 97402

美國阿拉巴馬州聯絡站

5213 GREENWOOD LANE  
MOBILE, AL 36608

美國內布拉斯加聯絡站

P.O. BOX 80755  
LINCOLN, NE 68501

美國猶他州聯絡站

P.O. BOX 282  
SLC, UT 84110-0282

美國康乃迪克州聯絡站

P.O. BOX 0039  
STORRS, CT 06268

美國新墨西哥州聯絡站

P.O. BOX 21832  
ALBUQUERQUE, NM 87154

美國蒙大拿州聯絡站

P.O. BOX 5065  
BOZEMAN, MT 59717-5065

美國賓西法尼亞州聯絡站

P.O. BOX 19116  
PITTSBURGH, PA 15213

美國喬治亞州聯絡站

P.O. BOX 29712  
ATLANTA, GA 30359-0781

美國佛羅里達州聯絡站

P.O. BOX 4572  
HOLLYWOOD, FL 33083

美國密西根州聯絡站

P.O. BOX 6347  
E. LANSING, MI 48862

美國密西根阿那伯聯絡站

1659 MCINTYRE  
ANN ARBOR, MI 48015

美國科羅拉多州聯絡站

690 CORORADO BLVD.  
DENVER, CO 80206



# 中國民主運動的勇敢 喉舌

瞭解中國政治局勢・探索中國社會前途

發行：中國之春出版社

美國：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香港：香港，九龍，廣東道501號2樓4室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澳洲：P.O. BOX K710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歐洲：PARISER STR. 52 5300 BONN 1, W.GERMANY

東歐：1072 BUDAPEST, MAJAKOVSKIJ U41 BUDAPEST, HUNGARY

加拿大：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零售價：(美) 2.50美元；(加) 3.00 加元；(港) 12.00 港幣。

T.P. Lee 70-81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ADDRESS: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U.S.A.

TEL: 718-429-6777